



著 斯 格 恩

德 國 農 民 戰 爭

社 放 解

著 斯 格 恩

德 國 農 民 戰 爭

社 放 解

出版編號 0045

德 國 農 民 戰 爭

著 者 恩 格 斯

譯 者 錢 亦 石

出 版 者 解 放 社

發 行 所 新 華 書 店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再版

5,001—15,000 (T)

譯者例言

「貢獻給讀者的這本恩格斯的著作，像其他一切著作一樣，無須任何的介紹。』（借用 Plechanov 在恩格斯德法農民問題序文上劈頭一句話）我在翻譯的過程中，時時感覺到這本書確是唯物史觀的開山祖，用其自己新創的方法，解釋歷史的具體模範。

我譯此書參考過三種譯本：一是 Moissaye J. Olgin 一九二六年的英文譯本；一是 D. Riazanov 一九二六年的俄文譯本；一是八木澤善次一九二八年的日文譯本（改造社版）。

主要的根據則是英文譯本，遇到英譯本有脫漏、錯誤，或模糊之處，都照俄日譯本改正過來（自然，日譯本的脫漏、錯誤更多）。

我譯這本書始於一九二九年冬日，當時只把著者第二版序譯了一部分，即行

中止。到一九三〇年暑假，繼續譯之，執筆時適逢「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之日，譯者情感異常興奮，費了四十日工夫，把本文譯完。以後又因事擱筆。到最近才抽暇把俄譯本序補譯出來；並將全部初稿重行整理過。

農民戰爭在德國已成往事。我們落後的東方呢？正如馬克思所說：「在別的一切世界好像靜止的時候，爲鼓勵別的東西起見，中國和桌子開始了跳舞。」所以，我認爲這本書對於中國，「到現在還未失掉時效」（像著者在第二版序中所說一樣）。所以，我相信這本書能夠幫助讀者更深刻的了解現代問題。

本書本文曾經仲驥兄詳細校對過，多所指正。本書附錄則全仗慈航與公甦兩君之助譯成（附錄一是慈航君依照俄文譯的，附錄二是公甦君依照英文譯的。爲求譯名統一起見，我又親自校對過一次），附此誌謝。

最後，還有下面幾點，向讀者說明：——

（一）本書中有（註釋一），（註釋二）……等字，係英俄兩譯本原有的註釋（日譯本缺），載本書附錄二。

(二) 本書中有 ● ○ …… 等符號，概係譯者所添的脚註 (Foot-note) 載每頁之後。

(三) 本書中有 () 括弧以內之字，係英譯本所無，乃譯者按照中文結構，自行加入者。

(四) 本書中旁加黑點之字，係英譯本的 *miss* (俄譯本也相同)，大都是着重語氣的字句。

譯者 嘯秋 一月十一日，一九三一年。風雪漫天之夜。

親愛的兄弟們，拋棄你們的猶豫和孤疑吧。時機來到了，炎炎夏日正射在我們
們的門上。

——杜瑪斯·孟彩爾

目 錄

譯者例言	一
德國農民戰爭	一
第一章 農民戰爭時期的經濟狀況與階級關係	三
第二章 農民戰爭中的各種反對派及其領袖	二二
第三章 農民暴動的簡史	五六
第四章 貴族暴動的簡史	八一
第五章 農民戰爭紀實及其失敗的主要原因(上)	八九
第六章 農民戰爭紀實及其失敗的主要原因(下)	一三四
第七章 農民戰爭與其結果的歷史意義	一五一
著者第二版序	一六一

著者第二版序書後.....	一七七
附錄一 德國農民的十二個條件.....	一八九
附錄二 註釋.....	二〇一

德國農民戰爭

德國人並不缺乏革命的傳統。有時候德國曾經產生過特出的人材，這些人材能够和他國在革命中最優越者相匹敵，有時候德國人會發揮過忍耐和奮發（的精神），這些（精神）如果在統一的國家中，可以得到最輝煌燦爛的結果；有時候德國農民和平民會懷抱過許多理想和計劃，這些理想和計劃常常使其後裔●搖頭驚嘆。

從一八四八年以來兩年鬥爭之後，目前到處都現出消沉狀態，我們把那大農民戰爭中許多笨拙而頑強的情形，重行提示於德國人之前，是很合時宜的。自農民戰爭以來，過了三世紀，許多情形已經改變；似乎農民戰爭和我們今日的鬥爭

●「後裔」字，在德語本則為「敵人」二字。

相去甚遠，然（事實上）並不如是，而且我們所遭逢的仇敵在本質上還是相同。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到處背叛過的階級和階級中的某些集團，當一五二五年時，已表現叛徒的作用，不過在發展的較低階段而已。

在近幾年運動中，如果農民戰爭的粗暴行動，只是散見於阿登瓦爾（Odernwald）黑森林（Black Forest）西里西亞（Silesia），那末，這種情形決不是表現近代暴動的優點。

第一章 農民戰爭時期的經濟狀況與階級關係

讓我們首先概述十六世紀初葉德國的狀況罷。

在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時，德國工業已有顯著的進步。城市行會組織（Guild Organisation）的生產，已取封建村落的地方工業而代之，為較大的銷路而生產，甚至為遙遠的市場而生產。粗毛製品和亞麻布的編織成了到處設立的工業部門；即精巧的毛織物和亞麻織物，同絲織物一樣，在奧格斯堡（Augsburg）是已經生產的。除了編織工業之外，則有近於精巧藝術的工業部門，這些部門是為滿足中世紀後期宗教和世俗的貴族之奢侈的要求而成立的；如金銀工、彫刻、彫花、製銅版、刻木、製造甲冑、彫琢獎章、轎轎工，等等。這一串或多或少的

●「世俗」即「非宗教」的意思，世俗貴族就是那些不信仰宗教的貴族。

重要發明——直到發明火藥和印刷術——都大有助於技術的進步。商業也追隨工業前進。漢諾同盟 (Hanseatic League) 因為一世紀壟斷海上航路之故，遂使北德意志全部脫離了中世紀的野蠻狀態；甚至在十五世紀末期以後，當漢諾同盟已經敵不過英國人和荷蘭人競爭的時候，儘管法斯科·達·甘瑪 (Vasco da Gama) 的「航路」發現了，而從印度到北方諸國的商業大道，還是要經過德意志。奧格斯堡依然是意大利的絲，印度的香料，和東方各國的生產物集中之處。德國南部諸城市，即奧格斯堡和紐昂堡 (Nuremberg) 為當時著名豐富和繁華之中心。原料生產也是同樣的發展。十五世紀的德國礦工已成為世界上最熟練的工人，而農業亦隨着鮮花怒放的城市，芟除中世紀的草昧了。不僅廣大的土地開闢出來，而且染料植物和其他輸入植物都種植了，這些植物給整個農業以有益的

● 「十五世紀」英譯本誤為「十六世紀」

● 法斯科·達·甘瑪是葡萄牙的航海者。

影響。

然而德國國民生產的進步，却趕不上其他國家的進步。農業遠遠落在英國和荷蘭之後了；工業遠遠落在意大利法倫米（Ferrara）和英吉利之後了；至於海上航路，則英國人，特別是荷蘭人，都把德意志排斥於範圍之外了。人口依舊稀疎。德國文明僅僅圍繞着工商業中心零星散布，可是這些個別中心的利益又有大的歧異，不易得到接觸的機會。南方的商業關係與市場和北方的不同；東東和西方又幾乎彼此不生關係。沒有一個城市像英國的倫敦一樣，發展成爲全國工商業的重心。國內交通幾乎只限於沿海和內河航路，以及由奧格斯堡和紐昂堡經過凱南（Colonne）到荷蘭，經過愛爾德特（Elter）到北方的幾條商業大道。距這些內河和商業大道很遠的有無數較小的城市，這些城市因爲和那些大商業中心隔絕，繼續停滯在中世紀後期情況之下，只消費不多的舶來品和製造不多的輸出品。鄉村居民中，僅僅貴族與廣大世界和新需要接觸；而農民羣衆則不會逾越地方關係和地方限界的範圍。

英法兩國工商業的發展使全國的利益連結一貫，因以造成政治的統一。而德國這種過程，僅僅促成以省爲單位，環繞地方中心的利益上之各種綜合，所以造成政治上的分離。又因爲德國被排斥於世界商業以外，所以這種分離不久即得到穩固。●統一的紐帶按照純粹封建帝國崩潰的比例而鬆懈，大封建藩屬幾乎變成獨立的諸侯，而且帝國（直轄）的諸城市和帝國的騎士們都締結同盟，或互相對抗，或與諸侯對抗，或與皇帝對抗，不明白自己地位的帝國政府，動搖於對抗帝國的各種分子之間，常常失掉威信；像路易十一（註釋一）那樣企圖統一，儘管用盡一切陰謀和暴行，除了聯合奧大利世襲疆土之外，一無所得。在這種混亂之中，在這些無數衝突的七顛八倒之中，必操勝算的那般最後勝利者，是分離中間統一的代表，即地方和各省統一的代表，這就是衆諸侯：皇帝坐於衆諸侯之側，漸漸降爲與衆諸侯中之一個諸侯相等。

● 這段英譯本意義不完全，本文照俄譯本譯出。

在這些情形之下，從中世紀傳來的階級地位，起了大的變化。新階級已經在舊階級之旁形成了。

諸侯從舊貴族中發生了。他們幾乎脫離皇帝而獨立，掌握大部分的統治權。他們自由宣戰和媾和，他們維持常備軍，召集地方議會，徵收賦稅。他們已經吸引大部分下級貴族和城市放在自己驕矜的權力之下；他們用盡一切手腕去兼併尚留在帝國（直轄）之下的一切殘餘的城市和采邑，歸入自己的版圖。他們對於這些城市和采邑執行集中的任務，但對於帝國權力方面說；他們却又是分離的因子。就內部言：他們的統治是專制的；僅僅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才召集等級會議（*Diète*）。徵收賦稅和搜刮貨幣。只要他們認為適宜（就隨時幹起來）。等級會議對於賦稅的批准權是難得到承認的，實行則更不易了。就是到了召集會議的時候，諸侯們照例佔大多數，因為騎士和僧侶是兩個免除賦稅而且分沾餘潤的等級。諸侯們貨幣的需要，隨着奢靡、宮廷和常備軍以及政費之擴大而與日俱增。賦稅成爲有加無已的壓迫。城市在許多場合受着特權（*Privileg*）的保護，所以賦稅

的全部重擔落到農民身上，不論是諸侯本身下（隸屬）之農民，或是諸侯家臣的騎士下（隸屬）之農奴和奴隸，都是一樣；在直接稅不修用的地方，間接稅就採用了；財政上厲行竭澤而漁的方法以填滿國庫的漏卮。當無計可施的時候，當無物可以典押和無自由帝國城市允許放債的時候，或鑄造最劣的貨幣，或濫發最賤的貨幣，或專為諸侯的便宜而抬高或降低法定貨幣的價格。出賣城市的和其他特權以後，不久又用暴力奪回，以達重行出賣之目的；和利用每次反抗企圖以為口實，乘機縱火搶掠等等，都是當時諸侯在收入上不竭的和通常的來源。法庭也是諸侯經常的和不可輕視的出賣工具。總而言之：除了「受」諸侯（剝削）以外，還須滿足各種官吏懲罰的人民，已經齊備了「父權」制度（*Fatherly System*）的味道。

從中世紀封建的階層出來之中等騎士，幾乎完全絕跡，他們不是上升到小諸侯獨立中的地位，便是降落到下等貴族的隊伍。這些下等貴族，即騎士，很快的走向滅亡。其中一大部分已經變成貧困，靠着紳諸侯們奔走為生，或治軍事，或在

文官，其他一部分成了諸侯統治下的家臣；另外更小的一部分則直接隸屬於帝國。軍事科學的發達，步兵重要性的增大，槍砲用途的推廣，減輕了騎士在軍事上視為重騎兵的重要，同時也破壞了其城堡的天險。這些騎士，因為工業進步成為贅瘤，恰如手工工人由於工業進步成了贅瘤一樣。騎士愈追需要貨幣更加緊他們的滅亡。城堡內的奢侈生活、競技、宴會的爭尙繁華，武器和戰馬的價格，都是隨着文明進步而增加；反之，騎士和勳爵收入的來源，如果說到增加的話，那也增加得不多。封地常受潛伏着的劫掠和焚燒，以及類似的高貴職業，都一天天危險起來。騎士（支配下）的人民之供給賦稅，比從前更難。這些尊貴的主人為滿足日進不已的要求，便採用諸侯所實行的相同手段；農民就年年受這些主人更巧妙的掠奪了。農奴（的血脈）榨乾了。奴隸在一切可能的機會負擔各種各色的新租稅。徭役呵，欠款呵，地租呵，田契稅呵，死亡稅呵，保護金呵，以及這一類的名目，不管舊時的契約（怎樣），都是任意增加的。法庭拒絕（人民的陳訴），或者出賣（案件）以得金錢；在騎士不能從農民手中搜刮貨幣的地方，則

不惜把農民下獄，強迫他交納贖金。

下等貴族同其他各階級沒有結成友誼關係。家臣的騎士拚命想做帝國（直轄）的家臣；帝國（直轄）的家臣拚命想得到獨立。這種情形弄得與諸侯不斷的衝突。當時這些聲威顯赫的僧侶，在騎士們看來，完全是無用的階級。騎士貪婪僧侶們由獨身生活和教會制度保持的大產業和財富。騎士對於諸城市是經常相持在敵視上；他欠城市的借款，他靠着掠取城市的領土養活，靠着剝奪城市的商人養活，靠着勒索在衝突中所捕俘虜的贖金養活。騎士愈把金錢問題看成生死問題的時候，其反對這些等級的鬥爭亦愈加激烈。

代表中世紀封建制度意識的僧侶，也深刻的感受到歷史轉變的影響。印刷術的發明和擴大商業的需要，不僅打破了僧侶讀書識字的壟斷，而且打破了僧侶高等教育的壟斷。勞動分功也應用到知識領域內來。新起的法律家階級驅逐僧侶離開各種很有勢力的地位。僧侶從此大半變成無用了，而且他由日益怠惰和日益愚昧之中認識這種事實。因為僧侶用盡各種手段來增殖其過度的財富，他愈變成無

用，他的數量就愈多。

僧侶分成兩個不同的集團。僧侶中之封建的教權階層，形成貴族的集團——僧正、大僧正、僧院長、方丈和其他主教。這些高等教會官長或者其自身即是帝國諸侯，或者像其他諸侯的家臣一樣，管轄包含無數農奴和奴隸的廣大領土。他們不照像騎士和諸侯一樣的殘酷以榨取人民，而且實行起來，更達到可恥的情況。他們不僅用殘忍的暴力，而且同樣用宗教的一切陰謀；不僅用拷打的威嚇，而且用逐出教會或拒絕赦罪的威嚇；他們為從人民身上抽取最後的一文錢計，為增加教會的產業計，用盡一切悔罪的譴誦伎倆。在那些取得人民封建的賦課、租稅、什一稅，還常常需要貨幣的交帶者之手中，偽造文書是盛行的和受用的剝削手段，製造誕生奇蹟的聖徒之肖像和遺物，組織解脫罪惡的祈禱所，販賣赦罪符^①，都用來從人民身上榨取更多的金錢。所有這些（方法），施行很久，並且得

① 赦罪符 (Indulgence) 一類聖品證。

到不少的成功。

這些主教們和僧兵——這些僧兵因為政治和宗教的壓迫加緊而日益加多——不僅是人民痛恨的對象，並且是貴族痛恨的對象。直接隸屬於帝國的主教是對象諸侯有妨害的，肥滿的僧正、僧院長和他們的僧兵之放蕩生活，激起貴族之嫉視和負擔租稅的人民之憤怒。這些痛恨因僧侶的行動和其說教相反而益加深。

僧侶中之平民的集團，包括農村和城市的傳教師，這些傳教師立於教會封建的教權階層之外，不能分享教會的財富。他們的活動與營房內僧兵的警察勤務比較起來，管理是鬆懈得多；這些活動對於教會雖然重要，但在當時卻不像僧兵勤務之必不可缺。所以，他們的報酬比不上僧兵，他們的俸給就說不上什麼贏餘了；他們由中等階級或平民出身，較接近羣衆生活，雖然他們的地位仍是僧侶，却能得到中等階級和平民的同情。在僧兵參加當時的運動是例外的時候，而傳教師參加運動却是通常的。他們曾供給這種運動以許多理論家和空想家，而他們之中為平民和農民的代死於斷頭台上者為數更不少。因此，羣衆對於僧侶的痛

恨，很少涉到這一集團。

教皇對於高等和下等僧侶，正像皇帝對於諸侯和貴族一樣。皇帝享受「共同貢賦」(Common penny)，即帝國稅；同樣，教皇享受一般的教會稅，華麗的羅馬宮殿之各項耗費亦從教會稅開支。因為德意志的僧侶人多勢大，所以徵收教會稅再沒有一個國家像德意志那樣的熱心和嚴格。當僧職將要退休的時候，年俸是特別苛刻收集的。隨着宮殿耗費的擴大，增加歲入的新花樣，如販賣聖骨和赦罪符，收集祝賀金等都發明了。所以鉅額的貨幣年年由德意志輸送到羅馬；所加重的壓迫，不僅煽動對於僧侶的痛恨，而且激怒民族的感情，特別激怒當時最富民族性的貴族。

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從中世紀原來的市民內面，產生了三個不同的集團。

城市人民以開闢之家爲首，即所謂「名門望族」(honourable)。這是最富裕的家庭。他們包攬議會，掌握一切城市官職。他們不僅管理城市中一切收入，而且消費這些收入。他們饒有財富及其古代貴族地位，是經帝王和帝國承

認的，他們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剝削城市公社，同樣剝削屬於城市的農民，他們以穀物和貨幣放高利貸；他們爲自己而剝削一切；他們從公社奪取森林和牧場的 استخدام權；爲自己的私利而使用這些東西。他們抽收路捐、橋捐、門捐和其他賦稅；他們出賣經商權、行會特權、師傅權、市民權；他們出賣法庭裁判。他們待遇城市領域內的農民並不比貴族和僧侶寬厚。正是相反，大半從閥閱之家出身的城市行政官和徵收吏，在收集賦稅的時候，就把官僚主義的嚴格性帶入鄉村，而且和貴族的刻薄及貪婪混成一氣。這樣搜刮來的城市收入，又極隨意處理；城市簿記到了草率 and 紊亂的極點；吞騙款項和現金短少成了家常便飯。只要有人想到一八四八年彰明較著的許多城市行政機關種種吞騙詐欺情形，那麼，這些被各種特權包圍而且以家庭紐帶和共同利益緊密聯繫的較小的等級（*estate*），從城市收入中，肥私致富，這是如何容易明白的一回事呵。

閥閱之家曾注意到停止各城市公社的權利，特別是關於財政上的權利。後來，當縉紳們的勒索得太過火的時候，這些公社就開始運動，至少要把城市行政

權拿到自己手中。大多數城市裡，他們實際上已恢復自己的權利了；但是，一方面，因為行會相互間不斷的爭鬥，另一方面，因為閹閹之家的堅持和受了帝國及同盟的諸城市政府之保護，閹閹之家的議會議員馬上用狡計和暴力取得議會中的優勢。十六世紀初葉，一切城市公社又重行退到反對派的地位。

反抗閹閹之家的城市反對派分成兩派，這兩派在農民戰爭的過程中顯露得很明白。

中等階級反對派，是現代自由主義者之先驅，包括富裕的中等階級，溫和的中等階級，以及按照地方情形多少有點差異的較貧分子。這種反對派要求經過公計大會或代表（總會、城市委員會），去管理城市行政和參預立法權。更進一步則要求修正優待少數家庭之貴族政策，這些少數家庭在閹閹之家的集團中享受特殊的地位。此外，中等階級反對派又要求選派自己集團的公民出席議會。由各處貧乏的閹閹之家不滿意的分子所聯合起來之黨派，在公社一切常會中，在行會中，已有了大多數。議會的依附者和更急進的反對派聯合起來，在真正公民中只佔少

數。

在十六世紀運動過程中，我們將看見這些溫和的、「守法的」、幸運的以及聰明的反對派，像他的繼承者——立憲黨在一八四八到一八四九年的運動中一樣，恰恰扮演相同的角色，恰恰得到相同的成功。中等階級反對派還有另一種熱烈反對的對象：即過放蕩生活和有奢侈習慣使人深惡痛絕的僧侶。中等階級反對派要求制裁這些貴人的卑污行動；要求廢止僧侶的內部裁判權和免稅權；要求限制僧兵的人數。

平民反對派包括中等階級破產的分子和無公民權利的城市居民羣衆；如手工業工人、日工和流氓無產階級各種萌芽；這種萌芽在城市生活發展的最低階級最能遇見。一般說來，這種下層無產階級在過去社會一切階段中都能看出幾分發展的形式。沒有一定職業和固定住所的人民，當時由於封建社會的崩潰而漸漸增加起來，在社會中的各種職業，各種生活區域，都爲享特權者所蠶食。十六世紀前半期，無家可歸的人，在近代國家中只有德國最多。這些漂泊者，一部分在職

時從軍，一部分沿途行乞，另一部分則到未加入行會組織的工業部門中去做日工糊口。這三個集團在農民戰爭中所從事的任務：第一種人加入諸侯軍隊，這種軍隊是征服農民的；第二種人跑到農民秘密結社和農軍中；他們墮落的影響隨時表現出來；第三種人則參加城市黨派的爭鬥。但是我們應該牢記着：這個階級的大部分，即住在城市的大部分，依然保存有農民性質顯著的基礎，並未發展到近代開化的流氓無產階級所獨有的貧利和卑賤的地步。

很明顯的，城市平民反對派具有複雜的性質。它是由舊封建和行會社會破產的分子和近代資產階級社會之萌芽的無產階級分子結合而成的；一方面是貧困的行會公民，因他們享有特權，所以還是依附現時中等階級的秩序；另一方面，是從農村逃出的農民和解僱的走卒，他們尚未成爲無產階級。介在這兩集團之間的是手工業工人，目下已擠出公共社會之外，在當時工業和行會特權之下，降到無產階級的生活標準是可能的；但是，因爲這同一特權之故，也許成爲未來的中等階級手工業主人。從這種混合物結合的黨派，自然是動搖不定，而且各個地方不

同。農民戰爭以前，平民反對派在政治鬥爭中的表現，不像一個黨派，而是做了中等階級反對派——爲小利出賣自己的叛徒——的搖旗吶喊，貪得無厭的尾巴。農民暴動把他們變成一個黨派，甚至當時他們在要求和行動兩方面，幾乎到處都是依靠農民，——顯明的事實證據，是當時的城市依靠鄉村。到了平民反對派獨立行動的時候，他們便要求擴大城市對鄉村區域的商業特權，而且（不）顧城市收入，因廢止屬於城市的鄉村之封建負擔而縮減。簡單說一句：他們一有了獨立的表現，就變成反骨了。平民反對派屈服於他自己的中等階級分子之下，他們對於最近三年在民主主義招牌之下，所演一齣近代小資產階級舞台上的悲喜劇，作了特殊的序幕。

僅僅在喬林基(Chernigov)和其他少數地方，由於總騷亂之故，使城市平民派達到如此地步，就是在一個短時期內，萌芽的無產階級分子有勝過運動中其他

● 英譯本在這句有錯誤，其意義恰與俄日譯本相反，茲從俄日譯本改正。

一切分子的優勢。這種情形的發生在喬林基是在孟彩爾 (Muenner) 直接影響之下，其他地方則在孟彩爾的弟子們影響之下。形成全部農民戰爭的頂點，和團結在孟彩爾偉大人物周圍之歷史斷片，不過是曇花一現。這些分子何以比其他分子失敗得快，他們的運動何以染了空言幻想的色彩，他們要求的表現何以必然是極端模糊，這是容易了解的。在當時實際情形之下，得到極小固定地盤的是這個集團。

一切階級的基础，——除了平民反對派以外——是立於大多數被剝削民衆即農民之上的。載着社會一切階層的重擔者是農民，這些階層就是諸侯、官吏、貴族、僧侶、國閣之家和中等階級。無論農民是隸屬於諸侯、帝國勳爵、僧正、僧院、或（隸屬於）城市，他在各處都被當成牛馬，或比牛馬更壞的東西看待。如舉他是農奴，那他要完全聽從其主人的驅策。如果他是奴隸，由契約所規定之法律的束縛就可完全壓倒他；甚至這些束縛一天天加重。他們大部分時間，消磨在其主人的產業上面。從他不多的自由時間之內所得到的東西，又要拿出來繳納什

一稅、欠款、地租、戰爭稅、土地稅、帝國稅和其他開支。他不支付主人的錢，不僅不能結婚，並且想死也死不了。除了這些正規的賦役之外，他不得不替其主人收集乾草、摘毒、採糖、收集犛牛殼、打獵、砍樹等等。釣魚和打獵屬於主人。農民睜開眼睛看着自己的收成受野獸踐踏。農民的公共牧場和森林幾乎到處被其主人強迫沒收。而且主人可照處理農民財產的方法，更糟踏到農民的本身和他的妻女。主人有初夜權（the right of the first night）。無論何時，他可任意把農民投之獄中，在獄內拷問農民正和現在預審法官拷問犯人一樣。無論何時，他可撲殺農民，或者把農民斬首。加洛林納（Carolina）（註釋II）法典各章中，指出「割耳」、「割鼻」、「挖眼」、「斷指」、「斬首」、「車裂」、「禁燒」、「夾火鉗」、「砍四塊」等等，沒有一項不被「仁慈」的貴族和主人任意實行。誰能保護農民呢？法庭被動靜，僧侶、閹割之家或法律家坐滿了，他們深知自己爲什麼而享受薪俸。帝國的一切官吏是不啻糜農民血液的呵。

雖說農民在可怕的壓迫之下被煽動了，然而要懲惡他們暴動却不容易。因爲

散居各地，想使他們得到一個共同的了解極感困難；世代相傳的服從習慣，在許多地方缺乏武器使用的練習，剝削程度的深淺視其主人之個性而異，凡此一切使農民安靜了。因這些緣故，雖然中世紀曾有過廣大農民的地方暴動，可是——至少在德國——在農民戰爭以前，沒有看到全國的農民暴動。況且，農民與諸侯，貴族和城市有組織的權力對峙，不能單獨起來革命。只有與其他階級聯合，農民才有勝利的機會，但是，當他們被其他一切階級同等榨取的時候，如何能和其他階級聯合呢？

十六世紀初葉，帝國各種不同的集團——即諸侯、貴族、僧侶、閥閱之家、中等階級、平民和農民，構成最複雜的羣衆，他們有極端艱難而且相互交錯的要求。每一集團妨害其他集團，而且繼續和其他集團明爭暗鬥。在這種情形之下，全民族要分裂成兩大營壘，像法國第一次革命爆發時一樣，像目前最進步的國家表現在發展的較高階段一樣，那就完全不可能了。只有被其他一切（階層）剝削的最下層人民——即平民和農民，起了騷亂的時候，才會發生這樣類似的區

分；我們如果記得最近兩年在一個不十分複雜的，而且只包括封建的貴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和無產階級的社會，所發生的混亂，那麼，當時利益、見解和企圖的複雜，就容易明白了。

第二章 農民戰爭中的各種反對派及其領袖

形形色色的集團要聯合而成較大的單位，在當時却不可能，這是由於地方分權，地方和省的獨立，各省工商業的彼此絕緣，交通工具的落後之故。這種聯合在宗教改革(Reformation)的進程中，僅僅隨着革命、宗教、政治的思想之一般的傳播而發展。贊成或反對這些思想的各種人民集團，很迂緩的而且只是相當的把國民集中到三大營壘：即反動的或天主教的(Catholic)〔營壘〕，中等階級改良派的或路德的(Lutheran)〔營壘〕和革命分子的〔營壘〕。如果我們在國民的大部分中發現其不合邏輯，如果第一第二兩個營壘內包含一部分相同分子，這是由於中世紀傳來正式的聯合之大部分已開始渙散而不集中，這樣的環境使在不同的地方那些相同的集團，暫時走向相反的方向。近來幾年，我們在德國常常遇見相同的事實，所以在十六世紀更複雜的情形下面，看見這些集團和各階級之

顯明的混合物，我們就用不着驚異了。

雖我們有近代的經驗，然以德意志現在的思想，去看中世紀已經完結的鬥爭，那不過是激烈的神學上的爭論而已。如果當時的人僅能涉及關於天空事物的學問，如我們愛國主義的歷史家和聰明的政治家所說，那就沒有任何理由來爭論人間一切事物了。這些思想家承認一切幻想——某一個時代自身所有的幻想或某一個時代的思想家對那個時代所持的幻想——的表面價值已够受騙了，從前認為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不過是狂熱的討論立憲君主制度優於專制君主制的那一班人，必致認為七月革命是神授君權不能維持的實際爭論，二月革命是解決共和制和君主制問題的一種嘗試等等。●在這些大事變中所職出的是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每次寫在階級鬥爭旗幟上的政治口號，也是其唯一的表現。到了現

● 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即法國大革命，七月革命即法國一八三〇年的革命，二月革命即法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

在，各種階級鬥爭的明白表示，不僅從外國聽得很多，即從本國成千成萬的無產階級之不平 and 憤怒中也聽得很多，而我們的思想家却沒有這種概念。

十六世紀所謂宗教戰爭 (Religious Wars)，即現實的物質的階級利益之活動，而且這些戰爭正如英國和法國晚近的衝突一樣，都是階級戰爭。如果當時的階級鬥爭戴着宗教的面具，如果各種階級所要求的利益隱蔽在宗教的盾牌之下。這是沒有改變實際的狀況，並且可用當時的情形來解釋。

中世紀是從粗野的原始時期發展而來，它爲從事刷新一切計，掃除了古代的文化、古代的哲學、政治學、法律學。它從古代破碎的世界保留下來唯一的東西是基督教和許多半已荒廢而失掉文明的城市。結果，僧侶得到知識教育的壟斷——在每個原始發展階段中所看見的現象——以及教育本身滲透了神學的特質。

在僧侶掌握中的政治學、法律學，和其餘的科學一樣，成了神學的支幹，按照神學上流行的原則去處理。教會的教條同時是政治學的原理；聖經的詞句在各法庭有法律的效力。甚至法律家成爲特別階級以後，法律學依然留在神學保護之

下，神學在知識活動領域內的最高特權，是從當時教會地位（「生出來」）之必然的結果。而這種教會地位則為贊助和承認現存封建統治下之總的力量。

很明顯，在這樣情形之下，要向封建制度作總的公開的攻擊。首先要向教會攻擊；那麼，一切革命的社會的政治的理論必定成了神學的異端（Theological heresies）。為使現存社會關係受攻擊起見，就不得不剝奪其神聖的光輪。

封建制度的革命反對派活躍於整個中世紀。按照時代的情形，或以禱為公開異端之神秘的形式表現，或以武裝暴動的表式表現，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者與神秘說（Mysticism）之不可分離，為我們所深知。孟彩爾本身從神秘說中亦大有所得。這些異端〔有種種形式〕，一部分是家長政治的亞爾品（Alpine）牧人反抗封建制度侵入自己領域的表現（瓦爾登斯 Waldenses 宗派）（*見釋*），一部分是城市封建制度的反對派，那些城市〔發展〕已超過了封建制度（亞爾比根 Albigensians 派、伯利度 Arnold von Brescia 等宗派），一部分是農民的直接暴動（約翰·巴爾 John Ball 宗派。匈牙利人在披加德 Picardy 地方之首領）。

瓦登斯宗派家長政治的異端，像瑞士的暴動一樣，其形式內容兩方面，都是一種抵抗歷史發展潮流的反動企圖和單純的地方意義，在這一方面，我們可把它從略。在中世紀異端的其他兩個形式中，我們即可看出十二世紀中等階級及農民平民反對派之間大分裂的先兆，這種分裂使農民戰爭歸於失敗。到中世紀末葉，這種分裂是很清楚的。

城市的異端——中世紀實際的公共的異端——主要的是直接反對僧侶，他們攻擊僧侶的財富及其政治地位。中世紀中等階級和現時資產階級一樣，資產階級要求一個廉價的政府（Cheap government），中等階級則首先要求一個廉價的教會（Cheap church）。中等階級的異端要求恢復古代簡單的教會制度和廢止獨佔的信仰階級。這與那些把教會和教條的前進發展看為退化的一切異端一樣，形式上是反動的。廉價的整理是要撤消僧侶、主教、羅馬宮殿，簡單一句話，是要撤消為教會所浪費的一切。在攻擊教皇職位中，諸城市——雖然在君主保護之下，其本身仍是共和制——第一次在一般形式上表示這種理想，認為資產階級政

府的模範形式是共和制。他們對於許多教條和教會法律的對敵，一部分由前述情形說明，一部分由他們的環境說明。他們反對獨身制度(Celibacy)如此激烈的理由，沒有一人比波加休(Bocaccio)①解釋得更清楚。意大利和德意志的亞諾爾·封·伯利爾(註釋四)，南法蘭西的亞爾比根(註釋五)，英格蘭的約翰·烏克里夫(John Wycliffe)(註釋六)，博西米(Bohemia)的胡斯(Huss)(註釋七)，和加里克廷(Calixtines)(註釋八)，都是這個反對派的主要代表。如果我們記着當時諸城市已經取得這樣一個十分有力的地位，即能用武力或城市議會去反對世俗封建制度及其特權，那麼，反對封建制度的反對派只表現為反對宗教封建制度的反對派，這是容易明白的一件事。

在這裏，像南法蘭西、英格蘭和博西米一樣，我們看出下級貴族(之大部分)②在反對僧侶及異端的鬥爭中，和城市握手；這種現象由於下級貴族倚靠城市的風俗。

① Bocaccio 一二一五——一三七年，他在所著十日談中，以深刻的筆鋒描寫牧師僧侶的風俗。

② 「之大部分」四字，照俄日兩譯本加入的。

市以及雙方對於諸侯和主教有同一利害關係。這種相同的現象在農民戰爭中亦可看到。

另一種異端——它是農民和平民要求之直接的表現並且幾乎常常與暴動有聯繫的——則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這種異端分損了中等階級的異端關於僧侶、教皇職位以及恢復古代基督教組織之一切要求，同時超過這些要求的範圍前進。他們要求在教會成員之間恢復古代基督教的平等關係，這一點由中等階級社會看來也是認為常例的。從上帝之子的平等推及公民的平等和一部分財產的平等。使貴族與農民平等，使閭閻之家和有特權的中等階級與平民平等，廢止農奴制、地租、賦稅、特權以及最顯著的差別——這些要求都有幾分明確的提出，而且視為必然是從古代基督教義出發的。這種農民和平民的異端，在封建制度極盛時期，即是說，在亞爾比根宗派之中，不易與中等階級反對派區別，到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的過程中，發展了十分確定的黨派觀念，這種觀念於中等階級的異端之外獨立的表現出來。在英格蘭和烏克里夫運動並起的瓦特·迪勒 (Wat Tyler) 暴動之說教

者——約翰·巴爾的情形是如此。在博西米和加里克廷並起的達波奈特 (Taborites) (註八) 派的情形亦是如此。達波奈特派在神權政治色彩之下，甚至暴露了共和主義的傾向；這種觀念，後來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初葉又為德意志平民之代表者所發展。

加入這種異端形式之內的有神秘派 (Mystic Sects) ——例如鞭管派 (Scourging Friars) (註九)，洛拉德派 (Lollards) (註十) ——的幻夢 (Dream Visions) 這些神秘派在窮迫時期繼承革命的傳統。

當時的平民是站在現存的公共社會之外的唯一階級，他們站在封建組織之外，同樣也站在中等階級組織之外。他們既沒有特權，又沒有財產；就連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一樣的所有權都剝奪了，却要負擔與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同等的苛捐雜稅；一切財產和權利剝奪無餘；甚至在與現存制度沒有直接關係的狀況之下過活，現存制度完全不理解他們。他們是封建的和行會的中等階級社會瓦解之活的象徵，同時是近代資產階級社會之最初的先驅者。

當時平民反對派何以不能只以反對封建制度及享有特權的中等階級爲滿足；何以當時一開始即跳越——至少在空想上——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範圍；何以因爲是一個絕對無產的集團就懷疑建築於階級劃分之一上的一切社會共同的制度、見解、概念；這些問題可從上述平民的地位得着充分的解釋。古代基督教千載太平的幻夢（Chiliasic dream-visions）（註釋十一）在這方面提供有益的出發點。另一方面，這種不僅超越現在而且超越未來的境界，必定成爲狂暴的空想。在第一次實際應用時，它自然要退到爲當時情形所許可的狹隘範圍內。攻擊私有財產，要求財產公有，不得不化爲淺薄的慈善組織；渺茫的基督教平等，只歸結到法律之前的公民平等，廢止一切官廳的權力，最後變爲組織由人民選舉的共和政府。人類幻想中共產主義的預期在實際上成了近代資產階級環境的預期。

歷史發展未來階段之這種預期——其本身雖是必然的，却是平民集團的生活條件之自然的結果——首先在德國，就在杜瑪斯·孟彩爾教義中及其黨派中可以看到。達波奈特派曾指示過一種千載太平的財產共有，不過是純粹的軍事方

法。只有在孟彩爾教義中，這些共產主義的觀念才看成現實社會一部分意欲的表現。這些共產主義的觀念經過孟彩爾才形成較確定的解釋，以後在人民的每次大騷亂中都發現出來，一直到漸漸和近代無產階級運動融成一片。這與中世紀自由農民反抗日益加強的封建統治的鬥爭和農奴及奴隸爲完全廢止封建制度而鬥爭之融成一片，有些相同。

三大營壘中的第一個是保守的天主教營壘，包括因維持現存的帝國權力而得利益之一切分子，即教權的諸侯，世俗的諸侯^①之一部分，富裕的貴族、主教、城市閥閱之家。集合在中等階級溫和的路得派宗教改革旗幟之下的是反對派中一切有產分子，下級貴族的羣衆，中等階級，甚至有世俗的諸侯之一部分，這些諸侯是藉沒收教會產業以謀發財，並且抓取機會脫離帝國以謀較大的獨立的。至於那些農民和平民則集合到革命的黨派之周圍，這個黨派的要求和理論在孟彩爾

● 世俗的諸侯，即非教權的諸侯。

「的工作」中最鮮明的表現出來。

路得（註釋十二）和孟彩爾，就其教義、特質及行動上說，都恰與各人黨派的主義合成一體。

路得在一五一七到一五二五年之間，像一八四六到一八四九年之間的德國立憲黨人一樣，經過相同等的轉變。一切中等階級政黨都是如此，有一瞬間立於運動的陣前，以後便受平民無產階級的黨派從後哨上逼迫而一蹶不振了。

在一五一七年反對天主教會的教條和組織由路得開始號召起來的時候，這種反對依然沒有明確的性質。（固然）沒有超過從前中等階級的異端之要求，（同時）也不排斥任何前道思潮的傾向。這種反對不能這樣「表現明確的性質」，就因為鬥爭時最初一瞬間，要求聯合一切反對的分子，用最喜挑戰的革命力量，代表反對天主教正統的現存各種異端之全體。同樣，一八四七年的德國自由資產階級仍是革命的。他們自命為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他們討論工人階級解放問題。路得之頑梗的農民性質，在其活動的第一個時期，表現了自己狂暴的態

度。『如果（羅馬教徒的）憤怒狂繼續下去，我以為除了國王和諸侯採用暴力，武裝自己，討伐這些流毒於全世界的惡漢，並且不用口舌而用武器，一舉致其死命之外，沒有更好的計劃和藥方去對付他們。如果我們是用刀劍懲治盜賊，用絞索懲治殺人者，用烈火懲治崇信異端之人，那麼，為什麼不舉起武器去懲治那一切墮落的兇惡的教徒——教皇、僧正、大主教、羅馬梭當（Roman Sodom）的全部隊伍呢？為什麼不用他們的血液來洗我們的手呢？』

這種革命的熱情不是持久的。由路得放出的電光引起了燎原之火。普遍全國的運動就活躍起來。在他反對僧侶的檄文中，在他關於基督教自由的說教中，農民和平民認識了暴動的信號。同樣，溫和的中等階級及下級貴族的大部分和他聯合了，甚至諸侯們也捲入這個潮流。前者相信對於一切壓迫者復仇之日期已到，而後者却只願打破僧侶的權力，打破羅馬的羈絆，打破天主教的教權階層，和藉沒收教會產業以謀發財而已。各黨派都彼此分裂了，而且各有不同的代表人。路得不得不在這二者之中選擇其一。路得——薩克森（Saxony）選舉人的寵兒，

不久才獲得威望的威頓堡 (Wittenberg) 有名教授，受着逢迎趨附之徒共同擁戴的偉大人物——是不躊躇片刻的。他拋棄了運動中的平民分子，降為中等階級，貴族和諸侯的恩從。馴滅羅馬的呼聲再聽不着了。路得現在正鼓吹平和的前進和消極的抵抗。(參照一五二〇年告德意志國民之貴族書等等) 胡頓 (Huten) 招請路得到葉伯爾堡 (The Castle of Ebern) ——貴族反對僧侶和諸侯的陰謀之中心地——去見他和西鑑根 (Sickinden) 時，路得回答說：『余不願看見福音受暴力和流血的擁護。』世界是用聖經克服的，教會是用聖經維持的，教會將藉聖經而恢復它的地位，而且因為反基督教者不用暴力得到權勢，所以不用暴力他也將下台。

由於心理這樣的轉變，或更正確些說，由於路得政策這樣明確的說明，發生了在制度和教條上是維持抑或改革的做買賣之政策，發生了可恥的外交、讓步、

除謀、妥協，這種結果是奧格斯堡口供（Augsburg Confession）（共編十二），是改良的中等階級教會制度的最後草案，近來德國的國民會議，統一會議，改訂議會及愛爾佛特（Erfurt）國會，不過是同樣的小買賣重演於政治範圍內惹人厭罷了。官樣的宗教改革之庸俗的中等階級的特性，在這些談判中，表現得最清楚。

現在成爲中等階級改良派公認的代表者——路得爾意鼓吹合法的前進，是有確實理由的。城市的羣衆既站到溫和的改良派方面；下等貴族又漸漸依附它；諸侯的一部分與它聯合，另一部分則左右動搖。成功是幾乎無疑的，至少在德意志大部分（是如此）。在不斷的和平發展情形之下，其他地域畢竟不能抗拒溫和的反對派之壓迫。另一方面，強暴的激動注定了溫和派和極端平民及農民黨派間的衝突；於是諸侯、貴族和許多城市都與這運動脫離，而剩下任其選擇的「有兩條出路」，不是中等階級黨派被農民和平民推倒，就是全部運動毀於天主教復辟之中。中等階級黨派在獲得最微的勝利以後，如何用合法的前進之手段，企圖操縱

於革命派的斯西拉（Styllis）和復辟派的加列勃底（Charvbidis）之間，我們從近時的事件得到充分的佐證。

在當時流行的社會和政治情形之下，一切變化的結果，自然都是有利於諸侯，而且是增進其權力的。中等階級改良派自與平民及農民分子分離之後，漸漸落到改良派諸侯控制之下。路得對於諸侯益發卑躬屈節了，當人民責罵路得已像他人一樣爲諸侯服役的時候，當人民在阿拉露德（Orannende）投石追逐路得的時候，他們自己是深知道要幹些什麼的。

到了農民戰爭已經爆發，且在天主教的貴族和諸侯的地方更佔優勢的時候，路得則立於和解的地位。他決定攻擊政府。他說由於政府壓制引起農民暴動，不僅農民反對政府，上帝也同樣的反對政府。另一方面，他又說，暴動是褻瀆上帝的而且反對福音。他勸告雙方讓步，求選和平的諒解。

雖有這些真誠的和解之企圖，然而暴動却迅速的蔓延到大的區域，爲路得敬派的諸侯、貴族和城市所管轄的地方都捲進去，而且轉瞬之間，凌駕於中等階級

「慎重的」改良派之上。由孟彩爾領導的暴動者之中最堅決的一部分，在路得最密邇之區，路得林林展開了大本營。接着更得到一些勝利，德意志快要烽火漫天了，路得也將被包圍，或將像一個叛徒而受刺殺了；中等階級改良派將被農民和平民革命的洪流沖去。再沒有慎重的時間了。在革命的面前，一切宿怨深仇都忘却了。羅馬梭當的僕役，和農民的隊伍比較起來，簡直是馴服的羔羊，是上帝溫順和弱的孩子。市民、諸侯、貴族、僧侶、路得、教皇，都結成「反對殺人搶劫的農民隊伍」的同盟。路得高叫：「無論是誰，只要他力所能及，都應該秘密的、公開的，把農民隊伍打得粉碎，或用繩絞，或用刀刺，要像我們撲殺瘋狗一樣！所以，親愛的紳士們，要到處任意刺殺他們，擊斃他們，絞死他們；萬一不幸你死了，你受上帝福祐；你決得不着比這更光榮的死，」對於農民是不能發假慈悲的。「誰憐惜那些為上帝所不憐惜的人，為上帝所願意懲罰的和毀滅的人，誰就置身叛徒之列。」後來，他說，農民在為使平安享受別頭牛不得不捐棄這頭牛的時候，才知道感謝上帝。經過革命——他說——諸侯才知道叛徒的精神只能

用暴力統治。「智者說：吃草，負重，挨鞭者驢也（Cibus onus et virgam asino）。農民的頭腦充滿了秕糠。他們不信聖經，他們麻木不仁，所以他們必須聽鞭聲和槍聲，而且這是唯一的合理的。我們必須爲他們祈禱使他們服從。他們不服從，就不應該享受慈愛。讓槍聲驚擾他們一下吧！否則他們將要幹出千百倍的壞事。」

三月「革命」●以後，當無產階級要求分享勝利之果時，我們近代社會主義者和博愛的資產階級都用過這些相同的詞句。

路得給了平民運動一個有力的武器——聖經譯本。他透過聖經把第一世紀中層的基督教和當時封建的基督教對照起來。他舉起另一個沒有分歧的和人爲的封建階層的社會之繪畫和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對照起來。農民曾經利用這個武器反對諾侯、貴族和僧侶的暴力。現在路得則掉轉這個同一的武器來反對農民，從聖

經上摘引真正的讚美歌獻於由上帝所建立的權威之前——這是任何專制君主的臣僕所難勝過的功績。神授的君權，忍耐的忠順，甚至農奴制度，都由聖經批准了。因此，路得不僅否認了農民暴動，甚至連自己反對宗教和世俗的權威都否認了。他不僅向諸侯出賣了人民運動，而且連中等階級運動也同樣出賣了。

難道還需要敘述其他的有產者近來否認他們自己過去的實例嗎？

現在讓我們將平民革命家——孟彩爾和中等階級改良主義者——路得比較一下。

杜瑪斯·孟彩爾在一四九八年生於哈志(Harz)的史托爾堡(Stolberg)。聽說他的父親死在斷頭台上，做了史托爾堡伯爵淫威之下的犧牲品。孟彩爾年十五歲，在哈勒(Halle)學校，一般說來，會組織反對奧格得堡(Magdeburg)大僧正和羅馬教會的秘密結社。他在當時神學上的造詣，使他早得博士學位和哈勒尼庵副牧師之職。他在這裏即十分蔑視教會的教條和儀式，當冥祭時，他省去化體(Transubstantiation)之語不用，且是——照路得的話——不敬的吃了

全能之神。中世紀的神秘主義，特別是加拉勃利亞的約瑟西（Joachim of Calabria）（註釋上卷）之二十年說（Chilistic Works），是他研究的主要科目。照蓋彩繪看來，在當時宗教改革和一股擾亂的形式上，似乎像神秘主義所宣管和描寫的千載太平（Millenium）及對於墮落的教會和污濁的世界之末日審判（The day of judgment）已經快來了。他向鄰近宣傳得到大的成功。在一五二〇年，他往芝威考（Zwickau）做第一個福音傳佈者。在那裏，他遇到夢想一千年派小組之一，這派散佈各處，在謙恭和分離的狀態後面，隱藏着最下社會階層對於現狀怒不可遏的反抗，而且隨着煽動的增漲，開始奔赴更勇敢更忍耐的前途。這是以尼古拉·斯托羅（Nicolas Storch）（註釋上卷）為首的再洗禮派（Anabaptists）再洗禮派傳佈末日審判和千載太平快要臨近，他們持有「幻影、激動和預言之

● 原案 聖餐禮，即天主教中領聖餐時的獻祭。

● 化禮即專為聖餐用的餅和酒變成基督血肉之說，一即「耶穌物化」。

精神」。他們馬上要同威考議會發生衝突。雖然孟彩爾不會無條件的和他們聯合，寧願把他們放到自己影響之下，可是他是幫助他們的。議會採取堅決的行動反對他們。他們被迫離開城市，孟彩爾和他們分離了。這是一五二一年年終之事。

當時他往波拉溝 (Prague)，企圖聯合胡斯派運動：(Husite movement) 的餘黨求得一個地盤。然而他的宣言却又使他必須離開博西米。一五二二年他在喬林基的亞爾特斯特 (Alstedt) 做傳教師。他在這裏開始改善禮拜儀式。甚至在路上尚未放胆去做之前，他已完全廢止拉丁語，並安排着全部聖經讀給人民聽，不以指定的禮拜日藉普書和使徒書信為限。同時，他在境內進行有組織的宣傳。從一千八百口雲的人民都來到他的周圍；不久，亞爾特斯特成了全部喬林基平民反對教會運動之中心。

當時的教會無論如何還是一個神學者。他把攻擊目標幾乎集中到僧侶身上。然而他決不主張寧靜的討論與和平的前進，像當時路得已經着手去做的一

樣，他却繼續踏得初期暴烈的說教，要求薩克森的諸侯和人民舉起武器反對羅馬僧侶。「我擔來的不是和平而是刀劍，說這句話的人不是基督麼？你（薩克森的諸侯）能用刀劍做什麼呢？你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你如果願意做上帝的僕役，你必須驅逐這個妨害福音的惡魔，並剿滅這個惡魔。基督很真誠的誥誡我們（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七節）：要把我們的敵人捉來，並且在我的面前把他們殺死。不要聽信虛言，認為不用我們刀劍之助，上帝的權力是能幹這件事的，果真如此，刀劍將在鞘中腐朽了。我們必要毀滅那些妨害上帝默示（Revelation）的東西，我們必要無情的去幹。像亨斯基亞（Hezekiah），賽洛斯（Cyrus），約瑟（Josiah），丹尼爾（Daniel）和葉里亞（Elias）毀滅巴爾（Baal）的僧侶一樣，不然，基督教決不能恢復它的本原。在果實成熟的時候，我們必要把上帝葡萄園內的雜草連根拔去。上帝在摩西（Moses）第五篇第七章中說：你不應該憐

們那些偶像崇拜者 你應該擊破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偶像，燒毀他們的偶像，這樣幹，我不得怒斥你。

但是對於諸侯們的這些請求是無益的，另一方面，在人民中革命的煽動則一天天高漲。孟彩爾——他的理想成了越堅定和越勇敢——現在就決然和中等階級改良主義告別了，同時就成爲一個指導政治的煽動家。

他的神學和哲學的理論，不僅攻擊了天主教的一切主要點，而且攻擊了基督敎的一切主要點。他在基督敎形式的大衣之下，傳佈一種汎神論(Pantheism)，這種汎神論酷似近代推論的思惟方法(Modern speculative mode of Contemplation)，而且有時甚至主張明白的無神論(Atheism)。他否認聖經是唯一確實的默示之說。唯一的活的默示——他說——是理性(reason)這是一切時代存在於一切人民之間的默示。把聖經和理性對立——他主張——是用文字毀滅精神，因爲聖經上所說的聖靈(Holy Spirit)不是我們身外之物，聖靈即是我們

● 這句英譯本有誤字。

的理性，信仰 (Faith)——他說——不過是理性在人身中的活躍，所以——他說——異教徒也能有信仰。透過信仰，透過活躍的理性，人就上帝化了，並且享受福祐——他說，天國 (Heaven) 是在生命之中尋求的，不是超越生命之外的，而且——按照孟彩爾 (的意見)，在地球上建立天國，即上帝的王國 (the Kingdom of God)，是信徒的任務。因為生命之外無天國——他說——所以生命之外無地獄，無永劫；而且除了人類的私慾和貪求外也無魔鬼 (Devils)，基督——他說——是像我們一樣的人，是預言者和教導者；他的「理經」 (Lord's Supper) 不過是紀念的簡單食品，麵包和酒加上了一點神秘之味被吞嚥着罷了。

孟彩爾大半是在變態之下傳佈這些理論，就是說，有些時候是在新的哲學所不得不利用的基督教口頭掩飾之下傳佈這些理論。然而基本的異端思想，在他的一切著作中容易辨別出來，很明白的這件聖經的大衣對於他實遠比不上對於近代黑格爾 (Hegel) 的許多門徒的重要。況且孟彩爾和近代哲學之間還隔着三百年。

孟彩爾的政治理論和其革命的宗教概念之聯系很密切。因為他的神學遠遠超越當時流行的概念之上，所以他的政治理論也超越現存社會和政治的條件。因為孟彩爾的宗教哲學接近無神論，所以他的政治綱領也接近共產主義，而且二月革命前夜的近代共產主義一派所持的理論武器，還趕不上十六世紀孟彩爾的豐富。他的綱領要求即時建設上帝的王國，就是即時建設預言的千載太平的王國於地球之上，與其說這個綱領是當時平民要求的總願，寧可說是為由平民中正在開始發展的無產階級分子解放條件之天才的預期。這個綱領是用恢復教會的本來面目和廢止與孟彩爾所想像的原始基督教——實際上即近代教會的理想——相衝突的一切制度來製成的。所謂上帝的王國，由孟彩爾看來，不過是沒有階級差別，沒有私有財產，沒有反對社會成員高高在上的國家權力之一種社會而已。一切現存的

● 恩格斯（1770—1831）是近代客觀唯心論哲學最偉大的代表，辯證法的鼻祖馬克思

、恩格斯的辯證法，就是利用他的辯證法，來加一番唯物科學的改造。

權威，在它們不依附和加入革命的限度內——他說——都必須被推倒，一切工作和一切財產必須共同分配，完全平等必須實行。在他的概念中，爲實現這個綱領，不僅要組織全德意志的人民同盟，並且要組織全基督教國的人民同盟。諸侯們和貴族們可吸引到同盟內，如果他們拒絕，這個同盟要當最初的時機，握住武器，推倒或殺死他們。

孟彩爾馬上努力從事組織同盟的工作。他的說教帶了更多的戰鬥性。他不僅攻擊僧侶，而且以相同的熱情去攻擊諸侯、貴族和閹閹之家。他用灼熱的色彩描寫現存的壓制，且把他想像中所創造的社會共和平等的千載太平之幻象和現存的壓制對照起來。他絡繹不絕的印行革命的小冊，派遺密使到四方八面去，同時他自己則在亞爾斯特及其鄰近組織同盟。

這種宣傳的第一個成果，是破壞亞爾斯特附近的明勒巴黑（Mellerbach）地方聖瑪利禮拜堂（St. Mary's Chapel），遵照聖經的命令（申命記Deut.第七章第五節）：「你應該打破他們的祭壇，折毀他們的柱石，焚毀他們的偶像，這

樣，你就是神聖的人民。」——薩克森的諸侯親身到亞薩特來鎮壓這次事變，並傳喚孟彩爾到城堡去。他在那裏演述了一段說教之詞，這是諸侯們向來沒有從路得——「威頓堡的行屍走肉」，照孟彩爾給他的稱呼——聽過的。他主張這些不敬上帝的統治者，特別是視福音如異端的牧師和僧侶，他引了新約聖書（Testament）來證實。不敬上帝之人——他說——除了依靠神所保護者之慈悲外，沒有生活的權利。如果諸侯們不剿滅不敬上帝之人——他說——上帝將從諸侯手中把劍奪去，因為管理劍的權利是共有的。高利貸、竊盜、劫賊等罪惡之源——他說——是諸侯和佔據一切生物——水中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植物——為其私有的主人。這些霸佔者——他說——自己既攫取了一切，而且掠奪和榨取農民及手工業者，同時還要誣賊窮人，「你不應該行竊」，「當窮人之中有一個犯了最輕的罪過的時候」，——他說——「須受終刑」，說薩博士對着這些情形

說：心願如此。」主人們創造了一個環境！——他辯論！——在這環境中，旁人迫不得已而成爲主人們之敵。如果他們不消滅改變的原因，未來如何能進步呢？——他問。「呵！親愛的諸君，我主上帝將如何操着錢杖敲碎這一切的偶像呢？當我說這些話的時候，我是被認爲叛徒了。就是這樣罷！」（參照齊德門著的農民戰爭第二卷七十五頁）。◎

孟彩甯把自己的說教印刷了。他在亞爾特斯特的印刷者被薩克森的約翰（John）公爵驅逐出境。他自己的著作要受威馬爾（Weimar）公爵政府的檢查。但他是不管這種命令的。在苗爾哈遜（Muelhausen）帝國城市，他立刻發行一種富煽動性的文書，在這文書中，他告訴人民：「要擴大眼孔，這樣，全世界才可以看見和了解那些已經褻瀆的把我主上帝變成四輪的人形的人心是傻子」。他用下面的話做結論：「全世界定要忍受一次大震動。將來的勝負是這樣：不敬上帝

◎ 孟彩甯這話，據考夫基的考證是爲攻擊印得而作。詳見本書附錄註釋十七。

的都從座位上滾下，受壓迫的都伸起頭來。」孟彩爾在封面上寫了以下的話，當作一種格言：「拿着鐵錘的男兒，注意呵！我已對你披肝瀝胆了。我已把你舉在人民之上，舉在許多帝國之上，你能够把這些帝國拔根、毀滅、擯潰和傾覆，同時你又能够建設和培植那些帝國，反抗國王、諸侯、僧侶的而且是護衛人民的銅牆鐵壁，已建築起來。戰鬥呵！勝利是可驚的，強悍的不敬上帝的暴君快要滅亡。」

孟彩爾和路得及其黨派之間的裂縫已發生許久了。路得本身迫不得已承受了許多教會改革，這些改革都是孟彩爾沒有和路得商量提出來的。路得嘗抱着溫和改良派的疑忌去看孟彩爾發起的有遠大目的的急進派之活動。一五二四年春天，孟彩爾在寫給明南黑頓（*Minchington*）——一個患病家居的庸俗者之標本——的信中，指責明南黑頓和路得全然不懂得運動。他們咬嚼聖經中字句，阻止了運動；他們的理論已腐朽無用了。「親愛的兄弟們」——他寫——「拋棄你們的猶豫和狐疑。時機到了，炎炎夏日正射在我們的門上。不要和那盡量發揮妨礙真理

的不敬上帝者保持友誼。不要想着不受諸侯的害便阿諛他們。你是慈愛的好讀書的學者，幸勿見責，因為我（只能如此），不知其他。」

路得^得有數次約孟彩爾^爾公開辯論。孟彩爾雖然常常準備在人民之前論戰，但不願在威頓堡大學的黨派之前，陷入神學的紛爭之中。他沒有「在高等學校專做靈的證明」的願望。如果路得^得是真誠的——他說——就請用他的勢力，停止反對他的（孟彩爾的）印刷者之陰謀及停止檢查稿件，使他們的討論可以在出版物上自由的戰鬥到底。

到了前述的革命小冊出現的時候，路得^得公開的斥責孟彩爾^爾。在他「寫給薩克森諸侯反對叛逆精神的信」中，他宣佈孟彩爾成了魔王（Satan）的工具，要求諸侯出來干涉，並驅逐這些事變的煽動者於國境之外，因為——他說——他們自己不限於只散佈有害的理論，並且煽動暴動，煽動反對政府之狂暴的非法的行動。

八月一日孟彩爾^爾被傳喚到威馬爾^爾城保諸侯之前，辯護關於叛逆陰謀之控告。

有許多株連的事實都搜集來反對他；他的秘密同盟破獲了；他和礦工及農民組織的關係發覺了。他已受着放逐的威脅了。他回到亞爾特斯特特的時候，知道薩克森喬治（George）公爵要求引渡他。他手寫的同盟文件已經被禁止了，這些文件是他號召喬治的臣僕武裝反對薩管之敵的，如若他不離開這城市，議會是要來引渡他的。

正當那個時候，農民和平民中高漲的騷動性，禮孟彩爾宣傳的任務非常順利進行。他在再洗禮派中得着許多寶貴的伴侶。這派更親密的團結於孟彩爾的周圍；他們沒有確定的教條，是以共同反對一切統治階級和再洗禮的共同象徵聯合而成的。在生活習慣上限制肉慾，在宣傳上是不倦的、狂熱的、大無畏的。他們長期受迫無家可歸，浪遊足跡踏遍德國全境，到處傳佈經孟彩爾所解釋明白而適合於他們自己的要求和願望之新福音。無數的再洗禮派受毒拷打、火燒和其他慘刑。但是這些密使的勇敢和忍耐是不動搖的，而且在人民迅速高漲的騷動之中，他們活動的成功非常之大。孟彩爾從喬林基出走以後，無論回到什麼地方，都是

準備好了的壞盤——這就是原因之一。

在紐昂堡農民暴動的萌芽已於一月之前摧折。孟彩爾在這裡則於秘密狀態之下進行他的宣傳。馬上那些擁護他最無忌憚的神學理論——聖經沒有強制力和靈經沒有意義——之人就出現了，宣佈基督是單純的人以及世俗有政權的人不敬上帝。路得大喊：「魔王橫行，亞爾特斯特的妖精！」孟彩爾在紐昂堡印行回答路得的書信。他斥責路得獻媚諸侯，和站在溫和的地位維持反動派。「人民將不顧一切而解放自己」——他寫——「路得博士的命運將成爲被虜之狐」。城市議會下令沒收其出版物，而孟彩爾又受迫離開紐昂堡了。他經過斯哇比亞（Swabia）到亞爾薩斯（Alsace），其次到瑞士，以返回到上部黑森林（Upper Black Forest）；在上部黑森林地方由再執總派使所促成的暴動已於數月前開始。顯然無疑的，這次孟彩爾的宣傳巡視，對於人民黨（The People Party）的組織，對於人民黨各種要求的明白製定，對於一五二五年四月暴動的最後總爆發，都有很多幫助。因這次巡視，孟彩爾活動的兩重性，格外鮮明，——一方面，他的宣傳在

其接近的人民中則用當時民衆所能了解的唯一的語言，即宗教的預言；另一方面，對於他所接觸之活動分子則宣示他的最後目的。甚至當這次旅行之前，他在喬林基，組織了最堅決分子——不僅從人民中，並且從下層僧侶中——的小組，集合於自己周圍，他把這個小組放在秘密組織的前鋒。現在他已成爲西南德意志全部革命運動的中心〔人物〕了。他從薩克森、喬林基、經過法蘭哥里亞（Franconia）、斯哇比亞，一直到亞爾薩斯和瑞士國境的那些地方，都組織起來，且把瓦爾德休（Waldshut）的胡伯馬爾（Hubmaier）、基利墨（Zurich）的康納德·格勒伯爾（Conrad Grebel）、格利森（Griessen）的法蘭志·納勃門（Franz Rabmann）、門明根（Memmingen）的夏白訥（Schappeler）、萊蒲海（Leipheim）的雅可伯·威葉（Jakob Wehe）和斯達特加（Stuttgart）的門特爾博士（Dr. Mantel）最革命的僧侶這些人，算成他的門徒和組織的首領。他自己大半留在休佛哈森（Schöffhausen）邊境的格利森地方，擔任巡視黑加（Heigau）克勒特加（Kettgau）等處。驚惶失措的諸侯和領主到處厲行鎮壓新平民異端的屠殺，

在煽動反抗精神和團結加入組織的隊伍上有不少的幫助。在這種環境之下，孟彩爾有五個月住在南部德意志。當總運動快要爆發的時候，他回到喬林基，願意親身指導運動，他在那裡的情形，我們以後還要談到。

這兩朝黨派首領的特質和行動是如何真實的反映出他們各個黨派的地位呵。路律對於運動之躊躇恐怖到了大的限度；他對於諸侯之卑躬屈節恰與中等階級猶豫動搖的政策相符。另一方面，孟彩爾革命的奮勇和果斷，却是平民和農民最進步的部分（之代表）。他們的差別是如此：路律把自己限制到表現本階級大多數的理想和願望，且藉此買得大多數之歡心；反之，孟彩爾則超過平民和農民直接的理想和願望，從當時現存的革命分子中，組織一個政黨，這個黨就站在他的理想本義上和所費他的精力來說，還只是代表暴動羣衆的極少數。

第三章 農民暴動的簡史

在胡斯派運動 (Hussite movement) 鎮壓以後，約莫十五年，萌芽的革命精神之最初象徵，就在德國農民之間顯露了。

一四七六年最初的農民秘密結社起於武志堡 (Wuerzburg) 的僧正管轄區域，武志堡是一個「受苛政、重稅、貢賦、爭鬥、仇視、戰爭、火劫、殺人、下獄等等」，已經一貧如洗，而又加以僧正、牧師、貴族在無恥的狀態下經常掠奪的地方。有一個年青的牧人和音樂家——匿克拉斯哈遜 (Niklashausen) 的漢斯·波耶海 (Hans Boehm)——又叫敲鼓者 (Drum-beater) 和吹笛漢斯 (Hans the Piper)，忽然以預言者的資格出現於塔伯格蘭 (Tauferrund)。他說理母曾在他的

● 胡斯派運動詳見附錄註釋七和註釋八。

前出現過，聖母叫他把鼓燒掉，停止跳舞和邪惡的娛樂，勸告人民懺悔。所以——他說——每人應該清洗塵世間之罪惡和無益的貪慾，拋棄一切裝飾，到聖克拉斯哈遜去巡拜聖母，請求赦罪。

在帶着宗教色彩的一切中世紀騷亂中，甚至在近世一切無產階級運動初期中，我們已經看出這些運動的先驅者抱着禁慾主義（Ascetism）。這種行動上的樸質，拋棄一切人生享樂的主張，使斯巴達平等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Spartan Equality）和統治階級對立。另一方面必須有一個過渡階段，沒有過渡階段則社會最下階層決不能發生一種運動。為發展革命的力量計，為了解自己對於社會一切其他分子之對立的地位計，為團結成爲一個階級計，社會下等階層必須從拋棄他們對於現存社會制度發生妥協的一切事物做起。可以使他們降到忍辱負重的卑賤地位以獲得的一切享樂，甚至爲最大壓迫所不能剝奪的一切享樂，都不可不拋棄之。

平民和無產階級的禁慾主義 在其狂醉的形式上和其內容上，都與中等階級

路得的道德和英國清教徒（與獨立教會派和進步派有差別）所傳佈的中等階級禁慾主義大大不同。中等階級禁慾主義的全部奧秘，不過是中等階級的儉約而已。到了近代生產力發展中如商品數量的時候，於是斯巴達的平等成了贅瘤，另一方面，無產階級社會地位，和無產階級自身因此一天天趨向革命化，那麼，平民和無產階級禁慾主義那喪失了革命的特質，這是十分明白的。禁慾主義就從羣衆之間漸漸消滅了。在保存禁慾主義的宗派中，這種禁慾主義不是降到資本家的僱傭者，就是化成有聲名的清廉，結局，只等於庸俗者或行會手工業者的鄙吝。還有一層，無產階級手中是幾乎沒有東西留得拋棄的，所以拋棄享樂之說，就用不着向無產階級宣傳了。

坎道漢斯所說召的懺悔得到大的懺悔。一切叛逆的語言皆和巴來甫求教罪，因爲在實際上，只有猛烈而努力和立時拋棄一切現存的習慣形式，才能够把無聊的散處四方的農民，而且是在盲目服從中生長的農民，引到統一的運動。到克拉斯哈遜巡拜開始了，而且迅速的擴大了，參加進行的羣衆越多，這年少的暴

徒宣佈他的計劃就公開了。他說：開克斯哈遜的聖母告訴他，從今後不要國王，不要諸侯，不要教皇，不要其他教會的或世俗的權力。凡人應該彼此以兄弟相待，要用自己的勞動取得麵包，財產不可多過他的鄰人。一切賦稅、地租、農奴義務、雜稅以及其他支付和讓與都應該永遠廢止。森林、水澤、牧場都應該到處自由使用。

人民以狂喜的態度接受這種新的福音。預言者的名聲，「我們聖母的消息」傳播各處，甚至達到遠方。巡拜者隊伍，從阿登瓦爾（Odenwald）、梅茵（Main）、羅伊爾（Roer）、雅克遜特（Jaxt）而來，甚至從巴伐利亞（Bavaria）、蘇比恩（Suebia）、萊茵（Rhine）而來，許多奇蹟，據說是吹笛者手造的，在各處異傳傳述。人民跪在預言者之前，向他祈禱好像向聖者祈禱一樣，人民從他的帽下拿得一點東西，好像是得到聖骨或護符一樣。僧侶們反對他，斥責他的幻影是惡魔的妖術，斥責他的奇蹟是地獄的欺騙，都毫無效果。僧侶的羣衆無限的增大，革命的宗派已開始組織了，叛逆的牧人之禮拜日說教，吸引四萬人

以上集合到阿克拉斯哈過來。

吹笛漢斯在羣衆之前說教已有數月之久，然而他的企圖不僅限於說教而止。他常和阿克拉斯哈通的僧侶及兩個騎士秘密往來，這兩個騎士——基志、封·美、賈德德（John von Herten）及他的兒子——都接受新的福音，而且是挑選出來為計劃發動的軍事領袖。最後，在聖基靈（St. Kilians）節前之禮拜日，牧人相信自已勢力已十分強大，就發出一個信號。他用下面的話結束他的說教：『現在回家去，牢記着我們至高至尊的聖母告訴你們的話，並且在下禮拜六，把妻子、老人留在家裏，你們，你們男子，在聖瑪加里節（the day of St. Margare）——即下禮拜六，再到阿克拉斯哈來，邀集你的兄弟朋友和你一起，只要是可以來的都約束，不要攜帶巡拜的杖，要拿着武器和軍火，一手執燭，另一手執劍和槍及斧，聖母將要把她愛你們做的事向你們宣佈；可是在農民結隊來到之先，僧正的騎兵在夜間捕了這個叛逆的預言者，把他帶到武志堡城；在指定的那一天，三萬四千武裝的農民來了，但這個消息阻喪了羣衆的勇氣，大多數回去了。

，約有一萬六千更堅定的分子，在基志·封·姜費爾德和其子米加葉爾（Micha-
2）領導之下到城堡去。僧正滿口承諾，勸農民回家，他們剛剛開始分散，即被
僧正的騎兵襲擊，且有許多被虜，兩名已斬首，吹笛漢斯則葬身火中。基志·封
·姜費爾德逃亡，後來他的全部財產交給僧院，才許他回來。到阿克拉斯哈遜
拜事仍繼續了一些時，然而終被鎮壓下去。

在這次最初企圖後，德意志有一個短時間的平靜；但到十五世紀末葉，農民
暴動和秘密結社又重新活動起來。

一四九一到一四九二年的荷蘭農民暴動，在亨斯克（Heemkerk）附近的戰
爭中，被奧克的亞伯利恩公爵（Dur. Albrecht）鎮壓下去；同時在阿比西
上部澤·薩頓僧院（Ahey of Kempton）區域的農民暴動也起來了，一四九七年
左右，在夏亞德·亞爾瓦（Shard Alwa）領導之下的富利新（Frisian）農民
暴動也受了薩克森亞伯利恩的鎮壓，（關於這幾件事），我們不去詳論。這些暴
動大部分與實際農民戰爭的舞台相隔太遠。有一部分是過去的自由農民反抗那企

圖用封建制度來壓迫他們的鬥爭。我們現在且述關於準備農民戰爭的兩大秘密結社：即鞋會（Union Shoe）和窮塊拉德（Poor Konrad）。

引起荷蘭農民暴動的物價騰貴，一四九三年在亞爾薩斯（Alsace）促成了農民和平民的秘密同盟，參加這同盟的有純粹中等階級反對派，甚至在下層貴族中也獲得部分同情。同盟的地點有西勒特斯達（Schlettstadt）、薩爾志（Saiz）、丹巴黑（Danbach）、露斯海（Posheim）、休威勒（Scherweiler）等處。這些叛逆者要求：劫掠和剝滅那些當時放高利貸——像現在一樣——吸取亞爾薩斯農民血液的猶太人，舉行勾消一切債務的「猶太五十年慶典」（jubilee year），廢止賦稅、雜稅和其他負擔，廢止教會的租羅特威爾（Rottweil）——帝國——的法庭、徵稅批准權，限制僧侶收入在五十至六十基德（gulder）的俸給，廢止秘密認罪，設立由公共選舉的公共法庭。這些叛逆者只等到自己力量足夠的時候，馬上要奪取西勒特斯達的砲台，沒收僧院和城市的金庫，從這裏發難，擴大到亞爾薩斯全部。在暴動時所展開之同盟的旗幟上，掛着一隻有長皮帶的農

民之鞋，即所謂鞋會，這個鞋會成了以後二十年農民叛亂的象徵和名字。

這些叛逆者常在夜間到寂靜無人的甸格堡（Hunderberg）開會。同盟會員在入會時採用最秘密的儀式，懲罰叛徒則採用最殘酷的手段。然而在四九三年基督復活節（Easter Week）前後，正是決定攻擊西勒特斯達的時候。這個運動敗露了。政府馬上出來干涉，有許多會員被捕，並且嚴刑拷打，裂成四塊，或斬去腦袋。又有些則砍去手和指成了廢人，放逐出國。大多數逃亡瑞士。這個鞋會不惟沒有消滅，而且在秘密中繼續存在。散佈在瑞士和南德意志的許多亡命者都成為同盟的密使。他們看到各處受了同樣的壓迫和同樣的走向暴動，把鞋會擴張到現時巴汶（Maden）的全境。從一四九三年以來，德國南部的農民對皮黨糾正三十年，儘管在事實上他們是散居鄉村，然能克服一切困難建立更堅實的組織，在無數分散，失敗，首領被殺之後，屢次重新糾集黨羽，一直達到羣衆騷動的機會，這樣的頑強和堅忍，真令人大大驚嘆。

一五〇二年，當時包括布魯塞爾（Bruchsal）地方的斯白伊爾（Speyer）帶

正領域，顯現了農民之間有秘密運動的徵兆。在這裡，鞋會改組有顯著的成功。約有七千人屬於組織之內，其組織中心在魯爾和威加頓（Weidarkan）之間的安托格羅巴黑（Antragsbrot），其分枝在下部從萊茵到梅蘭，在上部則達到巴敦的侯爵領土。他的綱領規定：對於諸侯貴族僧侶，不繳納地租、什一稅、賦稅或雜稅；廢止農奴制度；沒收僧院和其他教會財產分給人民，除皇帝外不承認有其他特權。

在這裡，我們第一次看見農民提出兩個要求，即收回教會財產以利人民和統一的不可分的德意志君主國家，這兩個要求以後在農民和平民的進步派中正式看到。

在孟彩爾的綱領中，教會財產分配改變為沒收充當公共財產，統一的德意志帝國改變為統一的不可分離的德意志共和國。

復活的鞋會，和以前的鞋會一樣，有秘密集會地點，有謹守秘密的誓約，有入會的儀式，有寫着『上帝的公道以外別無他物』（nothing but God's Justice）

的會旗。行動計劃和亞爾薩斯同盟（Alsation Union）相同。布魯塞爾——那裡居民的大多數已加入同盟——是要奪取的，同盟軍隊要組織起來，並將派遣到周圍的諸侯領土內去，作為移動的集合地點。

這計劃被一個僧侶出賣了，是一個會員常認罪時的僧侶洩漏了的。政府馬上採用反對行動。這同盟是如何的廣布，從奪取亞爾薩斯種和帝國的對峙和斯比比爾聯盟的恐怖中就首證明。軍隊已集中了，羣衆逮捕實現了。馬克辛米德（Maximilien）皇帝——「最後的騎士」發出最殘酷的統治命令反對農民的計劃。農民的隊伍到處集合起來，企圖武裝反抗，可是孤立的農軍不能長期堅持。有些領導者被處死刑，大部分則判處亡命，但因為密謀守得很好，所以大多數會員及其領袖在自己的故鄉或在鄰近的區域都能不受投害。

在這次新失敗後，跟古來的是階級鬥爭在表面上平靜的長時期。然而鬥爭仍在暗中繼續着。十六世紀最初幾年窮坎拉德在斯比比亞成立了，顯然與鞋會關係的會員聯合。在黑森林地方，鞋會仍保存了孤立的小組，一直到十年之後，有一

個奮發的農民領袖才把各種散絲似的組織聯絡起來，並團結成爲一個偉大的秘密結社。這兩個秘密結社在一五二一到一五二五年的擾亂時期都成爲公衆的、團體的，一個在先，一個稍遲一點，在這兩個擾亂時期中，瑞士、匈牙利、斯洛伐尼亞（Slovenia）的農民爆發了接連不斷的暴動。

恢復萊茵士流的社會者即安托拉維爾巴恩的約翰·富利志（Johann Frey）他是一五〇二年叛逆者中的亡命客，以前做過兵士，在各方面都是傑出之人，他逃亡後，藏身於君士坦斯湖（Lake Constance）和黑森林之間的許多地方，最後被裝一個家臣住在伯勒斯加（Bregenz）的富勒堡（Frei Gut）之鄰近，他長年親成一個山野之人。關於他由這樣好的基礎來改組同盟之方法及其吸引各種人民之巧妙——這類有興趣的故事尚在研究之中。由於這個標本式的叛逆者之外交天才，以其百折不回的忍耐力，把騎士、僧侶、市民、平民和農民等各種階級中人民的人

● 斯洛芬尼亞現在屬於亞歷山大維亞（Austro-Hungary）的德意志。

多數，兼收並蓄於同盟之中，他組織了包含幾個階層的秘密結社，各階層之間多少有些鮮明的區別，幾乎是無疑的事實。凡有一藝之長的分子都以最謹慎最練達的手腕利用之。除了那些用各種化裝浪遊國內的許多基本密使之外，又用一些無賴和乞丐供次要的差遣。約斯和乞丐頭目發生直接關係，經過這些頭目把無數漂泊江湖的人都放到自己掌握之中。實際上，這些乞丐頭目在他的秘密結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些乞丐頭目就是本來的面目。有的攜帶女兒浪遊國中，利用其女兒似乎受傷的腳以爲乞食的口實，他帶着八個以上的徽章——如十四人的釋放者，聖阿諾里 (St. ottilie) 聖母等——在帽上，此外，又戴上長的紅鬚，拿了附着匕首和針且有大節的手杖。有的用聖斐爾頓 (St. vater) 的名義乞食，奉贈香料和土荊芥；他穿鐵色的長大衣，戴紅色的平頂禮帽，負着特利恩特的幼兒 (Baby of Trent) 。一劍掛在腰上，許多小刀和一把匕首繫在帶上。還有些故意露出傷痕，加上繪畫逼真的服飾。他們中至少有十人，爲得二千基爾德 (gulden) 的報酬，在亞爾薩斯 在巴敦的侯爵領土，在伯勒斯加同時放火，他們中至少有

二千人，聽從以前農奴兵（*Lansquenets*）軍官喬治·休勒德（*Georg Schneider*）的指揮，在羅鎮（*Bozen*）的查伯恩教區市場之期（*the day of the Zubern Par-tish Fair*），佔領城市。在真正同盟會員之間，各驛站中的郵差已經設立。約斯·富利志及其秘書長——斯托斐爾·封·富勒堡（*Stoffel von Frei Burg*）——不斷的乘馬到處奔馳，在夜間檢閱新兵武器。在法庭調查的文件中，有豐富的材料，證明鞋會已擴張到萊茵上流和黑森林地方。這些文件載有各地會員姓名及關於這些人的敘述。最多的是手工業工人、農民、客棧老闆、少數貴族、僧侶（例如亨·*Lehen* 本人）和退伍的農奴兵。這種組織證明鞋會在約斯·富利志領導之下已有更進步的性質。城市中平民分子漸漸開始抬起頭來。鞋會的支部分佈在亞爾薩斯，今日的巴敦，一直到武頓堡（*Wuerttemberg*）和梅茵。較大的集會常常到遙遠的山上——例如克涅比斯（*Knechtis*）等等——舉行，討論同盟的事務。首領會議——常常有地方會員和較遠地方的代表參加——則在列亨附近的哈特馬特（*Hartmatte*）舉行；在這會議中曾通過十四條綱領：皇帝以外和教皇以

外（幾個人的意見）無統治者；廢止羅特威爾（Rottweil）帝國法庭；教會法庭只限於宗教事件；廢止一切利息（支付已久息金已和木金相等的）；最高利率限定百分之五；有打獵、取漁、放牧、伐木的自由；限制僧侶每人只領薪俸一份；沒收一切教會財產和僧院寶石交給同盟；廢止不公平的賦稅和雜稅；在全部基督教國土內永久和平；對於同盟的一切反對者採取嚴厲行動；（徵收）同盟稅；奪取強國的城市——例如富勒堡——以作同盟的中心；同盟隊伍一集合起來立刻和皇帝公開談判，如遇皇帝拒絕時，則立刻和瑞士談判；以上這些條文都是一致通過的，我們看出農民和平民的要求已漸漸採取更確定更堅決的形式，另一方面，對那些更溫和的和平法的分子却不得不給以相同程度的讓步。

一五、三年，的莫代天為我，忽然變了「一下狂熱。『當時一切都準備好了，』只缺一面同盟之旗，約翰·富利志為着製旗往宰爾伯蘭（Meibran）去。旗上除各種象徵和標幟外，包含了社會和「上帝扶助你們的神明正直』（God help thy divine justice）的題字。當他離開期內，一種過早的企圖是要圍攻富勒堡，不幸

這種企圖敗露了。在宣傳行動上一些疏忽，讓富勒堡議會和巴敦侯爵探出風聲。兩個會員的叛變洩漏了全部密謀。侯爵、富勒堡議會、恩西斯海（Nensheim）帝國政府立刻派出它們的偵探和兵士。許多同盟會員都被捕、拷打、殺頭。但大多數囚徒逃脫了。約翰·富利志亦在其中。瑞士政府用盡力量虐待這些亡命者，甚至殺了許多。然終不能阻止大多數亡命者繼續藏匿於其家之鄰近，和漸漸回來。在恩斯海漸的亞爾薩斯政府比其他「政府」尤其殘酷。它下令處許多亡命者以斬首、車裂、分成四塊之刑。約翰·富利志大半藏身於瑞士萊茵河岸，但他常常往黑森林，沒有被捕過。

瑞士和其鄰近的政府聯合起來「反對社會」的理由，在目前看來，是顯明的，因為農民發動到去年——即一五二四年——在伯恩（Bern）、梭洛森（Solothurn）、路森（Lucerne）等處爆發，而且得到窮諸貴族政府和閥閥制度之結果。農民也為自己取得一些特權。瑞士各地方暴動成功，單純由於瑞士的政治集中還趕不上德意志。一五二五年德意志農民已經完全克服了地方統治者，可是他門終

爲諸侯有組織的大批軍隊所擊敗。而這種軍隊在瑞士是不存在的。

與巴教鞋會同時並起，而且和它明顯的直接聯絡，即是武頓堡成立的第二個秘密結社。依據文件，它在一五〇三年以來即已存在；但在安托格羅巴黑會員四散之後，因爲鞋會名稱過於危險，於是它採用窮坎拉德（Poor Konrad）的名稱。其根據地在賀亨斯達芬（Hohenstaufen）山下列斯（Reme）流域。它的存在，至少在人民之間，沒有經過長期的秘密（狀態）。烏爾利黑公爵（Duke C. III.）政府無恥的壓迫，和促成一五一三到一五一四年騷亂的連年飢荒，都使執持者人數擴大。新加的酒肉和麵包稅，正如對每基爾德（Vaiher）每年課二辨士（Pfennig）的資本稅一樣，同是引起騷亂的原因。什多夫（Schornlof）城市首先被佔領了，在這只市中，有一個名叫加斯拔，蒲列基彭特（Krispar Prentzer）的刀匠之家，爲秘密者首領常常集會之處。一五一四年春天，暴動爆發了。三千農

● 這一段，日譯本全缺，英譯本亦有意義模糊之處，本文參照俄譯本譯的。

民——一說是五千農民——在這城市之前出現，並且受公爵的臣僕善意承諾的勸說而撤退。烏爾利黑公爵在承諾廢止新稅以後，帶着騎兵八十人乘馬奔來，看見萬事因承諾之故都歸平靜。他承諾召集會議，在議會中審查一切請求。然而同盟的首領們深知烏爾利黑在補充和集中那種保證破約及強制收稅的十足軍隊以前，唯一的要求是使人民平靜。他們從加斯拔·蒲列基彩爾之家，即「窮坎拉德的機關」，發出召集同盟大會的通告，這個通告得着各地密使的擁護。在列斯流城第一次暴動的成功加強了各處人民之間的運動。文書和密使得到順利的回聲，所以五月二十八日在安托邱克海（Unterturkheim）所開的大會，有從武頓堡各地方派來的無數代表出席。大會決議要立刻進行宣傳，並要抓着可能機會在列斯流城舉行一個決定全局的進攻，以期從此地起把暴動向四方八面擴張。當德廷根（Dettingen）的彭特漢（Benteishans）——以前的兵士——和武廷根（Wvertingen）的孫格漢（Singerhans）——特出的農民——引導斯哇比亞·亞爾（Swabian Alp）地方加入同盟的期間，騷亂在各方面同時並起。雖然孫格漢突然被襲擊被

虜了，但伯克南（Bachnang）、溫蘭敦（Winnenden）、馬克郎林根（Marka-renningen）等城市落入與平民聯合的農民之手了，從威斯堡（Weinsberg）到伯拉標陵（Brauboren），從伯拉標陵到巴敦邊境的全部領土都公開暴動了。烏爾利黑不得不讓步。可是他一方面宣佈六月二十五日召集議會，另一方面又向四鄰的諸侯和自由城市發出通告，請求援助以平騷亂，他說騷亂危及帝國內的一切諸侯、權威和尊貴，而且『怪像結會』。

在這個時間，各城市的代表和要求列席議會之農民的許多代表，都集合起來，議會於六月十八日在斯達特加（Stuttgart）開幕了。

主教至今無人到會。騎士則未被招請。斯達特加城市的反對派、正如迺近列斯流域的里昂堡（Leonberg）地方兩個威嚇的農民隊伍一樣，都鼓勵了農民的要求。他們的代表都出席了，議決撤消和懲罰屬於公爵的三個可憎的議員——龍白特（Lamparter）、山摩坡（Thumb）、洛黑爾（Lorcher）；由四個騎士、四個市民、和四個農民組成的參事會輔助公爵；給公爵以歲費；沒收僧院和捐款

交給國家金庫。

烏爾利黑公爵用政變 (Coup d'état) 來回答這些革命的決議。六月二十一日他帶着騎士和議員馳赴秋賓根 (Fueßingen)，那裏有主教跟着他。他也曾吩咐中等階級到那裏來，中等階級是服從的。他在那裏繼續召集無農民（列席）的議會。在軍隊威嚇下的市民就出了他的同盟者——農民。七月八日秋賓根的協定成立了，這協定加在地方方面的公爵貸款約有一百萬；加在公爵方面的權力上若干限制，公爵不會實行；對於農民，則用少許柔弱普通的詞句和反對暴動之精密的懲治條例。自然，沒有一字提到農民在議會中的代表。樸直的老百姓大喊「緩節」！但在其貸款由等級會議 (estate) 負擔已經獲得新信用的公爵，馬上集合軍隊，同時他的鄰邦，特別是白拉廷選舉侯 (Elector Palatine) 給以軍事援助。所以在七月末，秋賓根協定已被全國採用，而且新的誓約履行了。只有

● 德國往時有選舉皇帝之權的權侯。

列斯流域坎拉德提出反抗。公爵乘馬親到那裏，幾乎被殺。農民營寨在哥白遜（Koppell）山上。可是事件延長，大多數暴動者因缺乏糧食而各自分散，後來，剩下的一部分，與幾個議會代表締結模糊不清的協約以後，也回到家中。各城市在獲得他們的請求後，現已掉過頭來，狂熱的反對農民；當時藉各城市派軍隊之功，軍力加強的烏爾利黑，進攻反對協定條文的列斯流域，並掠奪其城市和鄉村。一千六百農民被捕，其中有十六人被斬，其餘的則繳納重的罰款到烏爾利黑的金庫。還有許多長期禁錮獄中，頒佈許多懲治條例反對同盟復活，反對一切農民集會；新斯比恩的貴族則締結特別聯盟以鎮壓一切暴動的企圖，當時窮坎拉德的主要領袖格廷爵士，二三年後，大多數又才身返其故鄉。

在武頓堡運動同時並起的，在伯拉斯加和巴敦侯爵領土有新鞋會活動的象徵出現。六月間曾在比亞爾（Bueni）企圖暴動，但立刻被斐列卜（Filibert）侯爵撲滅。指揮者——富勒堡的基格、巴斯威（Gugel-Bastian）——被捕並被斬首。

同年（一五一四）春天，普遍的農民戰爭爆發於匈牙利。當時十字軍出征土

耳其之說正在宣傳中，照常例，允許農奴和奴隸以從軍的自由。約有六萬人集合起來，聽從基阿基·多沙（György Dózsa）（註釋十五）的指揮，他是斯濟克拉（Székely）人，在以前土耳其戰爭時顯露頭角，甚至取得爵位。然而匈牙利騎的騎士和貴族受着十字軍劍擊他們財產和奴隸的威脅，頗多不快之感。他們迅速的追逐働別的農民隊伍，用暴力奪回農奴，且虐待之。十字軍兵士聽到這消息時，一切被壓迫農民的憤怒就不可遏抑了。其中有兩人——勞倫斯·閔查洛（Lawrence Minchalo）和巴納巴（Barnabas）——是十字軍的倡導者，煽起火燄，用他們革命的演說，鼓動軍隊內反對貴族的憎惡，多沙自己和其反對背叛的貴族之軍隊有同一的激昂。十字軍就成了革命的軍隊，多沙就取得這次運動的領導。

他和其農民紮營於白斯特（Pest）附近的拉可斯（Rakos）原野。農民和附近鄉村及白斯特郊外屬於貴族的人民之間採取公開敵對行動。馬上發生小的衝突，接着敲了西西里島上「教堂」的晚鐘（Sicilian Vespers）使農民俘虜了一切貴

族，而且焚燒了鄰近的一切城堡。法庭囑嚇無效。到了在城壁下對貴族執行最初的人民審判完竣時，多沙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他將兵士分成五隊，兩隊派到上部姆牙利山上。以便引起暴動和剿滅貴族。第三隊歸白斯特市民亞伯洛·斯查利佛（Ambrós Szalayes）指揮，留在拉可斯守衛首都。第四第五兩隊則由多沙和其兄弟基利哥（Gregor）率領向斯哲格廷（Szegedin）出發。

當這期間內，貴族在白斯特集合，並向特爾西芬里太守（Voivode of Transylvania）約翰·查波爾雅（Johann Zapolya）求援。與勃德白斯特（Budapest）中等階級聯合的貴族，在斯查利佛及農軍的中等階級分子投向敵人以後，就襲擊和消滅了留守拉可斯的軍隊。許多俘虜用最殘酷的方式處決，剩下一部分則割去耳鼻送回故鄉。

多沙在斯哲格廷戰敗，移向克查納（Czannad），克查納是他擊破伯陶利。

● 西西里島晚鐘即一二八二年三月三十日西西里島人發起暴動，殺其壓迫者法蘭西人之信號。

伊斯特芬 (Batory Istvan) 和僧正綺薩克 (Eszakye) 所指揮的貴族軍隊以後佔領的；他對於俘虜執行了流血的鎮壓，回答貴族在拉可斯的殘暴行為，這些俘虜中有僧正及王室法官特勒基 (Teleky) 在內。他在克查納宣布共和制，廢止貴族，一律平等及主權在民；以後即向伯陶利及其軍隊所逃往的頓敏斯堡 (Temesvár) 前進。但是多沙圍攻這個城堡已經兩月，正得到安頓·何斯查 (Anton Horza) 指揮下的新軍應援的時候，他在上部匈牙利為貴族屢次打敗的兩支隊伍及率領特蘭西芬里軍隊的約翰·查坡爾雅都來反對他。農民受查坡爾雅屢擊即行潰散。多沙被捕，燻炙於赤熱的寶座之上，其肉則由其部下分食之，這些部下只允許在這種情形之下得到性命。那些潰散的農民會經勞倫斯 (Lawrenc) 和何斯查 (Horza) 重新集合，不幸又被擊破，凡是被敵人捕獲的不是以刺死，就是用繩絞死。農民的屍體成千的拋在街路上或拋在一片焦土的鄉村入口。依據報管材料，有六萬人左右，或是陣亡，或遭屠殺。在議會下次開會時，貴族注意到要再把農民奴隸化看成土地法。

在加因西亞 (Carinthia) - 加里阿拉 (Carniola) 和斯特利亞 (Styria)——

「向風的濕地」——同時爆發的農民暴動，起源於與鞋會有親密關係的秘密結社；這個秘密結社是一五〇三年在受帝國官吏敲骨吸髓，受土耳其鐵騎蹂躪，受飢荒痛楚呻吟的區域組織起來的。有了這種秘密結社的組織使暴動成爲可能。一五一三年這個區域內，斯洛芬尼亞的 (Slovenian) 農民像德意志的農民一樣，曾經再舉「舊權利」(the Old Right) 「運動」之戰旗。當時他們願意和解；到一五一四年重新集合廣大羣衆的時候，又因馬克辛米梁皇帝直接允許舊權利而被勸回家。然而受欺騙人民之復仇戰爭在一五一五年春天却以更暴烈的形式爆發。這裡，像匈牙利一樣，城堡和僧院被毀了，捕得的貴族受農民的審決處決了。在斯特利亞和加因西亞，皇帝的大將迪特利黑斯達 (Dietrichstein) 馬上撲滅了暴動。在加里阿拉僅由於拉因 (Rain)——一五一六年秋天——的襲擊，由於後來匈牙利貴族的無恥和奧大利的殘暴之適當配合才把暴動鎮壓下去。

在這樣屢次嚴重的失敗以後，在這些貴族殘暴的鎮壓以後，德意志農民有一

個長期的平靜，這是不難了解的。然而秘密結社的活動和地方的騷亂都未完全絕跡。一五一六年鞋會和銅坎拉德的大部分亡命者都已經回到斯哇比亞及萊因上流來。一五一七年鞋會在黑森林地方重振旗鼓。約斯·富利志自己依然擁抱着一五一三年舊鞋會的旗幟，向黑森林各處奔馳，大施活動。秘密結社已重新組織起來。集會仍和四年前一樣，到克涅比斯山上舉行。但秘密是保持不住的。政府探知這些事實，下手干涉。有很多人被捕被殺。最積極最練選的分子不得不逃走，約斯·富利志也在其列，他雖未曾被捕，却似乎不久即死於瑞士，無論如何，他的名字是不再論及了。

第四章 貴族暴動的簡史

正當第四次鞋會的組織在墨森林受鎮壓的期間，路得在威頓堡發出一個運動的信號，這個運動一定會把一切等級都捲入漩渦，而且要震蕩整個帝國。喬林基的奧古斯廷派（Augustinian）之信條就像火藥庫觸了電火一樣。騎士、中等階級、農民、平民、覬覦主權的諸侯、下級僧侶、隱遁的神秘派、諷刺滑稽的著作家反對派，這些縱橫交錯的努力，在路得信條之中，尋得一個共同的表現，他們就以可驚的速度團結自己於路得的信條之周圍。一切反對派分子的同盟，雖在倉卒之間成立，而且只速緩一個短時期，可是突然顯露了運動的龐大力量，而且給它以前進的推動力。

但是運動的迅速發展，一定要助長其中所潛伏之衝突的萌芽。奮起的羣衆之各部分至少是決定了分裂的命運。這些羣衆以其社會地位不同之故，直接的相互

對立，且把他們放在正常的相互敵對關係上。在宗教改革的最初一二年，各種反對的派別繞着兩個中心點而集合，已經成了事實。貴族和中等階級爲條件的團結在路得周圍。農民和平民雖未看出路得爲直接的敵人，却已形成單獨的革命反對派。這並不是新的「現象」，因爲現在運動在擴大和加深兩方面，都比路得以前的時期成了更普遍更顯明，所以必然要引起兩派之間尖銳的對抗和公開的鬥爭。這種直接的反對就馬上彰明較著了。路得和孟彩爾，在刊物上和講壇上的鬥爭，是相互對立的，這恰與諸侯、騎士、城市的軍隊（包括路得派的大部分，或至少傾向路得主義的勢力），和爲那些軍隊所擊潰的農民及平民隊伍之相互對立相同。

參加宗教改革的各種分子利益之分歧，即在農民戰爭以前，反對諸侯和僧侶以實現自己要求的貴族企圖上已明白顯露出來。

在十六世紀之初，德國貴族的地位已在前面敘述過。貴族對於日加強大之世俗的和宗教的諸侯，日益失掉其獨立性。那是這樣實現的：帝國權力之日趨於瓦

解，就是說帝國權力分散爲多數的統治權，以相同的程度貴族亦日墮入社會的集團中。照貴族自己的意見，貴族的崩潰與德意志民族的崩潰是一致的。加之，貴族，特別是帝國直轄的貴族那一部分，憑藉其軍事上的職務和其對於諸侯的地位，是直接代表帝國和帝國權力。貴族是最富民族性的等級，而且它知道：帝國權力和德意志的統一越強大，諸侯越微弱和諸侯的數目越少，那麼，貴族就越有權勢。所以騎士一般的是不滿意於德意志可憐的政治地位，不滿意於帝國的外交關係之軟弱無力——這種軟弱無力的加深是與皇室用世襲的方法，把「新」省分一個一個的附屬於帝國這件事有同一比例——不滿意於在德意志國內的外國勢力之陰謀，不滿意於德意志諸侯勾結外國反對帝國權力之詭計。所以貴族的要求，就立刻採取要求帝國改革的形式，諸侯和高等僧侶就要成爲帝國改革的犧牲品。德國貴族的理論代表者烏爾利黑·封·胡頓（Ulrich von Hutten）就執行這

◎「新」字是依照俄譯本加入的。

種要求，和德國貴族的軍事及外交代表者富蘭志·封·西鐸根（Franz von Sickingen）聯合起來。

貴族所要求的帝國改革，包孕在胡頓的極急進精神之中，而且表現得格外清楚。胡頓之要求沒有別的，只是撤廢一切諸侯，收回一切教會主權和財產，恢復擁戴君主的貴族德謨克拉西（a democracy of the nobility）——晚近波蘭共和國全盛時代的政府遺跡之形式。胡頓和西鐸根相信如果貴族統治——軍人階級執政——建立了，如果諸侯——地方分權的分子——廢黜了，如果僧侶的權力消滅了，如果德意志從羅馬教會統治之下解放了，那麼，帝國將重觀統一自由和強盛。

建築在農奴制度基礎之上的貴族德謨克拉西，是最原始的社會形式之一，在波蘭和在德意志人所征服的各帝國，至少在它們的初期都能看見其原型；其發達之正常的進程，成爲廣大的封建階層（Feudal hierarchy），到這種封建階層是一大進步。這樣強有力的貴族德謨克拉西，在十六世紀的德意志，已成爲不可能之

事，首先因為當時已有重要而強大的德意志各城市存在，而貴族和各城市之間，沒有勃蘭的前途，如英國從封建秩序轉變到資產階級立憲君主制一樣。德意志保存了舊貴族；英國則舊貴族被玫瑰戰爭（The War of the Roses）^①（附錄十六）消滅了，止膳下二十八家，而且為中等階級出身和有中等階級傾向的新貴族所代替。德意志的農奴制度依然普遍存在，貴族從封建的源泉吸取它的收入；英國則農奴制度在實際上已消滅了，貴族變成鮮明的中等階級地主，持有中等階級收入從源泉——地租。最後，專制君主的中央集權制，在法國從路易十一以來，因為貴族和中等階級利益之衝突而存在，且繼續增進，而在德意志則不可能，因為民族統一的條件，如果說到存在的話，那也只是最初步的形式。

在這些情形之下，胡頤在實際上實行其理想的決心越大。則他不得不讓步越

① 玫瑰戰爭——譯「密魯戰爭」。

② 參看本書附錄計釋一。

多，而他改革帝國的計劃就越模糊。單獨的貴族是沒有力量貫徹這種改革的。貴族和諸侯比較起來，顯然要弱些。只有在各城市中，或在農民和強有力的改革派之鼓吹者中去尋得同盟者。但各城市勾踐貴族不可靠，拒絕了一切聯盟的形式。農民恰恰認爲剝削和虐待自己的貴族是最切齒的敵人。至於那些改革派的理論家與中等階級，諸侯或農民共同聯合。貴族想把其自身到更高的地位爲帝國改革的主要任務，從這種改革中能允許中等階級與農民以什麼利益呢？在這些環境之下，胡頓在其實傳文件中，關於貴族、城市、和農民未來的相互關係，不置一詞，或者說得很簡略；把一切罪惡都歸到諸侯、僧侶和倚靠羅馬的身上，且告訴中等階級在未來的貴族和諸侯鬥爭之中，爲自己的利益計，至少要保持中立。關於農民又制度和貴族加到農民的其他負擔，胡頓從來沒有提及。

德國貴族對於當時農民的态度，與波蘭貴族在一八三〇年以後暴動期中對於農民的态度恰恰相同。（當時德國的）^①運動，像近代波蘭暴動一樣，只有一切

① 這五字依照俄日譯本加上。

反對派聯盟，主要的是貴族和農民聯盟，才能得到成功。但一切聯盟，在德國和波蘭任何一方面，都完全不可能。貴族不預備放棄其政治特權及對於農民的封建權利，另一方面，革命的農民不能在渺茫的前途上加入貴族——最壓迫農民的階級——聯盟。一五二三年德國貴族不能說服農民，恰與一八三〇年波蘭貴族一樣，只有完全廢止農奴制度、奴隸和一切貴族的特權，才能把鄉村人民與貴族聯合起來。然而貴族却與一切特權階級相同，絲毫不願放棄其特權，放棄其優良的地位，放棄其收入源泉的大部分。

所以，到了鬥爭爆發的時候，貴族以孤軍和諸侯搏戰。從貴族腳下奪得地盤有了兩世紀的諸侯，此時不費多大力量也能獲得勝利，是顯然無疑的。

鬥爭本身的經過是尋常明白的。胡爾和西歐根——中部德意志貴族的政治和軍事首領——於一五二二年，在蘭登（Landsberg）地方，組織了萊茵、斯哇比亞和法蘭哥里亞以及六年來盟的同盟，頭銜當然自稱：兩軍團集合一支軍隊，一部分出於自己的費用，一部分與鄰近騎士聯合起來。他在萊茵下流的法蘭哥里亞以

及荷蘭、威斯特法里亞（Westphalia）等處，組織補充軍隊和援兵，一五二二年九月，他向特利爾（Trier）的選舉侯兼大僧正宣戰，採取公開敵對行動。當他駐紮在特利爾附近之際，他的援兵爲諸侯們迅速的干涉所切斷。亨西伯爵（Landgrave of Hesse）和白拉廷選舉侯（Elector Palatine）援助特利爾大僧正，西鏢根不得不迅速退到他的城堡蘭德斯托爾（Landstuhl）。儘管胡頓和其餘友人賣盡氣力，但這些聯合的貴族，受諸侯集中的迅速的行動之威嚇；就讓西鏢根一人獨當其衝。西鏢根受了致命傷，放棄蘭德斯托爾，不久死去。胡頓不得已逃往瑞士，數月後，死於基利黑（Zurich）湖中之烏夫納（Ufenau）島上。

隨着這次失敗，隨着兩個領袖之死，與諸侯對抗的整個貴族勢力就分崩離析了。從此以後，貴族僅爲諸侯服役和聽從諸侯的指揮。不久爆發的農民戰爭，驅逐貴族更深刻的走到諸侯直接的和間接的保護之下。這證明了德國貴族與其和解的農民締結公開的同盟推翻諸侯和僧侶，寧願在諸侯統治之下繼續剝削農民。

第五章 農民戰爭紀實及其失敗的主要原因（上）

自從路得對天主教教權踏層宣戰，把德意志一切反對派分子投入運動漩渦的那一瞬間起，沒有一年，農民不起來提出自己的要求。當一五一八年到一五二三年之間，在黑森林和斯哇比亞上部，各地方的暴動接踵而起。自一五二四年春天以來，這些暴動帶有系統的性質，一五二四年四月馬黑達爾寺院（Abbey of Marthal）區域內的農民拒絕農奴勞動和賦稅；同年五月璦伯拉卒（St. Blasien）的農民拒絕農奴付款；六月門叻根（Memmingen）附近斯大海（Steinheim）的農民宣佈他們不納什一稅及其他賦稅；七月和八月喬爾加（Thurgau）的農民謀反，旋歸平靜，一部分因基利黑（Zürich）的調停和約，一部分因聯盟大批屠殺的殘暴行為。最後，左右全局的暴動起於斯托林根（Stühlingen）伯爵的領域，這次暴動可看做農民戰爭真正的發端。

斯托林根的農民突然拒絕對於伯爵的各項負擔，集合強大的羣衆。一五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們在布爾根巴恩（Burghausen）的漢斯·密勒（Hans Müller）指揮之下向瓦爾德林（Waldshut）前進。在這裏他們聯合城市中等階級組織福音同盟（Evangelical Fraternity）。城市中等階級爲傳教師巴爾達叟、胡伯馬爾（Hausser Hubmaier）——孟彩爾的友人和弟子——之宗教的迫害與南部奧大利政府衝突，所以懇願加入同盟。每個徵收三個銅幣（Kreuzer）的同盟稅。照當時的貨幣價值這是非常大的金額。許多密使派遣到亞爾薩斯、摩西爾（Moselle）、全部萊茵上流、法蘭哥里亞，招引各處農民加入同盟。同盟的目的宣告如下：剷除封建勢力；破壞一切城堡和僧院；消滅皇帝以外的一切統治者。德意志的三色旗是同盟的旗幟。

其勢甚熾的擴張到今日巴教的全部領土。斯旺比亞首領的貴族，其軍事勢力完全在意大利與法國富蘭西斯第一（Francis I）作戰，現在却被驚慌嚇倒了。他們無計可施，只有藉談判遷延時日，趁此時機搜集貨幣，補充軍隊，等到他們

覺得力量足够的時候，就用「焚燒、烘烤、掠奪、屠殺」的方法，懲治這些無天無地的農民。從當時起，即開始了有系統的叛賣，背約食言，陰謀暗算，無所不爲，這種叛賣在全部農民戰爭中顯示了貴族和諸侯「的卓越手腕」，這種叛賣是他們反抗散漫的農民之最有力的武器。包括西南德意志諸侯貴族和帝國城市的斯哇比亞聯盟（Swabian Union）勉力和解，然對農民不能保證真實的讓步。農民繼續他的運動。從九月三十日到十月中旬，布爾根、巴黑的漢斯、密勒率軍前進，經過黑森林上達烏拉黑（Urach）及佛特瓦根（Furtwangen），增加軍隊到三千五百人，駐紮在萊拉廷根（Ertingen）附近，距斯托林根不遠。貴族只有一千七百人聽受指揮，甚至四分五裂。貴族不得不同意休戰，這次休戰是在萊拉廷根陣營結束的。農民承認或直接或間接由雙方當事者經過公斷人簽訂一種和平條約，並把各種請求交斯托卡黑（Stockach）法庭審判。貴族和農民兩方軍隊則解放之。

農民制定十六個條件，要求斯托卡黑法庭接受，這些條件非常和平。其中包括廢止狩獵權、農奴勞動、額外租稅及一般的領主特權，抗議任意逮捕和任意毆

立的法庭。農民的要求只此而已。

然而農民剛剛回家之後，貴族又要求繼續那些留待法庭判決的一切爭議事件。農民拒絕了，並控告其領主於法庭。於是衝突重新起來，農民集合了，諸侯和領主又再集中軍隊了。這次運動擴大到伯勒斯加，並且深入到武頓堡。在瓦爾德堡（Waldenburg）的高治·特魯斯西（Georg Truchsess）——農民戰爭的亞爾巴（Alba）——所指揮的軍隊監視農民運動，襲擊個別的援軍，但不敢進攻主要的部隊。特魯斯西和農民首領談判，並且到處締結條約。

十二月末，斯托卡黑法庭開始審查。農民對於這個完全由貴族組成的法庭提出抗議。在答覆這件事上，曾宣佈了一道帝國詔書（imperial edict）。當審查延滯中，貴族、諸侯和斯哇比亞聯盟政府都預備戰事。佛迪蘭德公爵（Archduke Ferdinand）——他除了當日屬於澳大利的世襲領土之外，也管轄了武頓堡，黑森林和南亞爾薩斯——命令用最殘酷的手段對待判道的農民。許多農民被捕，受無情的拷問和殺戮；他們在最神速的情形之下被剝滅了，他們的財產被焚燒和掠奪。

了，他們的妻子被驅逐出境了，這就是諸侯和領主遵守休戰條約的方法，這就是
和平公斷和審查人民疾苦的情形。佛迪蘭德公爵，從奧格斯堡的威爾梭（Welsch）之家借得金錢以後，小心翼翼的武裝自己。斯哇比亞聯盟命令「徵收」特別
稅，並三期募足軍隊名額。

上面的農民暴動，會逢其適。正是五月來孟彩爾帶留海蘭德（Highland）^①的
時候。他影響到這次運動的勃發和過程之直接的證據雖說沒有，然而間接之證
據是確實的。在農民中最直言無忌的革命家，大半是他的弟子，即擁護他的理想
之人。十二個條件（The Twelve Article）^②，如海蘭德農民之條件所附的書信
（The Letter of Article of the Highland Peasants）一樣，——雖然前者的確不是
孟彩爾所寫的——所有當時的人都認為是他的手筆。在他回到喬林基的途中，他

① 俄日譯本都作 Oberland。

② 十二個條件見本書附錄。

對暴動的農民曾發出左右全局的革命宣言。

自一五一九年以來，從武頓堡放逐的烏爾利黑公爵(Duke Ulrich)現在擬藉農民之助，陰謀恢復他的領土。他在放逐之初，曾經勉力利用過革命的黨派，並且繼續維持它。在一五二〇——一五二四年之間起於黑森林和武頓堡的地方騷亂，大抵都牽涉到他的名字。現在他離開賀亨特威爾(Hohentwiel)城堡，爲直接進攻武頓堡而親身準備戰鬥。然而他僅僅被農民利用了，却沒有影響農民和得到農民的信任。

冬天過去了，在兩方面都無重大的事變。站在諸侯方面的領主已匿跡銷聲。

農民暴動則日見擴大。一五二五年正月，多瑙河(Danube)、萊茵和利黑(Li)之間的全境，都在混亂的狀態中。二月就暴風雨般爆發了。正當布爾根巴恩的漢斯·密勒所指揮的黑森林黑加農軍(The black forest-Herzau troop)和武頓堡的烏爾利黑相策應，且有一部分向斯托特加參加他的勞而無功的遠征之期間(一五二五年二月至三月)，在烏爾摩(Ulm)上方之利德(Ried)的農民，於二月

九日起來，集合於爲沼澤所包圍的巴爾特林根（Baltringen）附近的陣營內，高舉紅旗，在烏爾利黑·希米德（Ulrich Schmid）領導之下，組成巴爾特林根農軍（the Baltringen troop）。他們有一萬到一萬二千人之兵力。

二月二十五日，亞爾加上部農軍（the Upper Allgau troop），約七千人的兵力，集合於休瑟爾（Schöser），他們是受了這種謠言鼓動起來的，即農軍起來反對那些不滿意的分子，這種不滿意的分子在這個地方，正像其他各地方一樣，已經出現。在冬季和大僧正門爭之肯蒲頓（Kempler）的人民亦於二十六日集合，並和農民聯絡。門明根和加夫伯倫（Kaufbeuren）諸城市在一定條件之下參加運動。諸城市在運動中的態度曖昧已經暴露出來。三月七日，十二個門明根條件在門明根地方爲亞爾加上部全體農民宣佈了。

依據亞爾加農民的通知，君士坦斯湖（Lake Constance）地方，在耶特爾·漢斯（Eitel Hans）領導下成立了水軍（the Lake troop）。這水軍地增長迅速。其司令部在伯馬廷根（Bermatingen）。

在亞爾加下部，在阿希遜哈遜（Achenhausen）和謝倫堡（Schellenberg）地方，在志伊爾（Zeil）和瓦爾德堡地方，即特魯黑西的領土，農民也蜂擁而起。運動在三月初開始。這支亞爾加下部農軍（Lowe's Allgau troop）有七千人，駐紮在武查黑（Wurzach）附近。

一切農軍都採用了門明根條件（Memmingen Articles），必須指出的，這些條件還比黑加條件（the Hegau articles），格外溫和些，就是：關於武裝農軍對於貴族和政府的態度這一點，很明顯的缺乏決斷。這種決斷只到了戰爭的後期，當農民從經驗上知道敵人的行動方式的時候，才到處表現出來。

與這些農軍同時成立的有多瑙河的第六農軍。從烏爾摩到頓納費特（Donauwoerth）全境，從伊勒（Iller），洛特（Loth）和比伯爾（Biber）流域，許多農民都奔赴萊蒲海（Leipheim），並在那裏張開陣營。各個體魄堅強的壯丁來

● 這句英譯本微有錯誤，從德日譯本改正。

自十五個地方。同時許多援兵則來自一百十七個地方。萊蒲海農軍 (the Leipheim troop) 的領袖是烏爾利黑休恩 (Ulrich Schoen)。他的傳教師是萊蒲海的僧侶猶可怕·威葉 (Jakob Wite)。

所以，在三月初，斯哇比亞南部六個陣營內手執武器的暴動農民有三萬到四萬人。這些農軍是極龐雜的。孟彩爾的革命派在各處都是少數，但這一派成了農民陣營內的脊幹。農民羣衆在希望用自己威嚇的態度強迫其敵人承諾讓步的那些地方，常常預備乘機與領主訂立協約。再則當暴動延長，諸侯的軍隊開始迫近的時候，農民已疲憊了。手中還有一點東西的那一部分人則逃回故鄉。另外更加上一層困難。即下層無產階級中江湖浪蕩的羣衆加入農軍。這些人不守紀律，誘壞農民，因為江湖浪蕩之人都是不可信任的分子，時來時去。單單就這一件事，滿可解釋：何以農民開始在各處只取守勢，何以他們在陣營中日趨頹敗，何以——更加戰術上缺乏，良將稀少——他們不能對抗諸侯的軍隊。

正當農民集合中，烏爾利黑公爵率領新兵及一部分黑加農民從賀亨威爾向

武頓堡進攻。如果此時農民從他方面，從瓦爾德堡襲擊特魯黑西的軍隊，那麼，斯哇比亞聯盟或許潰滅。但四農軍採取守勢，特魯黑西迅速成功了和巴爾特林根、亞爾加、君士坦斯湖的農軍締結休戰條約，開始談判，指定日期即鳩迪加禮拜日（Judica Sunday）。——四月十一日——完結全部事件。同時，他能進攻烏爾利黑公爵，包圍斯托特加，強迫烏爾利黑於三月十七日捨棄武頓堡。此後，他回轉來反對農民，可是農奴兵在他自己軍隊中暴動了，拒絕進攻農民。特魯黑西善於調解這些激怒的兵士並移向烏爾摩，在那裏新的援軍又集合了，他留一隊守望的兵士駐紮於特克（Teck）[●]附近之基爾黑海（Kirchheim）地方。

後來：這用自由手腕的斯哇比亞聯盟，拋棄了假面具，宣佈「藉手中武器和上帝的福祐，預備制止農民的自由行動」。

● Teck 這一個字，本章中凡四見。英日譯本在此處錯譯為指揮官之名，茲參照

俄譯本及前後文事實關係改正。

農民嚴守休戰條約。在鳩迪加禮拜日，他們提出自己的要求——即有名的十二個條件——以供審查。他們要求公衆有選舉和罷免僧侶之權；廢止小什一稅，大什一稅除支給僧侶薪俸外概歸公用；廢止農奴制度、漁獵權、及死亡稅；限制過度的奴隸勞動、賦稅和地租；從公衆和個人手中強制奪來的森林、牧場及特權，一律歸還；消滅法庭及行政機關的任意處分。很明顯的在農軍間溫和妥協派佔了優勢。革命派早在「條件所附的書信」(the letter of articles)之中製成它的綱領。這封書信是給全體農民的公開文書，誥誡他們或用善意——「這是不易實現的」——或用暴力求達除去一切負擔之目的，須加入「基督教同盟和兄弟會」(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Brotherhood)，並且用「世俗的斥革」(by Anathema)威脅那些拒絕加入的人，就是說，誰拒絕加入，就把誰從社會和從同盟會員間一切交際中驅逐出去。除非貴族、僧侶、教徒自動的拋棄自己住所，遷入和一般人同樣的普通房廬，且加入基督教同盟，那麼，按照這封書信說來，一切城堡、僧院和僧侶的財產也要受「世俗的斥革」之處分。我們看到這篇

急進的宣言——這篇宣言顯然是在一五二五年春天暴動之先起草的——首先說及推倒統治階級所得完全勝利的革命；我們又看到「世俗的斥革」僅僅指明那些壓制者和叛變者應該殺死，城堡應該焚燒，僧院和財產應該沒收，他們的珍寶應該換成現金而已。

在農民還未把十二個條件向正式的公斷者提出之先，他們即聽得斯哇比亞聯盟破約和敵軍追近的消息。農民馬上採取相當步驟。亞爾加、巴爾特林根和君士坦斯湖的農民大會在加斯伯倫（Gaisbühl）開了。四部分農軍都聯合起來，編成四縱隊。議決沒收教會財產，拍賣他們的珍寶以裕軍餉，燒毀城堡。因此，除了正式的十二個條件之外，那封「條件所附的書信」，成了戰爭的標準，預定締結和平談判的鳩迪加禮拜日，變成總暴動的日期（the date of general uprising）。

到處增長的激昂，農民和貴族不斷的地方衝突，在黑森林六個月來高漲的暴動消息以及這次暴動擴張到多瑙河和利黑的消息，都充分說明全體意志三分之二的農民暴動之迅速成功。然而同時發生局部暴動的事實，都證明站在運動陣前的

和組織運動的那些人都藉助於再洗禮派及其他密使。三月後半月，在武頓堡、賴加爾（Neckar）下部、阿登瓦爾、法蘭哥里亞上部和中部，都爆發了騷亂。四月二日即鳩迪加禮拜日已定為各處總暴動的日期；而各處決定勝負的攻擊，羣衆的暴動，恰起於四月第一週內。亞爾加、黑加，以及君士坦斯湖的農民在四月一日鳴了警鐘，把大批體魄強健的壯丁都吸引到陣營中去，且與巴爾特林根農民聯合，他們立刻宣佈敵對行動，反抗城堡和僧院。

圍繞六個中心而起運動的法蘭哥里亞，在四月初間，暴動到處爆發了。當時洛德林根有二個陣營成立，在安頓·華賴爾（Anton Forrer）領導下的城市革命派，藉農民之助，佔着上風，任命華賴爾為市長，締結城市和農民之間的同盟。在安斯白黑（Ansbach）地方，從四月一日到七日，各處起了農民暴動，而且暴動從這裡擴張，遠及於巴斐利亞（Bavaria）。在盧頓堡（Rottenburg）地方農民已於三月二十二日武裝起來。在盧頓堡市，名門望族的統治被斯特芬·封·門辛根（Stephan von Mienzingen）所領導的下層中等階級和平民推翻了，但因

農民的賦稅是城市收入的主要來源，所以新政府對於農民能夠維持一種動搖和曖昧的態度。在武廷堡（Wirtzburg）的大僧侶管轄區域，四月初曾發生農民和小城市的約基勒，在羅堡（Rothenberg）僧侶管轄區域，總暴動在五日内逼迫僧正退讓。在北方，喬林基的邊境，建立了強大的比爾德哈遜（Bildhausen）的農民陣營。

在阿登尼爾，威德爾 亨蒲勒（Wendel Hupler）——貴族和賀亨洛（Johanne）伯爵以前大臣——和喬治·明志勒（Georg Mezier）——克勞特海（Krauthausen）附近巴倫堡（Bullenberg）的旅館主人——是革命派的首領。暴風雨（般的騷動）發生於三月二十六日。農民從四方八面奔赴達伯喬（Tauber）。由德頓陣營來的二千人聯成一氣。喬治·明志勒任指揮官，接受各處援軍，於四月四日同雅克恩特（Jacques）河岸的維達勒（Widale）僧院前進，在那裏和賴加爾波羅民相會。由海爾德蘭（Heilbrunn）附近波德根（Boeckingen）的旅館主人雅克萊·盧爾巴恩（Jacques Kornbach）率領之賴加爾流域的農民，

於鳩迪加姆（Diep），在法萊因（Falen），蘇特海（Southern）等處宣佈暴動，同時，威德爾，亨蒲勒率領一部分黨羽，襲取阿林根（Oerlingen），並吸引四圍農民參加運動。在維達爾，組成華英軍的兩支農民縱隊接受了十二個條件，而且組織進攻城堡和僧院的遠征隊。華英軍約八千人的兵力，有大砲和三千枝槍。法蘭哥里亞的騎士——法洛梁，格萊爾（Florian Geier）也加入隊伍中，並組織黑軍（Black Host），〔所謂黑軍〕即大半從盧頓堡和阿林根步兵中徵募而成的精英隊（Select division）

在賴加爾（Neckarsulm）的武賴堡官長——路德威，封，亨芬斯達伯爵（Count Ludewig von Helfenstein）——〔對農民採取〕公開敵對行動。他不費一舉手之勞，把落到掌握中的農民一律處決。華英軍向他進攻，農民為免次屠殺所激怒了，這恰像聽到萊浦海農軍的敗北，雅可伯，威葉的處死，特魯黑西的殘暴等消息所引起的憤怒一樣。輕車深入威斯堡（Wiesloch）的封，亨芬斯達受了襲

● 華英軍（Guy troop）就是服裝整齊器械完備的隊伍

擊。城堡受法洛梁·格萊爾的猛攻。經長期戰爭之後佔領城市，路德威伯爵和許多騎士一様都成俘虜，其中有十四人，和其首領封·亨芬斯達，處以鞭刑。這種最殘酷的死是他爲俘虜新創出來的。威斯堡的佔領和雅克來對於封·亨芬斯達的恐怖手段已影響到貴族。封·洛賓斯達 (von Loebenstein) 伯爵加入農民同盟。從前加入同盟未給任何援助的封·賀亨洛伯爵立刻送了所希望的大砲和火藥來。

關於推舉哥志·封·柏利亭根 (Goetz Von Berlichingen) 爲總司令，「因他能吸引貴族到自己這方面來」的問題，在諸領袖之間起了爭論。這提案可決了，但在農民和其領袖的精神中看出反動萌芽的法洛梁·格萊爾，率領他的黑軍，從農軍中退出，先經過賴加爾地，其次又到武志堡境內，到處破壞城堡及僧侶的巢穴。

● 鞭刑 (run to gauntlet) 施是刑者排列兩行，執鞭對立，令犯人奔行其間，執鞭亂打。

剩下的農軍首先向海爾伯蘭進發。在這個強大和自由的帝國城市中，幾乎像一切地方一樣，與開明之家對立的是中等階級及革命反對派。和農民有密約的中等階級及革命反對派於四月十七日在大騷亂的過程中，打開城門迎接喬治·明志勒和雅克來·盧爾巴恩。農民領袖率其部下佔領了城市。這個城市加入同盟●並徵集一萬二千基爾德（quilder）貨幣和一隊志願兵。僅僅僧侶和條頓派（Teutonic Order）的財產受了劫掠。二十二日農民調開，留下少數駐防兵士。指定海爾伯蘭為各種農民的中心，在實際上農軍只派代表來，討論農民的共同行動和共同要求。但中等階級反對派及從農民侵入後締結同盟的名門望族，在城市中恢復了優勢，他們阻止城市採取堅定的步驟，並且為確定出賣農民起見，只等諸侯軍隊之到來。

農民向阿登瓦爾進。哥志·封·柏利辛根，數日前獻身於白拉庭大選舉候

●這句依照俄日譯本。英譯本與此不同，為「農民領袖及其部下加入同盟」。

(grand elector Polatine) 其次轉向農民，後來又回到大選舉侯方面，在四月二十四日他不得已而加入福音同盟，且握住華英軍^①的最高指揮權（與法洛梁·格萊爾的黑軍對立）。可是他同時成爲農民的俘虜，農民不相信他，把他交給首領會議看管，不經首領們允許他不能做任何事。哥志和明志勒率領農民羣衆經過布亨（Buchten）到亞莫巴黑（Amorbach），從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五日止，他們在那裏逗留，引起梅茵全境騷亂，各處貴族不得已而加入同盟，因此，其城堡可安全無恙，只有僧院飽受焚掠。農軍已無疑的墮落了。一些最奮進的人都跟隨法洛梁·格萊爾或跟隨雅克來·盧爾巴黑走了；雅克來·盧爾巴黑在佔領海爾伯蘭以後，也和農軍分開，顯然因爲他審判了亨芬斯達，不能再和那些贊成和貴族妥協的人合作了。這種和貴族妥協的主張即是墮落的信號。不久，威德爾·亨蒲勒提

① 英譯本爲 Gay Bright troop，在本章中凡八見，與 Gay troop 微有不同，但俄日譯本關於這兩名詞却無區別。所以我依照俄日譯本，把 Gay Bright troop 也譯作華英軍。

出一個很適當的提議改組案。他提議徵募做日工的農奴兵，不再用每月招集新兵遣散舊兵的方法。改組隊伍，只讓多少受了一點軍事訓練的兵士就保留下來。公社會議否決了這兩個提議。農民已變成做氣凌人，認為全部戰爭不過是搶糧而已。他們一到糧包裝滿的時候就要滾滾回家，即令有農奴兵的戰爭亦不能使他們改正多少。在亞莫巴恩，烏勞因到如此地步。海爾伯蘭農會的議員漢斯·柏林（Hans Berlin）勸導農軍的首領和委員會接受「十二個條件的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Twelve Articles），在宣言之上，刪去十二個條件中所保留的銳利條款，同時插入一些農民委曲求全的詞句。這件事對於農民太難堪了，農民在十分險境之中就否認這篇宣言，堅持原來條件。

同日，在武志堡地方起了決定全局的轉機。四月初間第一次暴動爆發後，僧正雷德或武志堡的夏爾富特（St. Gallen），從那裡向四方八面求援無效，結局，不得不作暫時的讓步。五月二日，議會開會，農民代表參加，但當未得任何結果之前，檢得一封證明僧正叛背陰謀的信。議會立刻解散，敵對行動重

新開始了，一方面是叛逆的市民及農民，另一方面是僧正的勢力。五月五日僧正逃到海德爾堡 (Heidelberg)，次日法洛梁·格萊爾率領黑軍抵武志堡，跟着他來的有莫根海 (Mergentheim)、盧頓堡和阿斯自農民組成的法蘭哥里亞·達伯的農軍 (Franconian Tauber troop)。五月七日哥志·封·柏利亨根率領英軍來了，開始圍攻富勞恩堡。

在林卜 (Limburg) 附近，和萊爾王根 (Ellwangen)、哈爾 (Hall) 地方，於三月末四月初，另一枝農軍，即加爾多夫 (Gaidort) 或叫普通華英軍 (Common Gay troop) 又編成了。它的行動是很強暴的。這支農軍擾亂全境，焚毀許多僧院和城堡，賀亨斯達芬 (Hohenstaufen) 城堡亦在其列，強迫一切農民加入同盟，強迫一切貴族，甚至林卜酒店，加入基督教同盟 (Christian Alliance)。五月初侵入武頓堡，但因勸解撤退。德意志的小國分立制度，在當時也像一八四八年一樣，妨害各小國革命者的共同行動。在其境內的一切反抗已經削平後，這支爲小而積所限的加爾多夫農軍必然要歸於消滅。這支農軍隊伍和格孟得 (Gmund)

）城市締結協約，只留下五百武裝的人，其餘都解甲還家。

在白拉廷納特（Fantinate），四月末，於萊茵河的兩岸，成立農軍。他們破壞許多城堡和僧院，並在五月一日，佔領哈爾德（Hardt）河岸的賴斯達德（Reisstadt）。在這個地方出現了伯魯黑拉因（Bruchrain）農民，於數日前強迫斯白伊爾（Speyer）締結協約。查伯恩（Zabern）將軍率領選舉侯的少數隊伍，無力抵禦農民，五月十日選舉侯迫不得已和農民締結協約，保證在議會中實行解除農民的痛苦。

在武頓堡，暴動早已起於一些分散的區域。二月，烏拉黑·亞爾卜（Urach Alp）的農民組織同盟反抗僧侶和領主，三月末，伯勞波爾（Blaubauer）·烏拉黑·孟生根（Muensingen）·巴林根（Balingen）和洛通斐爾（Rosenfeld）的農民暴動。在武頓堡境內，有加爾多夫農軍侵入哥平根（Geppingen），有雅克來·盧爾巴黑侵入伯拉鏗海（Breckenheim），有戰敗的萊蒲海農軍的殘部侵入蒲夫林根（Pfeilinden）。所有這些客軍引起鄉村人民的騷動。在其他地方也有嚴重的

擾亂。四月六日，蒲夫林根降服於農民之前。奧大利大公爵的政府陷入極困難狀態之中。它沒有貨幣，而且只有少數軍隊。許多城市和城堡處在窘境，缺乏駐防兵和軍需品，甚至亞斯佩爾（Asperg）在實際上毫無防禦。政府召集城市後備軍抵禦農民，企圖鞏定了它的臨時失敗。四月十六日，波特瓦（Hottent）城市的後備軍拒絕服從命令，不赴斯達特加（Stettin），而向波特瓦附近的烏倫斯達（Wunnenstein）前進，他們在那裡形成中等階級和農民陣營的核心，而且發展迅速。同日在查伯加（Zakertan）的暴動爆發。馬爾伯蘭（Marlboum）的僧院受了搶劫，許多僧院和城堡都焚毀了。加烏（Gau）的農民從鄰近伯魯黑拉因得着援軍。

烏倫斯達農軍的首領由馬特·費爾巴恩（Matth. Feinbacher）擔任，他是波特瓦城市的議員，是中等階級反對派領袖之一，富妥協性，迫不得已而與農民聯合。可是他不管新的聯盟者，依然保持溫和態度，禁止城堡實行那封「條件所附的書信」，到處營謀農民和溫和的中等階級融洽。他妨害武頓堡農民和華

英軍司令。稍後，他勸解阿爾多夫將軍從武頓堡撤退。四月十九日他因有中等階級傾向去職，但次日又做首領，他是一個不可少之人。甚至在四月二十二日雅克·盧爾巴黑率其部下二百人來，加入武頓堡農軍隊伍的時候，他仍讓費爾巴黑居於首領地位，自己僅為費爾巴黑的行動之真正監督者。

四月十八日，政府企圖和駐紮在烏倫斯達的農民談判。農民要政府承認十二個條件，但政府代表拒絕之。現在農軍繼續行動。四月二十日，農軍抵勞芬（Lauten），在那裡它最後拒絕政府代表的提議。四月二十二日，有六千農軍出現於比特海（Bitthelm），威嚇斯托特加。市議會議員大半逃走，市民委員會主持行政。這裡市民像他處一樣，分為名門望族、中等階級反對派和革命的平民派。四月二十五日，革命的平民派為農民開城門，斯托特加馬上落於農民之手。在這裡完成了華英基督教農軍的組織（照武頓堡暴動者喊他們的話），製定俸給，捕獲品和食物的分配之規程。在特斯·格伯爾（Theis-Gebler）指揮下的斯達特加支隊加入農軍。

四月二十九日，費爾巴黑率其部下抵魏那侵入武頓堡境內休爾多夫地方的加爾多夫農軍。他吸收全境加入他的同盟。於是，勸說加爾多夫農軍撤退。他用這種方法，阻止自己的隊伍中爲盧爾巴黑領導的革命分子與加爾多夫不顧利害的農軍聯合所增加的危險性。他接得特魯黑西逼近的報告以後，即離開休爾多夫去迎擊特魯黑西，五月一日駐紮特克（Teck）附近之基爾黑海（Kirchheim）一帶。

我們已經追尋了德國一部分暴動的起源和發展，這一部分必須看做農軍第一集團的活動區域。在我們敘述其他集團（喬林西、亨西、亞爾薩斯、奧大利及阿爾卜斯（Alps）之先，必須估計特魯黑西的軍事行動，在這種軍事行動中，他最初是孤獨的，後來得着許多諸侯和城市的援助——消滅了暴動者的第一集團。我們會說到特魯黑西移近烏爾摩，他是在三月末，留下一隊守望的兵士在特克地方，交迪特利黑·斯白特（Dietrich Specht）指揮以後，到烏爾摩來的。由聯盟援軍聯合起來集中到烏爾摩之特魯黑西的軍隊，不是一萬人，其中有七千二百步兵，這是在他指揮之下能够進攻農民的唯一軍隊。援軍到烏爾摩很遲緩，一部

分由於暴動區域補充困難，一部分由於政府手中缺乏貨幣，而且各處又必需有少數可靠的隊伍駐防要塞和城堡。我們已經看到有一小部分軍隊是在未加入斯哇比亞聯盟的諸侯和城市指揮之下。萬事都隨喬治·特魯黑西率領的聯盟軍隊所得之結果為轉移。

特魯黑西首先掉頭來進攻巴爾特林根農軍，當其時，這支農軍已經開始毀滅利德（Reid）附近許多城堡和僧院。因聯盟軍的追近逼到利德附近的農民，被四方運動所迫而逃出濕地，越過多臘河，一直跑到斯哇比亞、阿爾卜斯的山谷和森林之內。在這個地方，為聯盟軍隊主力之砲隊馬隊失掉作用，所以特魯黑西不再向前進追擊農民。他不進攻來蒲海農軍，這支農軍有五千人駐紮來蒲海，四千人駐紮敏得爾（Mindel）地方，六千人駐紮伊勒迪遜（Illertissen），正在引起全境騷動，破壞僧院和城堡，而且準備着三個縱隊進攻烏爾摩。似乎在這一部分農民之間已種下某種墮落的根苗，這種墮落已經摧毀軍事風紀，因為雅可伯·威葉在最初想同特魯黑西進行談判。然而特魯黑西現在背後有十足的軍事力量。

謝絕談判，四月四日，進攻來蒲濼的主力軍，而且完全擊破了他們。雅可伯·威葉、烏爾利黑·休息，及其他兩個農民領袖，都被捕斬首，來蒲濼投降了，經少數隊伍向四周追剿之後，全境也征服了。

巴爾特林根農軍侵入特魯黑西的領域瓦爾德堡（Waldburg），志伊爾（Zeil），武爾斐格（Wülfig），並圍攻其城堡，特魯黑西即向西南前進抵抗巴爾特林根農軍；正在這個時候，為要求剝掠和加俾而起的農奴兵新暴動，又阻礙了特魯黑西的活動，一直到四月十日止。在這裡，他也看出農軍的分裂；四月十一和十二兩日，在完全擊破巴爾特林根農軍的數次交戰中，把農軍各個打敗了。其殘部在僧侶法洛梁（Florian）指揮之下撤退並加入水軍（The Lake troop）。現在特魯黑西轉向水軍攻擊。這支水軍不僅從事戰鬥，同時也吸引布黑賀恩（Buchhorn——即Friedrichshafen）城市和武爾馬廷根（Wollmatingen）城市加入同盟。四月十三日，在薩倫（Salem）僧院開大軍事會議，決定迎擊特魯黑西，到處警鐘響了，集合於伯爾馬廷根陣營的有一萬人，更加上巴爾特林根農軍戰敗的

殘部。四月十五日，他們站在有利的地位和特魯黑西開戰；特魯黑西不願在決定勝負的戰爭中，孤注一擲，提議談判，他接得亞爾加農軍迫近的消息以後，希望談判之心益切。四月十七日，在威加頓（Weinarten）他和君士坦斯湖及巴爾特林根農軍締結協約。這協約，表面上似乎有利於農軍，他們就毫不猶豫的接受了。他又勸誘亞爾加上下兩部農民代表接受這協約，此後，他便赴武頓堡。

特魯黑西的狡詐，把自己從必不可免的失敗中挽救出來。如果他愚弄這柔弱、狹隘、大部分墮落的農民及其庸碌、怯懦、貪利的首領不能成功，那麼，他帶領少數軍隊勢必坐困於人數至少有二萬五千到三萬的四個縱隊包圍之中，而且勢必消滅。其敵人之狹隘心情——這是農民羣衆中常常不可避免的——使他在敵人只用一擊即可結束全部戰爭的時候——至少像斯哇比亞和法蘭哥里亞情勢一樣——有出賣敵人之可能。君士坦斯湖農民遵守這種作繭自縛的協約如此嚴格，以致舉起武器反對自己的同盟者——黑加農民，而為領袖所誤捲入迷惑中的亞爾加農民，雖然立刻拒絕這種協約，但此時特魯黑西已出了危險。

黑加農民雖未加入威加頓協約 (Weingarten Agreement)，却是做了可驚的地方狹隘性和頑固的地方割據性之新榜樣，這種地方狹隘性和地方割據性是毀滅全部農民戰爭的。在特魯黑西和他們締結無效的協約之後，他移向武頓堡，他們追隨其後，繼續壓迫他的側面，但是他們未曾聯絡武頓堡華英基督教農軍，因為以前武頓堡和賴加爾流域的農民對他們的求援曾拒絕過。到了特魯黑西離開他們的家鄉很遠之時，他們轉向和平，且赴富勒堡 (Freiburg)。

我們曾說到馬特·費爾巴黑領導的武頓堡農民駐紮於阿克附近之基爾黑海地方；由特魯黑西留下守望的兵士已在迪特利黑·斯白特指揮之下，從基爾黑海撤退移向烏拉黑。費爾巴黑在企圖進攻烏拉黑未見成效以後，轉赴紐廷根 (Neuringen)。送信給一切鄰近暴動的農軍，為決定勝負的戰鬥而請求援助。實際上有很多援兵從武頓堡低地來從加烏來。加烏農民繞着退到西武頓堡的萊浦海農軍殘部而集合起來，他們擾亂了賴加爾和納哥爾德 (Nagold) 整個流域，上達波伯林根 (Boeblingen) 和里昂堡 (Leonberg)。五月五日，加烏農民有二個縱

隊到來，在紐廷根與費爾巴黑聯合。特魯黑西在波特林根（Roellingen）和同盟農軍相遇。農軍的人數、大砲和共陣地都使特魯黑西驚駭。他照通例提出談判和農軍締結休戰條約。但是他剛剛穩固了地位，即在休戰期間的五月十二日，襲擊農軍，強迫農軍作決定勝負的戰鬥。農軍實行長期的勇敢的抵抗，一直到最後因為中等階級叛變，波特林根讓給特魯黑西而止。失掉根據地的農軍左翼困於重圍之中。這是決定勝負的一戰。未經訓練的農民陷入無秩序狀態，稍後，就四散逃亡；未被聯盟軍馬隊殺死或捕獲的那些人，都棄斥武器，潛歸故鄉。

華英基督教農軍和整個武頓堡暴動都消逝了，特斯·格伯爾逃往萊斯林根（Baslingen），費爾巴黑逃往瑞士，雅克來·盧爾巴黑被捕，捆送到賴加爾加達（Neckargartich），在那裡，特魯黑西下令鎖他於柱上，圍以木柴，在慢火之下燒死；同時，特魯黑西向其騎士飲宴，賞玩這種貴族的奇觀（noble spectacle）。特魯黑西從賴加爾加達（出發），侵入克拉黑加（Kreithan）以援助白拉廷選舉侯。當時已經集合軍隊的選舉侯，聽到特魯黑西勝利的消息，立刻同農民

破約，於五月二十三日，進攻伯魯黑拉因，受了猛烈的抵抗之後，佔領並焚燒了馬爾西（Marsi），擄掠許多鄉村，駐兵於布魯塞爾（Bruchsal）。同時，特魯里列諾文德萊平根（Trüben），捕獲地方運動領袖安頓·葉生胡特（AntonWagner），選與候立刻把安頓·葉生胡特及其他十二個農民領袖處死。於是布魯塞爾和克拉黑加都屈服了，勒索贖款四萬左右基爾德。戰爭的結果，特魯黑西的軍隊減少到六千人，選舉候則有六千五百人；這兩部分軍隊聯合起來向阿登瓦爾前進。

沙特林根失敗的消息在到處暴動者之間散佈了恐怖。而農民高壓下的各自由帝國城市却都吐了一口氣。海爾伯蘭城市首先向斯哇比亞聯盟表示妥協。海爾伯蘭是農民主要機關和各農軍代表的駐在地，他們深思熟慮之後，製成了一種提案，屆全體發動農民的名義，送交皇帝和帝國。在提出關於奈德意志普通法律的這些會議中，又顯然看出現存各等級中——包括農民在內——還沒有一個等級已充分發展到能夠按照自己的觀點去改造整個德意志。要完成這件事，必須得着農

民，特別是中等階級的擁護，是很明白的。結果，威德爾·亨蒲勒取得這次會議的指揮權。威德爾·亨蒲勒在這次運動的一切首領中是最了解現存狀況者。他不是一個有遠見的孟彩爾式之革命家；他不是像明志勃和盧爾巴恩一樣的農民代表。他的多方面經驗，他的各種等級地位的實際知識，阻止他成爲參加這次運動反對其他一切的各等級中其一偶等級的代表。依照事實，威德爾·亨蒲勒是全國中各種進步分子中庸的代表，預則着近代資產階級社會；恰如孟彩爾是當時排斥於現存社會正式組織之外的無產階級初期代表，預期着共產主義一樣。他所擁護的原則，他所提出的要求，雖不能立刻實現，然却是封建社會崩潰中幾分理想化經濟化的結果。只要農民贊成適用於全德意志的法律提案，那麽，他們就不得不接受亨蒲勒的原則和要求。在海爾伯蘭，爲農民所要求的中央集權制，採取了明確的形式，這種形式是和農民理想中的中央集權制相去萬里的。舉例說，中央集權制有幾種不同的規定，藉立統一貨幣制和度量衡，廢止國內關稅等等；換言之，這對於，與其說是適合於農民的利益，勿寧說更適合於城市中等級的

利益。對於貴族的讓步確實近於現代贖回制度，而其最後的方向是轉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資產階級的土地所有制。總而言之：假使農民的要求和「帝國改革」的制度打成一片的話，那末這不是表現農民的臨時要求，僅僅是（把農民的要求）附屬於整個中等階級共同利益之下。

這種帝國的改革還在海爾伯蘭進行討論的時候，十二個條件宣言的起草者——漢斯·柏林已在途中迎接特魯黑西，用名門望族、中等階級及市民的名義，談判城市投降問題，在城市的反動運動幫助了這次叛變，威德爾·亨蒲勒像農民一樣，被迫逃走。他往威斯堡，企圖集合武頓堡農軍殘部及能受指揮的加爾多夫農軍的一小部分。然而白拉廷選舉侯和特魯黑西的逼近，迫他離開那裡，他不得不到武志堡使華英軍再起活動。同時，聯盟軍和選舉侯征服賴加爾地方，強制農民重新宣誓，焚毀許多鄉村，刺殺或絞死那些在逃亡中被捕的農民。為報亨芬斯達被殺之仇，把威斯堡城市付之一炬。

集合在武志堡戰線的農軍，當時包圍了窩勞恩堡。五月十五日，在未攻陷一

個破口之先，他們奮勇撲城的企圖都歸無效。精兵四百人，大半是法洛梁·格萊爾的部下，落在城壕之中，不是戰死，就是負傷。兩日以後，即五月十七日，威德爾·亨蒲勒到了，召集軍事會議。他提議只留四千人在奮勞恩堡，把主力軍——約二萬人——移駐雅克思特河岸的克勞特海，正當特魯黑西的眼前展開陣營，因此，一切援軍可以到那裡集中。這種「作戰」計劃是非常優美的。只憑羣衆團結，只憑人數衆多，都有打敗當日人數只一萬三千的諸侯軍隊之希望。然而農民的頹敗和喪氣，要想鼓起任何奮勇的行動實無一點可能。不久，哥志·封·柏利、亨根公和叛徒無異，阻止農軍前進。因此亨蒲勒的計劃不曾實行；農軍就像從前一樣分裂了，只到五月二十三日，華英軍在得着法蘭哥里亞人允許立刻接應以後才開始行動。五月二十六日，屯在武志堡之安斯、白黑侯爵的支隊，因為得到侯爵公開敵視農民的報告，才召集起來。其他之圍城軍，同法洛梁·格萊爾的黑軍，則駐紮在距武志堡不遠的海丁斯麥爾（Heidingsfeld）。

五月二十四日，華英軍抵克勞特海，情形極壞。許多農民聽到自己鄉村，在

他們離鄉的期中，已對特魯黑西的命令宣誓（服從），他們藉這件事爲口實而歸故里。農軍更前進到賴加爾蘇爾，於五月二十八日，同特魯黑西開始談判。同時，派許多驛使到法蘭哥里亞、亞爾薩斯及黑森林里加，請求農民火速救援。哥志從賴加爾蘇爾向阿林根前進。農軍漸漸瓦解了。哥志、封、柏利亨根也在行軍途中不見了，他乘馬還家了，以前藉其舊戰友迪特利黑、斯白特之介紹，他曾和特魯黑西談判倒戈投降事件。在阿林根，有了敵軍逼近的謠言，使無援喪氣的羣衆驚惶失措。農軍迅速的分崩離析了，明志勒和威德爾、亨蒲勒從艱難中團聚了二千人，他們再率領到克勞特海去。同時，法蘭哥里亞農軍約五千人的兵力來到，但因經過洛威斯達（Loewenstein）向阿林根側面進軍的結果——由於哥志明願施行叛變計劃的命令——它未遇見華英軍，並且移向賴加爾蘇爾。爲華英軍支隊所守護的這個小市鎮，被特魯黑西包圍。法蘭哥里亞人到時正在夜間，看見聯盟軍隊火光，但其指揮者沒有襲擊敵軍的勇氣。他們退到克勞特海，後來在那裡看見華英軍殘兵。賴加爾蘇爾因無援助，遂於五月二十九日向聯盟軍隊投降。

魯黑西立時下令殺了十三個農民，並去追逐農軍，經過賴加爾、高黑爾（Koch）、雅克思特各流域，沿路焚燒、劫掠、屠殺。廢物的堆積以及懸在樹上的農民屍體，都是他的行軍標誌。

聯盟軍隊和農民相遇於克勞特海，農民因受特魯黑西的側面運動之威脅，向達伯爾河岸的柯尼格赫芬（Koenigshofen）撤退。伯們在此紮營，有兵八千人及砲三十二尊。特魯黑西逼近他們，隱於小山和樹林之後。他派出縱隊包抄農軍，六月二日，他用這樣優越的力量攻擊他們，所以，不管農軍部隊夜以繼日的頑強抵抗，他們的損失和潰散了。像各處一樣，聯盟的騎兵，「制」了農民的死命，在消滅暴亂農軍上是主要的工具，騎兵追逐在砲火長槍襲擊之下，戰慄的農民，完全擊破了他的隊伍，而且殺死了個別的戰鬥員。爲特魯黑西及其騎兵所實行的這一種戰爭是實告會參加過農軍的三百名柯尼格赫芬中等階級之命運。在戰爭期間，農軍除十五人外，一概被殺，而且這剩下的十五人中，後來有四人亦被斬首了。

特魯黑西對於阿登瓦爾、賴加爾流域和法蘭哥里亞下部農民完成勝利以後，他藉助於殘暴的遠征隊肅清全境，焚毀全部村落，屠殺無數人民。他從那裡移向武志堡。在途中，他知道第二法蘭哥里亞農軍在法洛梁·格萊爾和格利果·封·堡伯斯海（Gregor Von Burg-Bernheim）指揮之下駐紮薩爾志多夫（Sulzdorf）。他立刻向他們進攻。

法洛梁·格萊爾，在全國猛攻富勞恩堡無效以後，盡大部分之力與諸侯及城市談判。特別是盧頓堡和加西米·封·安斯白黑侯爵（Margrave Cünmt von Anspach）慫恿他們加入農民同盟，但他聽到柯尼格赫芬失敗消息，馬上就把談判撤消。他的農軍和在格利果·封·堡伯斯海指揮下的安斯白黑軍隊聯合。安斯白黑軍隊只是最近編成的。加西米侯爵依照純粹的賀亨卓勒（Hohenzollern）的風度，一半是用「花言巧語的」承諾，一半是用龐大軍隊的示威，制止其境內的農民暴動。一切境外的農軍在未涉及安斯白黑人民的時候，他保持完全中立態度對待他們。他企圖把農民的怨恨主要的引向教會的財產，他並希望最後沒收教會財

產發財。他剛剛聽到波特林根戰爭的消息，即公開對抗自己境內判道的農民。劫掠和焚燒許多鄉村，絞死或用其他方法殺害許多農民。然而農民迅速集合了，且於五月二十九日，在洛利果，封·侯伯斯海指揮之下，把他打敗於溫志海（Windsheim）地方。當農民們還在追逐他時期，聽到受壓迫的阿登瓦爾農民求援的呼聲，他們即掉轉來赴海丁斯曼爾，並在那裡和法洛梁、格萊爾聯合再赴武志堡（六月二日）。當時尚無消息從阿登瓦爾傳來，他們留下五千農民在那裡，率領其餘四千農民——有許多跑走了——往別處去。他們相信柯尼格赫爾芬戰鬥結果的謠報，在薩爾志多夫受特魯黑西的襲擊，完全失敗。特魯黑西的騎兵和奴隸，依照慣例，實行恐怖的屠殺。法洛梁、格萊爾糾合黑軍殘部六百人，殺出重圍，通過亞哥爾斯達鄉村（the Village of Ingolstadt）。他命令兩百人佔領教會和墓地，四百人佔領城堡。（不料）白拉廷選舉侯的軍隊追上來了。其中有一千二百人的縱隊佔領鄉村，並且到教會內放火。從烈焰中逃出的農民復被屠殺。其次，選舉侯的軍隊火攻城堡，在古城壁中穿一破口，企圖一鼓而下。兩次被藏在城壁

內側的農民擊退了，他們把城壁打破，企圖第三次撲城，畢竟勝利了。格萊爾的部下半數被殺，他率領殘部二百人逃走。可是他們避匿之處，次日——即聖靈降臨節（Whit-Monday）——已被發現。白拉廷與畢侯的兵士包圍他們藏匿的森林，肆行屠殺。在那兩日之內只捕獲十七人。洛黎·格萊爾率領其少數最勇敢的戰鬥員，又被開一條血路，投向加爾多夫農軍，這支農軍又已集合七千人左右的隊伍。他到時，看見他們大半離散，這是從各方面接到潰敗消息之結果。六月九日，他作了一個最後企圖，糾合離散的農民於森林之下；「不幸」受敵軍襲擊，竟戰敗了。

特魯黑西在利尼格獲勝之後，立刻途信到受圍的富勞恩堡，現在他向武志堡前進。城市議會和他締結密約，所以，六月七日晚上，聯盟軍隊能夠包圍五千農軍防守的城市，次日早晨，甚至不告一矢，即能進城，其城門是議會自己開的。因為武志堡一名門望族「哈板曼」，以致法蘭哥里亞最後的農軍解除武裝，全體領袖成爲俘虜。特魯黑西立刻就斬了八十一人。形形色色的法蘭哥里亞諸侯，

都摩肩接踵到武志堡來，其中有武志堡的僧正，有班堡的僧正，有伯蘭敦堡安斯白黑（Brandenburg-Anspach）的侯爵。這些仁慈的貴族們自己分辦各種任務。特魯黑兩軍領班僅僧正進軍，這個僧正立刻破毀和農民所締結的協約，提供其領士於聯盟軍狂暴的隊伍之前，任其規掠、屠殺、焚燒，加西米侯爵蹂躪自己的領士。達寧根（Teinigen）被焚，許多鄉村被規掠，或成爲灰燼。有各城市中，侯爵設立流血的法庭。在亞伊西（Aich）河岸的賴斯達德（Neustadt），他斬了十八個綠徒，在標格爾·馬黑（Buerfel March），有四十三人受了相同的命運。他從那裡趕盧頓堡，同時在盧頓堡地方，名門望族已起反革命，並捕了斯特芬·封·門辛根。現在盧頓堡的下層中等階級和平民爲下面這種事實，不得不費了很高的代價，即是：他們對於農民懷抱一種曖昧不明的態度，到了最後的緊要關頭拒絕幫助農民；保存地方狹隘性的利己主義，主張壓迫農村手工業，以謀城市行會的利益；而且極不願意放棄從農民的封建剝削而流入城市的出源。侯爵下令殺十六人，門辛根也在其內。武志堡的僧正亦用同一方法搜索境內，到處

擄掠、蹂躪和焚燒。在他的勝利搜索中，共斬了二百五十六個暴徒，當他回到武志堡的時候，又從武志堡的暴徒中，斬了十三名以上，以完成其事業。

在梅茵志（Mainz）地方，總督——威爾赫姆·封·特拉斯堡堡正（Bishop of Wilhelm Von Strassburg）——很順利的恢復了秩序。他僅殺四人。從前農民也起過騷亂不久即歸家去的萊茵加（Rheingau）地方，後來為法洛溫·封·胡頓——烏爾利黑的堂兄弟——所侵入，結局，是殺了十二個頭目，才「鎮定」下來。富蘭克佛（Frankfurt）也曾見過大範圍的革命運動，首先向於議會的退讓態度，以後由於萊茵伯爵領土內補充軍隊，便抑壓下去。在選舉候破約之後，有八千農民重新集合起來，又焚僧院和城堡，但特利爾的大僧正（Archbishop of Trier）向查伯恩（Zabern）將軍求援，五月二十三日，大破他們於佛德斯海（Pledersheim）。接二連三的慘殺（僅在佛德斯海一處已殺八十二人）以及七月七日威遜堡（Weissenburg）的佔領，把這次暴動結束了。

一切農軍隊伍之中僅有兩支半被征服，即黑加黑森林農軍和亞爾加農軍。佛

迪蘭德(Herdinand)大公爵對這兩支農軍賣弄詭計。加西米侯爵和其他諸侯曾企圖利用暴動吞併教會領土和諸侯領土，所以迪蘭德願用相同的方法，利用暴動以加強奧大利王室(The House of Austria)的權力。他會和亞爾加農軍首領瓦爾特·巴恩(Walter Bach)·黑加農軍首領漢斯·密勒談判，其目的在勸誘農民宣言與奧大利結合，但是，兩首領難被收買，其影響農軍只能做到亞爾加農軍和大公爵締結休戰協約，對奧大利保守中立的地步。

黑加農軍從武頓堡引退的時候，破壞無數城堡。且從巴敦侯爵領域得到援軍。五月十三日，他們向富勒堡前進；五月十八日，用砲攻城，五月二十三日，城破，農軍高舉旗幟入城。他們從這裏往斯沃卡黑(Storkach)和拉多得佛基爾(Radolffzell)進軍。向這兩個城市駐防兵罷起了長期間的小戰。這兩個城市貴族及附近諸城市，依據威加頓協約向君士坦斯湖農民求援。從前水軍的暴徒有五千

① 英譯本把大公爵(Archduke)誤為大僧正(Archbishop)。

人的兵力起來反對他們以前的同盟者。關於一兩的農民，其地方狹隘性既如此之強，所以只有六百人拒絕戰爭，並表示願意加入黑加農民隊伍，爲這件事，六百人都被殺了。黑加農民本身受那已經買給敵人的漢斯·密勒的誘惑，放棄圍攻；漢斯·密勒逃走以後，他們的大部分就立時離散了。殘留的小部分在亨爾珍根（Hünzingen）峭岩中築堡自衛，七月十六日受當時換防退休的軍隊襲擊而消滅了。瑞士各城市曾和黑加農民締結協約，可是這協約——縱使漢斯·密勒在勞芬堡（Lauterburg）叛變——不能阻止城市方面捕殺漢斯·密勒。在伯勒斯加富勒堡城市也背棄農民同盟（七月十七日），並派軍隊反對農民，但因諸侯戰鬥力弱——這裡像他處一樣——成立一個協約（九月十八日）孫德加（Sunderau）亦參加在內。未解除武裝之黑森林和克勒特加（Klettgau）農民的八個集團，受森爾志（Senn）伯爵暴政的壓迫，再起暴動，十月間失敗了。十一月十三日，黑森林農民受迫而締結協定，十二月六日，萊茵上流暴動最後堡壘的瓦爾志胡特（Walzburg）也陷落了。

亞爾加農民，在特魯黑西撤兵後，重起了反抗僧院和城堡的運動，而且用強暴的手段回答聯盟軍隊的劫掠。他們遇着數目不多的敵軍，這些敵軍只能應接不遑輕重的小戰，不能追擊他們至森林之中。六月，向來保持幾分中立態度的門明根地方起了反抗名門望族的運動；恰在這個時候，有些援救貴族的聯盟軍偶然臨近，這次運動有受鎮壓之可能。平民運動的傳教師和指導者——夏白訥（Schäberle）逃往塔加倫（Tullau）。在聽得從武志堡出發正在途中的特魯黑西逼近的時候，農民已集合於城市之前，并準備開始攻城。七月二十七日，農民分兩縱隊跨過巴本哈遜（Babenhausen）和阿伯歐志堡（Oberhausen）。迪擊特魯黑西。迪恩德大公爵又企圖說服農民站在奧地利王室方面。他援引和農民締結的休戰條約，要求特魯黑西不再向前進攻農民。然而斯時比亞聯盟則命令特魯黑西攻擊農民，但禁止劫掠和焚燒。可是特魯黑西過於聰明了，即使他能夠控制那些爲他所指揮的從君士坦斯翻起到梅茵止蹂躪慣了的農奴兵，他也不會放棄自己主要的最有効力的戰鬥手段。農民聚在伊勒（Iller）和路易巴斯（Lutzelbach）背後，約

有二萬三千人。特魯黑西有一萬二千人紮在對面。兩軍陣勢都是令人驚嚇的。騎兵在前面的地勢上不能活動；如果特魯黑西的農奴兵在組織上，軍事方略上，紀律上都優於農民的話，那麼，亞爾加農軍中，有上過戰陣的部隊，有富於經驗的將領，有許多優良的大炮。七月十九日，斯吐比亞聯盟軍開始砲擊，這種砲擊兩方繼續到二十日，均無結果。七月二十一日，喬治·封·法蘭志堡（Georg von Frundsberg）率領三百農奴兵加入特魯黑西的隊伍。他知道曾在意大利遠征隊中受其指揮的許多農民將領，他和這些將領談判。在軍事方略屬於應付的地方，倒戈奏效了。瓦爾特·巴黑，幾個其他將領以及砲兵出賣了自己。他們到農軍火藥庫放火，勸誘農軍作迂迴運動，但農民剛剛離開自己強固的陣地，馬上陷入伏兵的陷阱中，這些伏兵是特魯黑西和巴黑及其他叛徒串謀預備的。他們不能防衛自己，因為叛變的將領藉微聲為口實已離開他們，而且走上赴瑞士的途中了。因此，兩支農民部隊完全潰滅。在克羅卜·封·路易巴斯（Knopl von Lubz）指揮下的第三部隊，還能整隊退却。這一支部隊在肯卜頓（Kempten）●附近哥倫

(Kollen) ●山上張開陣營，那裏是受特魯黑西包圍的。特魯黑西不敢攻擊農民，只斷絕他們一切供給，並焚燒其附近兩百個左右的村落，以餒他們的士氣。飢餓，和望見室裡被焚（的情形），結局使農民降服了（七月二十五日）。有二十餘人立刻處死。克羅卜·封·路易巴斯——不願降旗的農軍之唯一指揮者，逃往伯根志（Biegenz）。不料他在那裏被捕，長期監禁之後，被處絞刑。

因此，斯哇比亞和法蘭哥里亞農民戰爭歸於結束了。

● Kempen 一字，英譯本誤為 Kampfen，茲照俄譯本改正。

① Kollen 一字，俄譯本則為 Kollenberg。

第六章 農民戰爭紀實及其失敗的主要原因（下）

自斯咄比亞最初的運動爆發後，杜瑪斯·孟彩爾立刻又奔赴喬林基。二月末和三月初以來，他在自由帝國城市苗爾哈遜（Mühlhausen）設立了一些機關，這是他的黨派比較他處要強大些的地方。他執整個運動的總索於其掌握之中。他知道暴風雨將在南德意志爆發，他擔任使喬林基成爲北德意志運動之中心。他發見很肥沃的土地了。宗教改革運動主要區域的喬林基是風浪不息的池沼。受壓制農民的經濟痛苦，與流行之革命的、宗教的、政治的理論，同樣使鄰省——亨西、薩克森、——和哈志（Hesse）地方爲總暴動而準備。在苗爾哈遜地方，下層中等階級全階級都相信極端的孟彩爾理論，而且不能等待到自己的人數超過那些驕傲的貴門望族之時期。孟彩爾爲着不要發動於適當時期未到之前，所以他不得不出於穩健的態度；但其弟子佛伊浮（Fleiter）在那裡指導運動，到了他自己

不能制止爆發的程度。一五二五年三月十七日，在南德意志總暴動之前，苗爾哈遜就發生革命了。推翻了舊閥閱之家的議會，政府握在孟彩爾為議長之新選舉的「永久議會」(eternal council)手中。

能够落到極端派指導者身上來的最不幸之事，即當他所代表之階級的統治和這種統治所包含的實行方策，還未到運動成熟時期，而不得不奪取政權。他所能做的事情，不是靠着他的意志，而是靠着各種階級之間利益衝突的銳利。靠着現存物質條件發展的階段，即生產和交通工具的關係，一切時代各階級利益的衝突是建築在這種關係之上的。他所應該做的事情，即他的黨派要求他的事情，也不是靠着他們，而是靠着階級鬥爭及其條件發展的階段。他爲自己向來提出的理論和要求所束縛，這些理論和要求不是從一定的時間各社會階級的相互關係出發，或從生產和交通工具的關係之幾分偶然的水準出發，而是從他對於社會和政治運

○「弗伊浮」譯考夫基的考證不是孟彩爾的弟子 詳見本書附錄註釋十七。

動一般的結果之幾分透澈的觀察力出發。因此，他必然陷於進退維谷之中。他所能做的事情，是和他向來實踐的一切行動、他的一切原則及共黨派目前的利益相矛盾；他所應該做的事情，就不能成功。總而言之：他不是代表自己的黨派或自己的階級，而是迫不得已代表那統治條件成熟的階級。在運動本身的利益上，他不得不保護異己階級（*Stranded*）的利益，不得不以空言和口惠敷衍自己的階級，不得不斷言異己階級的利益即自己的利益。誰把自己放到這種愚笨的地位，誰就是不可救藥的墮落。我們在近代已經看到這種例子。我們只須追憶在最近法國臨時政府中，無產階級代表——雖然他們只代表無產階級發展的最低階段——所持的態度「就夠了」。無論是誰，如果十分認識二月政府（*February Government*）——不必說我們自己的德國貴族臨時政府和帝國代理政治——的經驗以

- 二月政府即法國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後所成立之臨時政府，有無產階級的代表路易·白蘭（*Louis Blanc*）及亞利伯爾（*Aleber*）參加。馬克思說過：「臨時政府只是推翻七月帝制後各階級中的妥協，他們中間之利益是極矛盾的。」

後，還要重視政府的地位，那麼，他就是一百二十分的傻瓜，或者最好也不過是口頭的極端革命派。

蓋爾爾在苗爾哈遜「永久議會」中首領的地位，比近代任何革命的執政者之地位，要不穩得多。不懂當時的運勢，就是整個世紀，也未成熟到實現他自己開始在暗中摸索的理想。他所代表的階級沒有十分發達，並且不能夠推翻和改造整個社會；它不過初有萌芽而已。他的幻想中所映出之社會改造，在現存經濟條件中，沒有多大的基礎，這種經濟條件所適應的社會制度，和他所夢想的正相反對。然而他却為他的基督教平等（Christian equality）和福音的財產公有（evangelical Community of Possessions）之教義所束縛。至少他不得不企圖其教義的實現。一切財產公有，普遍的和平等的勞動義務，以及廢止一切權力，業經宣佈。在實際上，苗爾哈遜還是一個有幾分德謨克拉西憲法，有由普選產生且在城市公所（Commune）支配之下的零議院，有速成的貧民救濟所之共和國城市。使當時新教派的中等階級如此害怕的社會轉變，在實際上，決未超出幾代輕率時建設

產階級社會之柔弱的不自覺的企圖。

孟彩爾本人似乎已覺得在他的理論和環繞的實現之間有廣闊的鴻溝。這種應運而生的天才之觀點，如果反映在其弟子羣衆頭腦中的曲解越多，那麼，這種鴻溝就越覺得厲害。他本着自己不常有的熱忱，投身於廣大的有組織的運動之中。他寫書信和派密使到四方八面去。他的書信和演說，吐出革命的熱狂，這種熱狂與他從前的著作比較起來，使人驚異。孟彩爾革命論文中年少天真的情緒完全消逝了。思想家沉着老練的語言——這是他的特質——不復存在了。孟彩爾現在完全成了一個革命的預言者。他不斷的煽起對於統治階級憎感的火焰。他刺激廣大的熱情，用有力的詞句來表現，好像在舊約聖經預言者口中所表現出的宗教狂和民衆狂一樣。他自己工作的風格，顯露他所影響的羣衆教育的水平淺。苗爾哈遜的榜樣，孟彩爾的宣傳，得到迅速和普及的效果。在喬林基、愛里斯斐爾德 (Eisleben)、哈志、薩克森公爵其地、芬西、佛爾達 (Fürth)、法蘭哥里亞上部、華格特蘭 (Wartland) 農民都起了騷亂，集合成軍，焚毀城鎮和僧院了。全部

運動的指導人，大約都承認是孟彰爾，苗爾哈遜依然是中心點；另一方面，在愛爾佛特（Erfurt）純粹的中等階級運動獲得勝利，而且那裡佔統治地位的黨派常持着動搖不定的態度對待農民。

在喬林基，恰如在法蘭哥里亞和斯哇比亞一樣，諸侯對於農民最初是軟弱無力。僅僅四月下旬，亨西的伯爵編成一支軍隊。這個斐列卜（Philip）伯爵，其敬虔會受新教派和資產階級宗教改革史的許多褒揚；其對農民的無恥，我現在將簡單言及。斐列卜伯爵用數次神速的出征和斷然的行動，肅清自己領土的大部分。他徵募新兵，侵入向來爲其主人的佛爾達僧院長（Abbot of Fulda）境內。五月三日，他大敗佛爾達農軍冷富勞恩堡，征服全部領土，不僅利用機會把自己從僧院長統治下解放出來，而且使佛爾達的僧院爲亨西的藩屬，自然是留待日後收回。他又佔領葉邁納（Eisenach）和蘭根薩爾沙（Langensalza）並與薩克森軍隊聯合，向勃蘭的大本營苗爾哈遜進攻。孟彰爾集中他的部隊八千人於法蘭登哈遜（Frankenhäusen），有大砲數尊。喬林基農軍遠趕不上斯哇比亞和法蘭哥

里亞農軍在與特魯黑西鬥爭時過程中所發揮的戰鬥力。這些人武裝缺乏。訓練不良。他們之中，老兵士不多，且非常缺乏指導者。孟彩爾似乎沒有任何軍事知識。然而諸侯們却知道運用那常常幫助特魯黑西得到勝利的同一策略——背信食言。五月十六日，他們開始談判，締結休戰條約，但在休戰條約滿期之前，即已進攻農民。

孟彩爾率其部下屯在今日尚稱為山上戰場 (Mount Bate) —— 休拉黑特堡 (Schichtberg) —— 的山上，佈陣於車輛防禦物之後。農軍銳氣消失，與日俱長。諸侯已經允許農軍，如果活擒孟彩爾獻出的話，即赦免他們。孟彩爾集合部隊成一陣陣，對諸侯的提議。一個騎士和一個僧侶表示贊成投降。孟彩爾把這兩人帶到陣中間，當面解決。這種多言無忌的革命家所批評之富貴立誓的行動，使農軍暫時鎮安了；但是他們的大多數，如果不注意到諸侯的良奴兵不願休戰條約已經包圍泰山正在整隊追迫的情形，那麼，他們將不戰而潰了。威發在車輛之後，迅速的展開，砲彈和槍子正向着毫無抵抗不領戰事的農民射擊，農奴兵已進

到防禦了。在短時間抵禦後，車輛的防禦被打破了，農民的大砲被奪去了，農民潰散了，他們在混亂狀態下逃走，且陷入包圍的部隊和騎兵之掌握中，這些軍隊在農民間實行悲慘的屠殺。八千農民中有五千以上被殺了。剩下的一部分，逃到法蘭經哈道，當地的騎兵同時追趕他們，燒燬了。頭部受傷的孟彩爾在英國的人家內搜查出來，且被捕了。五月二十五日，苗爾哈道也降服，留在那裡的佛伊浮逃走了，但在葉遜納黑地方被捕。

孟彩爾在衆諸侯面前，駁刑拷問，以後斬首。他抱着平生同一的勇氣以赴刑場。他被害時年只二十八歲。佛伊浮和其他許多人也被處死。在佛爾達，那個聖人（Holy man）——空西的斐列卜聞了他的流血法場。他和空西的諸侯下令用刀劍殺害許多其他的人，——在葉遜納黑有二十四人；在阿根薩爾沙有四十人；法蘭經哈遜戰爭後有三百人；在苗爾哈遜有百人以上；在德馬爾（Demar）有二十六人；在湯格達（Toged）有五十人；在孫根哈遜（Sunderhamo）

有十二人；在萊浦志 (Lappan) 有八人；斷手刑足和劫掠及焚燬城鄉的比較溫和手段，尙未說到。

苗爾哈遜不得不拋棄其在帝國統治下的自由，併入於薩克森領土內，恰如爾達僧院併入於亨西伯爵領土內一樣。

現在諸侯（軍隊）通過喬林基森林前進，比爾德哈斯 (Bridhans) 陣營的法蘭哥里亞農民，在那裡已與喬林基農民聯合起來，焚燬許多城堡。戰爭在梅林根 (Meiningen) 前面發生了。農民大敗，向城市撤退，這個城市閉門拒絕他們，他們受後面襲擊的威嚇。農軍因共同盟者背叛，倉皇失措，降服於諸侯之前；在談判還在進行的時候，便解散了。比爾德哈斯陣營久已解散，因此，薩克森、亨西、喬林基、法蘭哥里亞上部發動的殘部都消滅了。

萊茵右岸的運動開始後，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僧正管轄區域的農民騷亂起來。不久，亞爾薩斯上部和孫德加的農民也發生暴動。四月十八日，亞爾薩斯下部農民部隊劫掠亞爾多夫 (Aldorf)

僧院。其他農民成立於萊伯爾斯海 (Leibersheim) 附近，巴爾 (Barr) 及烏比斯 (Ubers) 流域。這些農民立於集中，編成亞爾薩斯下部的大隊，並以有組織的行動前進，佔領城鏡，破壞僧院。每三人中抽出一人編入農軍。這一集團的十二個條件，與斯時比亞及德蘭哥里亞集團比較起來，要急進得多。

五月初，亞爾薩斯下部農民的一個縱隊，首先集中在聖亨坡利特 (St. Hippolite) 附近，企圖奪取城市沒有成功，其次，藉助於與市民勾結，在五月十日取得巴爾經 (Barcken)，五月十三日取得拉坡爾志威勒 (Rappoldsweller)，五月十四日取得萊亨威爾 (Reichenweiler)，正在這時間內，受葉拉斯摩斯·格爾伯 (Erasmus Gerber) 指揮的第二縱隊，乘其不備，進攻斯特拉斯堡。這種企圖未收成效，現在這縱隊轉向華斯格期 (Wasgus) 前進，破壞馬爾斯孟斯 (Marsmanster) 僧院，包圍查伯恩 (Zabern) 於五月十三日攻下。它從這裡向勞拉因 (Lorraine) 邊境前進，引起和這邊地毗連的公爵領土之騷亂，同時，依據山路建築堡壘。兩支縱隊成立於薩爾 (Saar) 河岸的亨坡爾志海 (

Hohenheim) 和紐堡 (Neuburg) 有西千德意志勞拉因 (German-Lorraine) 農民屯於薩爾格羅德 (Sarreguemini)。最後，兩支先頭部隊，即在斯托彭爾伯蘭 (Storzheim) 的華斯格斯特地方之柯爾賓 (Köben) 農軍，和威遜堡 (Wiesentour) 地方之克利堡 (Kleiburg) 農軍，掩護前綫和右翼；另一方面，左翼則和亞爾薩斯上部農軍結合。

亞爾薩斯上部農軍自四月二十日以來已開始運動，強迫薩爾志城市於五月十日加入農民同盟，格伯威勒 (Görsweiler) 於五月十二日加入農民同盟，邁海 (Meyenheim) 及其附近於五月十五日加入農民同盟。奧大利政府和其鄰近的帝國都市立刻聯合起來反對農民，但他們力量太弱，不能作嚴重的抵抗，更說不上進攻。所以，到了五月中旬，除了少數城市之外，亞爾薩斯全部都落入勞動者手中。但是軍隊已經迫近了，這種軍隊的迫近足以打破亞爾薩斯農民不信任的進攻。在這裏，成就貴族之復興的是法蘭西人。五月十六日，勞拉因的安頓公爵 (Anton) 率領三萬軍隊出發，在這軍隊中，在法國貴族的精兵，同樣也有西

班牙 (Spanish) · 皮德孟特 (Piedmontese) · 倫巴底 (Lombardic) · 希臘 (Greek) △亞爾巴尼亞 (Albanian) 的援軍。五月十六日，他在路特彩爾斯德 (Luetschtein) 和四千農民相遇，未費大力打敗農民；五月十七日，他逼迫農民所盤據的查伯恩降服。甚至當勞拉因軍進到城市，農民解除武裝的時候，破棄降服的條件。這些沒有抵禦的農民受農奴兵的襲擊，其中大部分被殺。殘餘的亞爾薩斯下部縱隊都解散了，安頓公爵又向亞爾薩斯上部前進。亞爾薩斯上部農民曾拒絕與查伯恩的亞爾薩斯下部農民聯合，現在却在休威勒 (Schweileng) 受到勞拉因軍全部力量的攻擊。他們用大無畏的精神抵抗，但數倍兵力的優越——七千對三萬——和許多騎士的叛變，特別是萊辛威爾城守的叛變，使一切奮勇都歸無效。他們完全失敗和逃散了。公爵還其慣用的手段征服亞爾薩斯全境。只有孫德加地方未受摧殘。奧大利政府藉召回安頓公爵以示威嚇，於六月初間，強迫農民締結恩阿斯海 (Ennschein) 協約。然而政府又立刻破壞這次協約，下令殺戮許多運動的宣傳者和指導者。農民起了新的暴動，這次暴動到孫德加農民締結

阿芬堡 (Offenburg) 協約時 (九月十八日) 才告結束。

現在剩下的只有奧大利的亞爾卑 (Alpine) 區域農民戰爭的報告。這些區域恰如薩爾志堡 (Saxonia) 大僧正領士毗連的地方一樣，自「恢復」舊權利 1 (Stara Prava) 「運動」以來，繼續反對政府和貴族，而且宗教改革派的教義在那裏發現了有利的地盤。宗教的虐待和任意的賦稅，造成暴動的危機。

得着農民和礦工擁護的薩爾志堡城市，自一五二二年以來，為城市的特權和宗教實踐的自由，曾與大僧正爭持不下。一五二三年末，大僧正率領新募的農奴兵襲擊城市，置大砲於城堡上以示威嚇，並虐待異端派的說教者。同時，他徵收新的苛稅，因此，激怒人民達於極點。在一五二五年春天，奧斯哇比亞、法蘭哥里亞及諾林基的暴動同時並起的，有這渾全境的農民和礦工突然騷亂，他們在伯羅斯勒 (Brossler) 和威特莫梭 (Wetmose) 兩個首領之下組織起來，「要求」解放城市，並圍攻薩爾志堡城。他們像德意志西部農民一樣，締結基督教同盟，把自己的要求列成十四個條件。

在斯特利亞 (Steier)、奧大利 上部、加因西亞 (Carinthia)、加里阿拉 (Carinthia) 等處，新勒索的租稅、關稅及告示，很嚴刻的妨害人民最密切的利益，一五二五年春天，農民騷亂起來，他們奪取許多城堡，在格利斯 (Graz) 打敗「蘇維利」(運動) 的征服者——迪特利黑斯達 (Dietrichstein) 老將軍。雖說政府用虛偽的承諾，撫慰一些暴動者得到成功，然大部分農民依然團結一氣，並與薩爾志 農民聯合；所以，薩爾志 保全境以及奧大利 上部、斯特利亞、加因西亞、加里阿拉 的大部分，仍掌握在農民和礦工手中。

在迪洛爾 (Tyrol) 宗教改革派的教義也得到依附之人。孟彩爾 的密使在這裡有成效的活動，甚至比奧大利 的其他亞爾品 區域更多些。佛迪蘭德 (Verden) 大僧正虐待新教教義的傳佈者，在這裏正像其他地方一樣；而且用專制的財政條例侵害人民的權利。結果，在一五二五年春天就發生暴動了，這些暴動者的首領是孟彩爾派，名叫格斯邁爾 (Gessner)。他在一切農民首領中是唯一的具有軍事特長之人，他們佔領大多數城堡，積極前進反對僧侶，特別在南部和萊

志起 (Ezech) 境內。在拉爾堡 (Vornberg) 農民也起騷亂，並與亞爾加農民聯絡一致。

大僧正受了各方面的壓迫，現在對於叛逆者一再讓步，這些叛逆者在不久以前，是他想用焚毀、鞭撻、劫掠、屠殺的手段去消滅的。他召集世襲領土的議會，並且在他們的開會中，與農民締結休戰條約。同時，他又狂熱的準備武裝，以期——愈速愈妙！——對於那些不敬上帝之人能夠用各種手段應付。

自然，這次休戰條約沒有維持好久。迪特利黑斯達因為缺乏現金，在公爵封地之內，肆行搜刮；加之，其部下斯拉夫人 (Slavics) 和瑪格雅人 (Magyar) 的軍隊又最無恥的蹂躪人民。這種情形引起斯特利亞人的新暴動。七月三日夜間，農民擊斃迪特利黑斯達將軍於休拉利則 (Schallitz)，把那些不會講德意志語的人都殺了。迪特利黑斯達本人被捕。七月四日早晨，農民組織法庭審訊俘虜，將四十名撲克 (Puck) 和哥羅西亞 (Croat) 貴族宣告死刑。這是執行了的。大僧正立刻允許五個公爵封地 (奧大利上部和下部、斯特利亞、加因西亞、加里

阿拉)的等級會議之一切要求。

在迪洛爾，議會的要求也得到承諾，因此，北方歸於平靜。然而南方却堅持自己原來的要求，以對抗議會極溫和的決議，依然保存武裝。僅僅在十二月，大僧正才能用暴力恢復秩序。他殺了已經捕得的這次暴動的煽動者和指導者之大多數。

現在，一萬巴麥利亞人 (Bavarians) 在喬治·封·法蘭志堡 (Georg von Fruchburg) 指揮之下，向薩爾志堡進軍。這種威風凜凜的軍力，尤其是這些農民中發生了爭端，遂引導薩爾志堡農民和大僧正締結協約。這協約於九月一日成立，也經大公爵接受。雖然如此，可是有兩個同時大批擴張軍隊的時候，立刻破壞協約，因此，使薩爾志堡農民起了新的暴動。這些暴動者支持了整個冬季。春天，格斯邁爾到來，對於各方面迫近的軍隊，開始壯烈的戰鬥。一五二六年五六兩月，在接二連三的火光迸發的戰鬥中，他繼續打敗巴麥利亞、奧大利、斯哇比亞聯盟軍及薩爾志堡大僧正的農奴兵，並有一個長時間他阻止了各種軍隊的聯合。

。他也得着機會圍攻拉達德（Radtadi），最後，他被「敵人」侵越的勢力包圍。受這激感，他殺開血路，率領殘部，通過奧大利、阿爾卜斯（Alps）到威尼西亞（Venitia）邊境。威匿思（Venice）共和國與瑞士對於這個不屈不撓的農民首領提供新陰謀的起點。經過一年之久，他正企圖把這兩國捲入反奧大利戰爭的漩渦，以為這種戰爭將給他以新的農民暴動之機會。然而在交涉的過程中，他竟死於刺客之手。在格斯達削牛存的時候，佛迪蘭德大僧正和薩爾志堡大僧正不能安枕。所以他們僱用匪徒，這個匪徒在一五二七年撲滅了這個尚在人世之危險的叛逆者。

第七章 農民戰爭與其結果的歷史意義

在格斯塔爾退到威尼西亞邊境以後，農民戰爭的最後一幕已經結束。各處農民再屈服於教會、貴族或閥閱之家的統治之下。在各處與農民所締結的協約都被棄了，戰勝者向戰敗者勒索的鉅額賠款之重担也增加起來。德國人民宏大的企圖，受可恥的失敗和一時嚴重的壓迫而告終。然而結局，農民的狀況不是更行惡化。凡是貴族、諸侯、僧侶能從農民「身上」榨取的東西，即在戰爭之先，已經榨取盡了。當時德農民在其勞動生產物中所得的份額，限制到維持自己和維持兒女的必須生活資料之最低限度，這是與近代無產階級相同的。「所以，大概說起來，農民方面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榨取了。」^①真的，稍為富裕的農民已經破

① 這不能算是一句，依照格的本補上。

產。奴隸的富豪降到農奴的地位；全部公有土地都被沒收，大多數農民因家宅的破壞，耕地的蹂躪，加上……的紛亂，竟不知已淪為無賴漢，或變成城市平民。可是戰爭和蹂躪是當時的日常現象，一般說來，由於增加租稅，農民階級生活於最低水平線下，使其狀況長期惡化。隨後的宗教戰爭（Religious War）和最後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①及三十年戰爭中不斷循環的普遍劫掠和人口減少，其打擊農民比農民戰爭更為痛苦。很明顯的，三十年戰爭破壞農民生產力的最重要部分，因為農業生產力的破壞和同時許多城市的破壞，把農民、平民、破產的市民生活標準降到愛爾蘭貧困（Irish misery）的水平線之最壞形式。

從農民戰爭中受最大打擊的階級是僧侶。他們的僧院和財產被燒毀了；他們的珍寶被掠奪了，不是賣給外國，就是熔化了；他們的倉庫貯蓄被耗費了。他們簡直不能抵抗，同時成了人民痛恨的目標。其他等級，如諸侯、貴族和中等階級

① 三十年戰爭即一六一八年到一六四八年的戰爭。

等，甚至以這些可憎的僧侶之受打擊而背地稱快。農民戰爭到處收回教會財產以利農民。世俗的諸侯和一部分城市決定爲自己的利益而實行收回教會財產；在新教區域，僧侶的財產很迅速的歸到諸侯或名門望族的手中。宗教的諸侯之權力也受了侵奪，世俗的諸侯又知道怎樣在這方面利用人民的憎惡。我們看見佛爾達的主教（Abbot of Fulda）從亨西的斐列卜封建主的地位降到他的家臣的地位是如此。肯蒲頓城市強迫宗教的諸侯將其在城市所享受之一串的貴重特權廉價賣給城市亦是如此。

貴族也受了大的打擊。其城堡的大部分都毀滅了；有許多最尊貴的家族都破產了，僅僅依附諸侯而維持生活。他們對農民之無力已經證實。他們到處遇着打擊，被迫降服。只有諸侯軍隊援救他們。貴族不得不一天天失掉視爲帝國直轄下自由等級（Free Estate）的意義，不得不落到諸侯統治之下。

諸城市從農民戰爭中亦大半未得到任何利益。名門望族的統治幾乎到處復興起來，中等階級反對派仍是長期破裂的。舊閥閱之家的成規，在各方面成爲工商

業極枯，一直延長到法國革命。加之，在鬥爭期間中等階級或平民黨派在城市範圍內得到一時的成功，從諸侯看來，諸城市應負責任。從前屬於諸侯的各城市不得不支付鉅額賠款，喪失自己的特權，並且屈服於諸侯的貪慾橫恣之下（如法蘭德哈遜、亞爾斯達德（Arnstadt）、休馬爾加頓（Schmalcalden）武爾志堡等等）；帝國（直轄）的諸城市併入諸侯領土內（如苗爾哈遜），或至少是像在法蘭哥里亞的許多帝國城市一樣，處在隣近諸侯德義的維繫之下。

在這些情形之下，唯一的得利者是衆諸侯。我們在本書敘述開始，已經看到；工業、商業、農業不甚發達，使德意志無達到全國統一的可能；而只容許地方的和各省的統一；並且在分裂（狀態）中代表統一的衆諸侯，是從現存社會和政治條件下的一切變化中獲得利益的唯一階級。當時德意志發展階段既如此低下，同時在各省中又如此不同，所以與世俗諸侯並存的，還有宗教的統治，城市共和制及自主的一些公爵和勳爵。同時，這種發展雖說很慢很弱，然而還是繼續促進各省的統一，（換言之）：即征服一切帝國直轄的等級歸到諸侯統治之下。

因此，只有諸侯能從農民戰爭的結局得到利益。這種情形在實際上實現了。他們不僅從其敵人——僧侶、貴族和城市——的削奪中得了相對的利益，而且從他們所搜刮的戰爭掠奪品中得了絕對的利益，沒收教會財產以自肥；完全破產或大半破產的一部分貴族漸漸降為他們的家臣。城市和農民的賠款流入他們的金庫，同時許多城市特權的廢止，使財政活動方面，現已得到更大的範圍。

德意志分離的擴大和加強是（農民）戰爭的主要結果，同時這種分離是農民戰爭失敗的原因。

我們看到德意志不僅分裂為無數獨立的省，這些省幾乎相互間全無關係；而且在每一省中，人民分裂為諸等級的各種階層和諸等級的各部分。諸侯和僧侶之外，在鄉村有貴族和農民；在城市有閥閱之家、中等階級和平民。如果不在實際衝突中，最好情形也只是這些階級各不合理會其他階級的利益。在這些複雜的利益之上，還有帝國和教皇的利益。我們看到這些複雜的利益，經過大的困難，是不完全的，並且因地而異的，結局形成三大集團。我們看到雖然費了如此慘澹經營

所得來的這種聯合，而各個等級仍是與環境所指示之民族發展的路綫相反，各個等級仍是按照自己意思單獨行動，不僅與保守派發生衝突，並且與其餘各個（同站在）反對派（地位）的等級發生衝突。所以失敗就不可避免了。這是西鏢根（Sickingen）暴動中貴族的命運；這是農民戰爭中農民的命運，這是馴服的宗教改革派中中等階級的命運。這甚至是在德意志大部分地方不能為共同行動而聯合並且相互妨害的農民和平民的命運。我們又看到在階級鬥爭中這種分裂的原因和中等階級運動的終歸失敗。

地方和各省的分離及由此所必然發生的地方和各省的偏狹性如何毀滅了整個運動；中等階級、農民、平民如何不能為一致的民族行動而聯合起來；各省農民如何只為自己而行動，經常不肯援助鄰近區域的暴動農民，以致在個別的戰爭中順次為不及暴動羣衆總數十分之一的軍隊所剿滅；——所有這些情形，讀者從這種解釋中必定看得十分清楚。個別農軍與其敵人所締結的休戰條約及協約，也構成共同事業的叛變行動；各種農軍不是按照自己行動或大或小的共同性，——唯

一可能的聯合，——而聯合，只是按照與自己對抗之特別仇敵的共同性而聯合，即爲各省農民彼此漠視的明顯證據。

與一八四八——五〇年運動的類似點，在這裡也明白了。一八四八年「的運動」，像農民戰爭一樣，「同站在」反對派「地位」的各階級之利益互相衝突，而且各個單獨行動。資產階級已充分發展，不能再忍受封建官僚專制制度，但它的力量尚不能使其他各階級的要求，附屬於自己利益之下。無產階級太弱，不能打算跳過資產階級的階段，直接爲自己奪取政權，但處在專制制度之下，嘗够了資產階級政府的甜蜜，且就一般說，再不會把自己的解放和資產階級的解放看成一致。國民羣衆，即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及農民，爲其最接近的天然的同盟者——資產階級——所拋棄，因爲他們過於革命；他們中有一部分可爲無產階級所拋棄，因爲他們太不進步。這種國民羣衆本身已經分裂，一無所成，可是對於

● 這句是參照俄文本譯的。

自己左右兩邊的友軍都持反對態度。至於地方的偏狹性，在一五二五年農民之間的亦不見得比參加一八四八年運動的各階級之間的大些。一切地方的革命，跟着革命後完全不受阻礙之一切地方的反動，以及分裂為許多小國的主張，——凡此一切都十分確實說明了。有人看了德意志一五二五和一八四八兩次革命及其結果以後，還要夢想聯邦共和制（Federal Republic），那麼他簡直成了瘋狂院裡的人。

然而這兩次革命，即十六世紀的革命和一八四八——五〇年的革命；儘管完全類似，但其實質則彼此不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如果不是德意志進步的話——指示出歐洲的進步。

從一五二五年革命之中誰獲得利益呢？是諸侯。從一八四八年革命之中誰獲得利益呢？是大諸侯，即奧大利和普魯士。站在一五二五年諸侯背後的，是東縛在租稅的鎖鏈下的城市下層中等階級。站在一八五〇年大諸侯背後的，是近代大資產階級，他們很迅速的用國債克服大諸侯。站在大資產階級背後的則為無產階

級。

一五二五年的革命是德意志地方的事變。在德意志開始自己的「農民戰爭」的時候，英國、法國、博西米及匈牙利人都已經完結了自己的農民戰爭。如果德意志是分離的，那麼，歐洲則分離更甚。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是德意志地方的事變，它是大歐洲運動的一部分。在這次革命整個時期的動力，不限於單個國家的狹隘範圍，甚至不限於地球上局部的範圍。在事實上，爲這次革命舞臺的一些國家（其本身）繼續革命的活動甚少。這些國家都有幾分不自覺的無意志的因素，這些因素陶鑄於爲全世界所參加的運動之過程中；這一種運動在現在社會條件之下，彷彿對於我們是一種外來的力量，但其結局仍合我們的自己。一八四八——五〇年的革命不唯照一五二五年的革命一樣結束，其理由即在於此。

● 這句是參照俄日譯本譯的。

著者第二版序

本著在一八五〇年夏日寫於倫敦，當時剛才完竣之反革命尙留有鮮明的印
象。（寫成以後），曾經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馬克思在漢
堡（Hamburg）編輯的政治經濟評論——第五號和第六號登載過。德國政治上朋
友們希望我把它刊印成書，不幸得很，它到現在還未失掉時效，我因此把這種希
望實現了。

本著不是爲發表獨立蒐集的材料而作。恰恰相反，關於農民暴動和杜瑪斯·
孟彩爾的一切材料，則採自齊墨門（*Wilhelm Zimmermann*）〔所著之書〕^①，
他的書雖說到處都有缺點，然仍不失爲最優良之實錄。而且老年的齊墨門樂此不

① 大農民戰爭（*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Peasant War*）。

疲。同一的革命本性既使他在這部書裡成爲被壓迫階級的辯護者，又使他後來成爲富德克漢（Frankfort）極左派最傑出之一人。（註十七）

如以齊澤門的著述缺乏內部的聯絡；如以他沒有把那個時代宗教和政治的爭論，視爲當時所發生的階級鬥爭的反映指示出來；如以他在階級鬥爭中，僅看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良善和兇惡，以及作惡者的最後勝利；如以他觀察當時決定鬥爭爆發和結果之社會狀況極爲膚淺；那麼，只能歸咎於其書脫稿之時代。然就當時而論，在德國唯心派歷史中間，可算富有現實主義色彩的傑作。

本書一方面撮述鬥爭的歷史過程，同時說明農民戰爭的起因，說明在戰爭中出現的各黨派的態度和各黨派對政治和宗教的理論盡力宣佈自己的立場；最後說明由歷史社會的生活條件所決定的鬥爭結果，指示當時德國政治制度以及反抗這種制度的暴動；而且證明這些政治和宗教的理論，只是當時德國農業、工業、海陸交通、商業和財政發展到那個階段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這種唯物論的歷史觀（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非我自己的創見，實由馬克思開其端，曾

散見於他的著作中，這些著作即新萊茵報所登載的關於一八四八——一八九四年的法國革命論文及他所著路易拿破崙（*Louis Bonaparte*）（*Eighteenth Brumaire*）

德國一五二五年和一八四八年——一八四九年兩次革命間的類似，是非常明白的，不用深說。然而除了兩次革命中相同的事實，——例如各地前仆後繼的暴動，都被諸侯的軍隊鎮壓下去，——和有時城市中階級的行動表現可笑的類似點以外，這兩次革命的差異是十分清楚的。

「從一五二五年革命之中誰獲得利益呢？是諸侯。從一八四八年革命之中誰獲得利益呢？是大諸侯，即奧大利（*Austria*）和普魯士（*Prussia*）。站在一五二五年諸侯背後的，是束縛在租稅鎖鏈下的城市下層中等階級。站在一八五〇年大

① 一八五〇年比命第三政變記，或譯路易波納帕勃魯文耳十八，為馬克思重要著作之

諸侯背後的，是大資產階級，他們很迅速的用國債克服大諸侯。站在大資產階級背後的則爲無產階級^①。

我很抱歉，在這段文字中過分褒揚了德國資產階級。真的，德國資產階級本有用國債^②很迅速的克服^③帝國的機會。可是他們不會利用過這種機會。

一八六六年戰爭^④後的奧地利，好像一件禮物？落到資產階級懷中，但資產階級不知道如何來支配。他們應付萬事都是懦弱無能。他們能做的只一件事：就是，當工人剛剛開始騷動的時候，立刻猛力反對工人。他們握着國柄，僅僅爲匈牙利人（Hungarians）需要他們而已。

至於普魯士呢？真的，國債飛躍似的增加了。財政虧空成了經常狀態。國家支出一年超過一年。資產階級在議會裏佔大多數，非得他們同意，無稅可加，無

① 這一段是從大書第七章結論中引來的。

② 普奧薩多瓦（Sadova）戰爭。

價可寡。但是在國家裏何處是資產階級權力呢？僅僅兩月以前，約略看見財政虧空的時候，資產階級又得到最有利益的地位了。他們如能堅持，一定可獲得「政府」很大的讓步。他們如何應付呢？當政府允許他們繳上九百萬到政府手中，不僅一年如此，而且每年無限制的募集的時候，他們認為這件事便是心滿意足的讓步。

我不要過分責備議會中「民族自由主義者」(National Liberals)我知道他們已被站在其背後的人民所拋棄，即被資產階級的羣衆所拋棄。這些羣衆不願起來支配，一八四八年「的教訓」仍在這些羣衆刻骨不忘之中。

德國資產階級何以發展這種異常的特性，則留在後面解釋。

一般說來：上面的引據已完全證實了。從一八五〇年開始，一些小國家常年退讓，僅僅做了普魯士和奧大利的陰謀之犧牲。奧大利和普魯士之間，爲霸權而鬥爭，日趨激烈。最後，一八六六年可怕的衝突，就發生了。「戰爭的結果」，奧大利僅保存其自己的省份；普魯士直接和間接的征服北方全部；南部三個國家

的命運則付之大空主持。

在這些國家一切重大活動中，只有下面數事對於德國工人階級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第一，實行普通選舉。工人有權直接選派代表參加各種立法會議。

第二，普魯士托庇上帝的恩惠吞併三個皇冠。樹立了好榜樣。在這次行動之後，他已已向皇廷，亦托庇上帝的恩惠，保持得照自己所要求的那樣純潔，——（關於這一點），即民族自由主義者也再不相信了。

第三，德國現時革命唯一的大敵是普魯士政府。

第四，奧大利的德意志人，現在不得不問問自己，願意做什麼人，德意志人呢？或是奧大利人呢？他們願意依靠誰，德意志呢？或是它特別繁榮的附庸呢？兩者之中，不得不捨其一，這是早已明白的。可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依然

● 這句英譯本有錯誤，依照俄日兩譯本改正。

繼續掩飾這件事。

關於一八六六年其他重要的爭論，即「民族自由主義者」和人民黨（The People's Party）之間紛爭不休的爭論，將來幾年（的歷史）會指出，這兩種觀點如此厲害爭鬥，只因他們是同一傻瓜相反的兩極。

德國社會狀況，在一八六六年（的事件中）幾乎沒有改變什麼。有少許資產階級的改良：為度量衡統一、遷徙自由、貿易自由等等，——凡此一切都在適於官僚便利的範圍以內，甚至這些自由還未達到西歐其他各國所已到的那種程度，而且主要的惡魔——官僚主義制度——依舊沒有動搖。至於無產階級，遷徙自由，公民自由，廢止護照和其他同類法律，因為當時的警察制度實行，都成幻想。比一八六六年偉大的政治運動更重要的，就是從一八四八年以來德國工業、商業、鐵路、電報和海洋汽船航行的發達。這種進步或許落在英國之後，甚至落在法國之後，但就德國說，總算是空前未有的，而且在近二十年內所得到的進步或許比從前一個世紀內能夠得到的多些。德國已經熱狂的不可遏抑的參加世界商

業。投在工業上的資本迅速加倍。資產階級的地位也因此提高。工業繁榮最正確
的標誌——買空賣空的投機事業（Speculation）——正如鮮花盛開，諸侯和公
爵把樂附到資產階級的凱旋軍上。在十五年前，德國（建築）鐵路曾求助於英國
實業家，現在德國資本——托天之福——正在建築從俄羅斯到羅馬尼亞的鐵
路。那麼，資產階級何以沒有奪取政權？資產階級對於政府的態度何以如此懦
弱呢？

德國資產階級的不幸在於它的出世太遲——恰與德國人所愛的習俗相符。當
它得勢的時期正是其他西歐各國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下降的時期。在英國，資產
階級只能藉擴張選舉權的方法派真正代表——伯萊脫（Berkeley）——參加政府，
這種擴張選舉權的方法，畢竟要使它的統治歸於滅亡。在法國，資產階級在共和
制之下，以整個階級資格掌握政權，僅有兩年，即一八四九——五〇年；它只

● 「托天之福」四字，爲英譯本所無，依照俄譯本語意添上。

有讓其政權於路易拿破崙和軍隊才能維持它的社會地位。處在今日歐洲三個最先進國家層層相依賴日密的情況之下，正當英法兩國資產階級已到衰老時期，德國資產階級要想廣大的運用其政治權力，那就再沒有可能了。

資產階級異於其他一切階級的特性，就是在資產階級的發展中有一個轉變點（Turning point），過了這一點以後，它的權力每一次增加，即是說：它的資本每一次擴大，都只是助成它一天天失去保持政治上統治的能力。「站在大資產階級背後的是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一方面發展它的工業、商業和交通工具，它同時却以相同的速度產生無產階級。到了某種場合，——雖說不一定到處同時，和在發展的同一階段上出現——資產階級開始注意到自己的同伴——「無產階級」已現已勝過自己了。從這個時候起，它失去獨有的政治上統治的權力。它要尋找同盟者，或與同盟者共分政權，或把整個政權讓給同盟者，則視環境的要求

● 「無產階級」四字依照俄譯本添上的。

如何為轉移。

在德國，關於資產階級的這個轉變點，當一八四八年即已達到。資產階級受法國無產階級的威嚇，受德國無產階級的攻嚇更為厲害。一八四八年巴黎六月戰爭^①，指示資產階級能期待的是什麼，德國無產階級已鼓噪起來，向資產階級充分證明，革命的種子在德國土壤內也散佈了。從這一天起，資產階級政治行動的鋒芒被摧折了。資產階級向四周尋找同盟者。它不論價格把自己賣給同盟者，它現在還是這樣。

這些同盟者都是反動的。它是掌握軍隊及其僚屬的皇權；它是大封建貴族；它是小貴族，它甚至包括到僧侶。資產階級與這些同盟者締結許多協約和聯盟，

① 六月戰爭，一八一五年以後，是歷史上無產階級第一次反抗資產階級的武裝鬥爭。……「六月暴動證明歐洲資產階級的革命時期已經過去，未來的革命階級是無產階級的。」

出賣自己貴重的皮，以致現在再沒有東西可做貿易。而且無產階級愈發展，其自身愈覺得是一個階級並且以一個階級行動起來，則資產階級就愈趨於軟弱。當普魯士人非常惡劣的戰略在薩多瓦（Sadowa）勝過奧大利更異常惡劣的戰略之時，誰更深深吐一口惡氣？是普魯士資產階級——薩多瓦失敗的分任者——呢？或是它的奧大利同僚呢？這是難以斷言的。

一八七〇年我們的上層中等階級，像過去一五二五年溫和的中等階級一樣，採取同一方式和行動。至於小資產階級，即手工業師傅和商人，他們依然如故。他們希望視上大資產階級（的地位），同時又害怕降入無產階級的隊伍，他們務俟於希望和害怕之間。在多次鬥爭中，營謀出賣自己貴重的皮，在鬥爭結束的時候，則去與勝利者聯合。這便是他們的本性。

● 奧大利北滿城市名，即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之處。

● 奧大利國名，即指奧大利資產階級言。

無產階級的社會和政治活動是與一八四八年以來工業之迅速發展並駕齊驅。
德國工人的作用——他們在職工會、聯合會、政治團體、公開大會、選舉、以及
所謂國會（Reichstag）中所表現的作用，是德國最近二十年所發生的轉變之唯一
充分的標誌。他們單獨實行派遣工人和工人代表參加國會——英法兩國人從來沒
有完成的事業——這是德國工人的名望。

然而無產階級還表示出與一五二五年有些類似之處。完全和永久依靠工錢過
活的那個階級的人民，現在仍像當時一樣，僅佔德國人民的少數。這個階級也不
得不尋找同盟者。這些同盟者只有在小資產階級、城市流氓無產階級、小農、農
村工錢勞動者之中才能尋到。

小資產階級，在上面已經講過。這個階級是完全不可靠的，只有勝利已經獲
得的時候，他們在茶樓酒肆中高談闊論，刺刺不休。但他們之中，却也有優良分
子，自願跟着工人跑。

流氓無產階級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當中最壞的（分子），他們是各階級腐化

分子的糟粕，建設大本營於各大城市中，他們是絕對貪利絕對無恥之流。法國工人在革命的過程中，曾經在許多房屋上寫着：「殺死盜賊（Mort Aux Voleurs）」（的標語）！並且槍斃了很多；他們幹這件事，不是出於保護財產的熱心，而是正確的認識這種人有剷滅的必要。利用這些流氓無產階級做護衛的工人領袖，只是以這種行動來證明自己做了運動的叛徒。

小農（大農屬於資產階級）可分為各種不同的成份。他們有些在農奴制度之下，受領主和主人的束縛，因為資產階級未盡它的責任把這些人從農奴制度下解放出來，所以容易使他們信服只有從工人階級〔方面〕得到救助；有些是個農，他們的狀況幾乎與愛爾蘭（Ireland）的佃農相等。地租是如此之高，即在豐年，農民和其家庭也難維持樸素的生活；到了收成惡劣的年份，就老實餓肚子。當他不能繳納地租的時候，完全聽從地主擺佈。資產階級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面才想法救濟。那麼，於工人之外，這些佃農從何處尋找救濟呢？

還有別一種農民集團，他們自己有一小塊土地。在大部分場合，他們負了與

押重担，以致依靠高利貸者，正如佃農依靠地主一樣。他們所得到的，實際上只是菲薄的工錢，因為年歲豐歉不同，這點工錢亦變易不定，這些人想從資產階級得一點東西，絲毫沒有希望，因為榨取他們血液的是資產階級，即資本家高利貸者。雖說實際上其土地不屬於他們，而屬於高利貸者，然而這些農民還是緊緊握住自己的土地。對於這些人必須使其明白，只有民衆的政府把所有典押變成國家債款，藉此減輕地租的時候，他們才能從高利貸者「剝削」之下解放出來。可是這件事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做到。

在中地主和大地主佔優勢的地方，農村工錢勞動者形成人數最多的階級。這是整個德國北部和東部的情形，城市產業工人在這裡得到人數最多的和天然的同盟者。大地主或大租戶（*Latifundium*）與農村工錢勞動者對立，正像資本家與產業工人對立一樣。有益於產業工人的方法必定有益於農村工錢勞動者，掉過來說，有益於農村工錢勞動者的方法亦必定有益於產業工人。產業工人只有把資產階級的資本——就是說爲生產所必需的東西，如原料、機器及工具，都變成社會

財產，唯他們自己的財產。非但公共使用，才能解放自己。同樣，農村工錢勞動者只有到了他們工作的主要對象，即土地本身，從大農和大封建地主的私有財產權上收回，並且變成爲社會財產，這種財產由農村工人在公共基礎上聯合起來耕種的時候，才能從可怕的困苦中解放出來。講到這裏，我們想起巴塞爾（Basel）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ngress）的決議：社會的利益，是在把私有土地變成公共財產，這個決議原來是爲那些有大地主，大農業企業；並且是一個主人僱用許多工錢勞動者的國家而製定的。這種情形依然盛行於德國，其次即英格蘭，這決議對於德國是最合時宜的。農業無產階級——農村工錢勞動者是請保安隊大將去補充馬木諾。普魯士選舉，把一大羣的封建主和貴族送到議會去的是這個階級。然而最接近於城市產業工人的也是這個階級。它們與產業工人的生活情形相同，而且他們落到困苦陷阱中比城市工人還要更深些。

● 巴塞爾是瑞士的城市名。

這個階級因為分裂和散漫，柔弱無能，可是有一種潛勢力；政府和貴族深知這種潛勢力，所以他們有意聽憑教育腐敗，使農村人民停滯於黑暗之中；喚起這個階級的生命，把它吸引到運動中，即德國工人運動最迫切的任務。從農村工人羣衆了解自身利益的那一天起，德國反動的、封建的、官僚的或資產階級的政府就不能存在了。

著者第二版序書後

前面文字是四年以前寫的，但到現在依然正確。在薩多瓦（戰爭）及德國分裂後是真實的東西，到師丹（Sedan）（戰爭）及普魯士民族的神聖意志帝國建立之後也是真實的。在所謂大政策的範圍內，那些「震動世界」的國家活動能够改變歷史發展的方向者實在不多。

那些國家的偉大活動所能成就的事只能促進歷史發展的速度而已。在這一點上，前述「震動世界」的事件之那些發動人曾經獲得出乎意外的結果，這種結果對於他們本身是非常不願意的，但是他們無論如何不得不承認這種結果。

一八六六年的戰爭已經搖動了普魯士的基礎。一八四八年以後，要使西部

● 師丹一譯瑟丹係法國地名。1870年德法戰爭時，鐵血宰相俾在此處大敗法軍，師丹戰事最慘。

諸省叛逆的產業分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束縛於舊規律之下是很難的。然而這件事畢竟成就了，克魯諸省貴族的利益，與軍隊的利益混合，又在國內佔了優勢。一八六六年，幾乎德國西北全部成爲普魯士（的領土）。普魯士托庇上帝的恩惠吞併了三個皇冠，把普魯士皇冠染上了不可救藥的污點，這件事姑且不論；但帝國的重心已顯著的移向西部了。四百萬萊茵居民和威斯特華利亞（*Westfalen*）人首先因北德意志同盟直接歸附者四百萬德意志人，其次間接歸附者六百萬而勢力加強。可是一八七〇年，八百萬西南德意志人又加入了，所以在「新帝國」（*New monarchy*）內，有一千四百五十萬舊普魯士人（即東頁爾賓四省）六省，其中尚有二百萬波蘭人）與以前脫離舊普魯士貴族封建制度的二千五百萬人對立，所以普魯士軍隊的大勝利變動了普魯士國家建築的全部基礎；貴族統治益發變成難堪，甚至成爲與政府本身亦勢不兩立。同時，由於工業的猛烈進步，資產階級和工人之間發生不可避免的鬥爭，把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降到了下位；因此，舊國家內部的社會基礎起了完全的變化。一八四〇年以來，貴族

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成爲日益腐朽的君主專制苟延殘喘的條件，而專制君主即存在於他們的鬥爭的均勢中。從這一瞬間起，不是保護貴族反對資產階級進攻的問題，而是保護一切有產階級反對工人階級進攻的問題，到了這個時候，專制君主就不得不變爲適合這種特別目的而直接發明之國家形式——拿破崙式的君主制度（The Bonapartist monarchy）我在其他地方（住宅問題第二冊二十六頁以下）曾討論過普魯士向拿破崙主義（Bonapartisme）的轉變。我在那裡不會注重的，而在這方面是很重要的，即這種轉變是一八四八年後普魯士所得到的最大進步，這種進步只證明普魯士在近代發展的階段上是如何的落後啊。普魯士還是一個半封建

- 拿破崙主義一詞波納特主義，是建築在政府發覺市場上的一種軍事獨裁政治。因爲法國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後，拿破崙第一獲得政權，又於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後，路易拿破崙專政，都是這樣一種性質的政權，故名。拿破崙主義的社會基礎是資產階級與保守的農民。詳見馬克思著的路易拿破崙十八號變紀第七章。

的國家，而拿破崙主義，無論如何，却是近代國家的形式，這種形式是以廢止封建制度為前提的，所以普魯士必定要消滅許多封建殘餘，犧牲貴族制度。自然，這件事是採最穩健的形式，而且在酷愛和平的腔調——「常常漸進」(Always slowly forward) 之下所做的。這種「改良」事業的例子就是有目共睹的地方條例，這些條例撤消各個貴族屬於等級的封建特權，給予他們視為大地主關於整個地方的優先權。實質依然如故，不過把封建的名詞變為資產階級的名詞而已。普魯士貴族迫不得已變為類似英國的大地主。他無須提出過甚之反抗，因為「八兩」與「半斤」恰恰相等。

所以普魯士奇特的事業，不僅在本世紀之末資產階級革命——開始於一八〇三——一三年，繼續於一八四八年——達到頂點，而且達到這種頂點是在以現時拿破崙主義的形式表現出來。如果萬事順適，世界平靜，我們都享高年，那麼，我們或可親見——約一千九百年左右——普魯士政府在實際上廢除一切封建

● 法國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革命，宣佈法蘭西為民主共和國。

制度，而且普魯士最後將達到法國在一七九二年●所站的位置。

老實說：廢止封建制度即是樹立資產階級的基礎。依照貴族特權衰落的比例，立法就一天天成爲資產階級化。在這裡，我們又看到主要的爭點——德國資產階級對於政府的態度。我們見過政府迫而採用了一些緩慢的徹細的改良；但就政府對於資產階級的關係說，政府認爲有利於資產階級的一點讓步，好像一種犧牲，這點讓步是由皇帝忍痛給與的，而資產階級爲得這點讓步，對於政府必須給與一些報酬。同時，資產階級雖說十分知道這些情形，却仍只好裝聾啞啞。這是默認的協約之源，這種協約即國會（Reichstag）和會議（Chamber）討論的基礎，一方面，政府用極延宕的手段修改法律以謀資產階級的利益；撤消從小國分立所發生的工業障礙；實行貨幣和度量衡的統一；准許貿易自由等等；准許遷徙自由；把德國的勞動力放到資本無限制的處理之下；創造貿易和投機的有利條件。另一方面，資產階級把一切實際的政治權力交給政府手中；投票決定租稅、公債、軍備；並於壓迫個人的僑警察權完全保留的範圍之內，來協助編制一切新

的法律。資產階級放棄自己的政治權力，以爲買得自己漸進的社會解放之代價。自然，使資產階級接受這種協約的動機，不是害怕政府，而是害怕無產階級。

無論資產階級在政治範圍內的行動是怎樣可憐，但一說到工商業的關係，資產階級實現它的歷史任務是不能否認的。工商業的發展已於第二版序中論及，現正用猛力前進，自一八六九年以來，在萊茵和威斯特華利亞工業區域所發生的情形是德國空前所未有的，使人追憶到本世紀初葉英國工業區域躍進的先例。同樣的事實復見於薩克森 (Saxony)、西里西亞 (Upper Silesia)、柏林 (Berlin)、哈諾威 (Hanover) 及南方各省。結局，我們有了世界貿易，真實的大工業，真實的近代資產階級。但是我們有了真實的恐慌，有了真實廣大的無產階級。

從德國未來的歷史家看來。一八五九——六四年在斯摩黑倫 (Schwarzen) 馬斯·拉·托爾 (Mars la Tour) 帥丹 及其餘地方戰爭之聲，遠不及德國無產階級

● 「南方各省」四字，在俄日譯本中則爲「海岸各城市」等字。

質樸、穩靜、不尚前進發展的重要。一八七〇年以後，德國工人立刻站在重大的試驗——拿破崙主義者戰爭的挑撥及其自然的結果，大德意志民族的熱狂——之前。德國「社會主義的」工人不會容許自己存一分鐘的幻想。在他們間沒有表現民族狹隘的愛國主義（National Chauvinism）的痕跡。他們當勝利狂熱之中，保持冷靜，要求「與法蘭西共和國締結公正、和平、不肯兼併」，甚至在戒嚴狀態中亦不能使他們沉默。戰爭的讚美，德意志「帝國莊嚴」的字句，都不能誘惑他們。他們唯一的目的在保全整個歐洲無產階級的自由。我們可以十分堅決的說：再沒有別國的工人曾經處在這種艱苦試驗中得到這樣燦爛的結果。

戰時戒嚴狀態之後，跟着來的是審問謀反，大逆不道，侮辱官吏等罪，而且和平時期所實行的警察權力，與日俱增。國民報（*Volksrecht*）常有三四個編輯者同時下獄；其他報紙亦有相同的事。凡是著名政黨的辯士每年至少不得不

到法庭一次，且常受處分。放逐、沒收、禁止開會，接二連三的發生，但一切都無效果。每個被捕者或被逐者的位置，立刻由另一人補充。某一個集會被禁止，其他二個集會又開起來，到處專橫的警察，因耐苦和恪守法律，疲於奔命。壓迫是徒勞無功的，工人政黨不特沒有瓦解或屈服，而且常常吸收新黨員，鞏固了組織。在他們反抗政府或個別資本家的鬥爭中，工人發揮了智能和道德的優越性。特別在他們和勞動僱主的衝突中，證明工人們是現在受過教育的階級，而資本家却都容易受欺者。在他們的戰鬥中，大都帶有幽默 (humour) 的意味，證明他們如何信任自己的事業，如何了解自己的優越，所以歷史上有準備的地盤所起之鬥爭，必定產生偉大的結果。一月 (1848) 選舉的成績開近代勞動運動史上唯一的創例，由他們所引起的驚異，遍於全歐。

德國工人與其他歐洲各國比較起來，有兩種重要的優越點。第一，他們屬於

● 1848年一月德國國會選舉，社會主義勞動者得三十五萬二千票。比1871年同一選舉所得票數計多二十五萬。

歐戰最富理論的人民：他們曾經保存理論的興趣，這種興趣是德國所謂「受過教育」的人民全然失掉的。沒有德國哲學，特別是黑格爾（Hegel）哲學，則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現存的唯一的科學社會主義）決不能成立。沒有理論的興趣，則科學社會主義決不能滲入工人階級之內。這毫無可比擬的優越，從下列兩方面可以看出來。一方面，英國勞動運動對於一切理論的漠視是這種運動遲緩原因之一，——雖然特別的職工會組織優良；另一方面，在法蘭西和比利時人之中則有原形的蒲魯東主義（Proudhonism）所引起的危害和混亂，在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之中則有巴枯寧（Bakunin）仿造的蒲魯東主義所引起的危害和混亂，（德國工人却不如此）。

第二個優點點 從年代方面說，德國人在勞動運動中出現最晚。德國實際的勞動運動，是有助於英法兩國的運動而發達起來，曾利用這兩國從重大犧牲中所

得的經驗，因此，能避免這兩國在當時所不能避免的錯誤；恰如德國社會主義的理論是藉助於聖西門（Saint Simon）、傅立葉（Fourier）、歐文（Owen）——這三人雖說是空想的意識和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但都屬於各時代最傑出的領袖，而其天才所預期的許多事物，到現在能用科學方法證明其不謬，——一樣。如果在德國勞動運動之先，沒有英國職工運動和法國工人政治鬥爭，沒有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強大的推動，那麼，我們現在也許不知停留在什麼地方呢？

對於德國工人的榮譽必須說到的，他們曾經利用自己地位的優點而不自知。在勞動運動史初期，鬥爭即向三方面——理論的、政治的和實際經濟的（反抗資
本家）——進行，結成諧和的和有計劃的一個實體。在這種集中攻擊之中，可謂

●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工人階級在三月十八日暴動勝利後，所創立的政權，維持了七十多天。馬克思說：「它是第一次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階級與掠奪階級鬥爭的產物。」

有德國運動的堅強性和不拔性。

一方面由於這種優越的地位，他方面由於英國運動偏狹的特徵和法國運動橫暴的壓制，所以德國工人現在成爲無產階級鬥爭的先鋒。他們享受這種榮譽地位到何時止是不能預料的。但是只要他們還在保持這種地位的時候，我們盼望他們在適當情形之下，完成自己的責任。（在鬥爭和煽動方面有加倍努力的必要）

●。指導者特別的責任，要常常更清晰的了解理論問題，從舊世界觀傳統的成語影響之下漸漸解放自己，應永久牢記社會主義已經成爲科學，則應像對待別種科學一樣加以研究，指導者的工作要把所得的明瞭理解，用強烈的熱忱，向工人羣衆傳播，用不倦的偉大的精力與政黨組織和職工會的隊伍接近。最近一月有利於社會主義者的投票，可代表相當的力量，但這還談不到德國工人的大多數；在鄉村人民中雖說宣傳的結果值得歡欣鼓舞，然在這方面待做之事尚多，其口號是在

鬥爭中不畏縮。其工作是繼續不斷的從敵人手中奪取議席，奪取選舉區域。可是第一保持真正國際精神（real international spirit）是必要的，這種精神不許有狹隘的愛國主義，而且歡迎無產階級運動每次新的進展，不管是那一種民族。如果德國工人在這種路線上前進，他們無須突出於那種運動——一國的工人突出於一切工人的陣綫不是運動的利益——但是他們在戰綫上，將佔據有榮譽的地位，而且在其他意外的重大試驗，或重大事件須要高度的勇氣。高度的決心，和行動的意志的時候，他們將為戰爭而武裝起來。

恩格斯 一八七四年七月一日於倫敦

附錄一 農民的十二個條件

THE TWELVE ARTICLES OF THE PEASANTS

一五二五年德國農民的十二個條件

全體農民以及苦於宗教與非宗教政權統治下的全體奴僕之基本的合法的條件。

願把基督所有神聖的慈愛與和平，給與基督教的信徒。

現在有許多背教徒。他們看見農民的聯合，就把它作為詆諆福音的口實；他們說：這不是新福音底結果？——不服從任何人、組織騷擾和暴動；曠聚很多羣衆，形成一個集團，爲着要改變現存的宗教及非宗教的政權，趕走它們，或者甚至於要毀滅它們。下列各條件可作爲對於這類無神的惡意的論斷一個答覆；爲了（第一），從聖經上洗去這個恥辱；（第二），以基督的學說推翻那些漫罵農民暴動；不服從的胡說。

第一，福音不是騷擾或暴動的原因。因爲它是基督與誓約的摩西（救世主）

的傳道，其言語和生活是教人友愛、和平、忍耐與同心。所以，農民一切條件的基礎（這是很明顯的）是在完成福音並在它的誓約上建設生活。到底怎麼樣這些背教徒敢於說福音是騷亂和暴動的來源呢？如果一小部分背教徒和福音底敵人起來反抗這些期待與希望，那麼這個原因不是福音，乃是惡魔，福音的死敵，他在假從他自己的人們中間利用無信仰以鼓動這類的邪教，爲了要發散他們並剝奪他們的聖經（聖經是教人友愛、和平與同心）。

第二，很明顯的，農民在自己的條件內渴望福音的教義與福音的生活，不能叫他們做不服從的或暴動者。如果上帝願意聽農民的話（他們誠惶誠恐的祈禱，希望能夠遵照上帝的話過生活），那麼誰會非難神意？誰敢於干涉他的裁斷？最後，誰敢違犯他的尊嚴？難道他不聽以色列人（Israel）的兒子們的話，當他們號泣奔其他的前面，他不把他們從法拉阿（Pharaoh）壓迫之下解放出來？難道他現在還不能挽救他自己的奴隸？是的，他正在解救他們！並且這件事會完成得很快！因此，篤信的基督教徒會熱心的來讀下列的條件並評判之。

就是這些條件：

一

第一，我們微小的請求和希望，以至於我們一般的願望和意見就是：以後政權與權利應該屬於我們，要使全體公社自己選擇或指定牧師。同樣，公社應該有權利撤換他，如果他爲人不好的時候。這樣被選的牧師應該純潔明瞭的向我們宣傳神聖的福音，不能有任何人爲的補充、曲解和註釋，並經常的向我們闡明真理的信仰。因爲不斷的宣傳真理的信仰，給我們以根據來在上帝面前請求下降慈愛的，並要他把這個真理的信仰接近我們，使我們在它內部鞏固起來。如果神聖的慈愛不存留於我們內部，那我們永遠是完全無用的，有罪的肉與血；在聖經裏面說得很清楚，我們只有經過真理的信仰才能接近上帝；只有獲得他善心的幫助，才能獲得幸福。所以我們必須這樣一個指導者和牧師，並且這個要求由聖經的話證實了。

二

第二，大的田畝在舊約全書內規定了，在新約全書內履行了。然而我們非常願意繳出合法的田畝的五穀，但總要這是適當的，應該繳出若干爲了上帝或分配給上帝的兒子們。假如能够明明白白宣傳聖經的牧師真是值得這個田畝，那我們就要規定，由公社所任命的寺產保管人以後要收集並接受這個田畝。要他們公平的從中取出一部分以供給全公社所選舉出來的牧師之費用，——供給他及其家僕，這由全公社來決定。剩餘的一點就要分給（那個鄉村裡的貧民），以事業的情形及公社的決定爲轉移。除開保護國家的軍費用費外，所餘的一點，爲着不以上地稅加因貧民。那就要從這個剩餘中取出來以彌補社會的需要。同樣，假如一個或幾個鄉村因爲貧困而出賣了自己的田畝，那麼，買主應該說句經過什麼手續從全村取得了這地土地，這時候買主才不會喪失它，可是我們根據正義、看事情的本質與情形，得着雙方的同意，到了相當的時期，重新從他手中贖回來。如果誰不是從某個鄉村買來的，而是他的祖先自己佔有的，那麼，我們不願也不應當認爲對於他們有什麼義務，而只如上面所說，我們只會供給那個被選的牧師的生活費。

或者分給貧苦的人，不管他們是信教的或不信，聖經裏頭是這樣說過的。小的田畝我們完全不納錢，因為上帝是無報酬的把家產交給了人們，並且我們認為人們所思想出來的田畝是不合正義的。因此，我們不願納錢。

三

第三，一直到現在，認為我們不是人，而是別人的私有物，這是值得悲憫的，因為基督既然流了自己寶貴的血解救了並贖回了我們全體和牧養者，像得過最貴的人一樣，沒有分別。因此，在聖經中認為我們是自由的，而我們也希望自由。自然，上帝並未教我們完全自由，與否認任何權利。我們應當遵照神聖的訓誡過生活，不能自由放肆淫逸，必須愛上帝，於我們前同胞中認識我們的上帝，對待人要和我们所欲人對待我們自己一樣，這是上帝在晚上臨別談話中教訓我們的。因此，我們應該遵照他的訓誡過生活，這個訓誡不是指示和命令我們莫服從政權，反之，不僅在政權前面，即在一個人前面，我們應該是溫馴的，同樣，在一切合於正義的與基督教的事業範圍內，我們必須樂於服從我們所選舉及指定的政

權（這些政權是上帝爲我們規定的）。

這樣我們不懷疑，你們是真正的和忠實的基督教徒，準備把我們從奴隸地位解放出來，或者你們從福音中引出一個理由來證明我們是奴隸。

四

第四，直到現在，任何貧人沒有權利獵取野馬和一切禽類及在河裏捕魚。我們以爲這個完全不公道，不友愛，這是自私自利，不合於聖經。並且，有些地方上帝養許多野獸爲害，我們的麥苗（上帝培植以利人的），無益的被無理智的野獸任意踐踏壞了（我們要忍受這個並要含默不言）。這是違反了上帝的意旨，有害於同胞。當上帝創造人的時候，上帝給他以權力駕馭一切生物，駕馭空中的鳥，駕馭水中的魚。因此，我們的希望是這樣：假如誰佔領水田而能以適當的文件來證明，這些水田是自覺的賣給他的，那我們不會從他那裏強奪出來，因爲對待這樣的人應該秉着基督的精神及爲着同胞的友愛。然而，誰不能交出充分的證據來，就應該把田地轉給公社。

五

第五，同樣森林的砍伐對於我們是很困苦的，因為地主把整個的森林佔為己有。當貧人需要時，他只得用重價買來。我們的要求是這樣，凡僧侶或平民所佔有的，一切森林，只要不是買來的，這些森林應該重新歸還全公社。公社自由的發給需要燃料的人而不取錢，同樣，他如果需要建築時，就給他，不取報酬，但要得到公社為這個目的所選舉出來的村務官的許可。如果是經過購買的手續買來的森林，那麼，須得秉着基督的門徒去徵求領主的同意。可是，如果原來就是任意佔領，後來才出賣的，那麼，應該根據事情的性質，根據友愛與學經的命令來徵求同意。

六

第六，我們很困難的負着許多義務，他們一天天的增加與擴張。我們請求，根據正義來審查一下，不要這樣加重我們的負擔。對待我們要慈悲，如對待我們的父母一樣。當他們服務的時候，……只按照學經的意思。

七

第七，我們不願再受地主的虐待了，在什麼條件之下地主根據正義給了某個農民一塊封地，那農民就應該按地主和農民的條約來管領它。地主不應該過於逼迫他或加重義務，不可對於他有別的要求而不報酬，這是爲着農民能够無負擔而又安靜的耕種及利用這塊土地。如果地主需要他服務，那農民就應該自願的馴善的來完成，可是只限於一定的鐘點和時期以內，爲着使農民不受損失，他應該得着公道的報酬而完成這種服務。

八

第八，很痛苦的，我們中間許多人得到一些租地，而這些租地沒有力量負擔加在他們身上的租稅；因此，農民在這種情形之下，遭受損失，以致破產。要求地主指定誠實的人根據正義來審查這些租地，使農民不致空做了工作，因爲每日的苦工都是值得報酬的。

九

第九，我們從刑罰方面，受着許多痛苦，在刑罰上常常公佈一些新法律，又不按照事情的實質處罰我們，有時憑着大的惡意對待這部分人，有時憑着非常的恩惠對待另一部分人，我們的要求是這樣：按照舊時的法律來加我們的處罰，要適於被處罰的行為而不根據（某人）的偏私。

十

第十，我們很痛苦，有些人把屬於公社的牧場和耕地據為己有；我們把這些土地拿回到公社手裏，只有經過誠實的方法買來的，就不拿回。如果他們是由不合的手續得來的，那就要領主自願的友愛的得到公社同意，這是事情須要這樣。

十一

第十一，我們希望完全取消所謂「Tottall」——地主佔據農民的遺產——的這種習俗。我們無論何時不忍受，不同意，違反上帝的意志，這般無恥的掠奪寡婦與孤兒，在許多地方都發生這樣的事情（在各種不同的聲調之下），他們把應該加以保護的財產，從我們手裏奪去，只要有可能，他們掠奪淨盡。上帝再不會

忍耐下去了，應該把它完全取消，無論任何人，以後不必繳出什麼遺產的大部分或小部分。

結 論

第十二，這就是我們決定的與最後的意見：如果發現這裏所列舉的條件中有一條或幾條不適用於聖經，那時候我們也不堅持這樣的條件；在某處指出給我們看，它們是違反聖經，那我們就會讓步，如果根據聖經向我們解釋明白。甚至於現在滿足我們幾個要求，而後來發現它們是不合正義的，那麼馬上就取消它們，使之不發生效力。同樣，其他的條件也不應發生效力；如果根據聖經，真是違反上帝而不利於同胞，我們會放棄這些條件；我們決定無論如何，需要在基督的教義中過活。關於這點，我們祈禱上帝，只有他能够下降天惠給我們。願基督的和平下降及我們全體。

附錄二 註釋

EXPLANATORY NOTES

註釋。

1 路易十一 (Louis XI) 法王，沙爾第七 (Charles VII) 之子，生於一四二三年，自一四六一年登位至一四八三年止。他乘法國封建制度崩潰而建立君主專制，且圖其國境至於猶拉 (Jura)，阿爾卜斯山 (Alps)，及比利牛斯山 (Pyrenees)。在他的青年做儲君的時候，他參加了貴族反對沙爾第七的暴動。他的父親死後，他就繼承王位，開始反對封建主，可是爲法國的大小封建主所聯合而成的公安同盟 (Common Wehard League) 和他對抗。路易十一在其反對此大同盟的戰爭中，屢次封建政治的笨拙方法，不憚採用武力，而且運用狡猾——虛偽的外交方法——欺騙、謹慎的手腕。他遭失敗，於一四六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不得不與

● 本註釋是俄譯本的附錄，爲葉山諾夫 (D. Kazanov) 所編。

封建主簽訂和平協約。但與封建主謀和平畢竟沒有成功。在一四七〇年十一月，他得到商業階級之助，又與封建主開始新的戰爭。法國的西部都起來反對他，這次他却勝利了，路易十一爲要能够更便利的反對封建主起見，決定解放城市軍役的義務以改良軍隊，並編成五萬人的軍隊。他的步兵是瑞士的僱傭兵士。在一四八一年，他併吞了蒲羅芬（Provence）與梨愛（Liege），並征服法國全部，遠出奈瓦（Nivernois）及不列登（Breton）公爵領土。路易十一的專制權力，只有得到商業分子的擁護才能建立。他因此保護商業工業及農業。在他的統治下，羅馬帝國的舊制度——郵政——已恢復起來。

II 加洛林納（Carolina）爲十六世紀一種刑法，由皇帝沙爾第五（Emperor Charles V）於一五三二年公佈。在十六世紀的時候，德國分爲三百餘小國，每國都有自己的刑法及其殘酷的方法。當時的法庭，其目的在拷打囚犯逼勒口供。其時通行的羅馬法，實爲諸侯用以剝削人民的殘酷工具。然而貨幣經濟的發展與專制制度的興起，要求統一的刑法，和現存法律的改良。在十五世紀末十六世

起初，德國已有改良法律的企圖。一五三二年在奧格斯堡（Augsburg）與黎根斯堡（Regensburg）的國會，採用了所謂加洛林納的刑法草案（沙爾第五及神聖羅馬皇帝所立法）。這個刑法不是廢止羅馬法，只是聯合當時通行的羅馬法與地方法律的一個企圖。加洛林納也不廢去各小國的法律，此新法典僅為諸侯及封君的指南之用。此新法典在法庭處理上發生極微細的變更。它減輕了審訊的苛令，並規定了辯護的權利。可是在新法典上，拷打依舊用做審訊被告的工具。關於「割耳」、「割鼻」、「焚燒」、「砍四肢」的條文，在新法典上仍然保存。這個新法典，下迄十八世紀，還是非常重要的。

三 瓦爾登斯（Waldens）是十二世紀中葉在法國南部城市中起來的宗教派。那時意大利北部及法國南部諸城市得適宜於宗教改革運動的發展。這些城市的工商業較西部發展得早些，實際階級已經出世了，手工業極盛一時；可是正當意大利北部諸城市，有幾分留戀於羅馬的剝削（因為它們從中分得不少的利息），僅關於天主教的教義方面，開始表示精神上的獨立性，而經濟上發展不弱

於意大利北部，同時依賴羅馬，又較少的法國南部諸城市，開始了重大的騷動以反對教皇的統治。

據傳說，瓦爾登斯派是一個里昂(Lyon)富商名叫瓦爾達(Petrus Waldus)者所創立的。可是在瓦爾達之先此派的存在是不可能的，瓦爾達決定依從福音的法則(Law of the Gospel)。他將自己的財產分給窮苦之人，收集一大批信徒到自己周圍，於一一七六年開始說教，不久瓦爾登斯派在龍巴德(Lombardy)即與自己稱為卑昂的乞丐的修米里埃派(Humiliate)聯合。瓦爾登斯派不限於只在法國南部說教。我們看到他們也到意大利、德意志及博西米(Bohemia)，在法國南部，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樣，他們在手工業者中，特別是紡織工人中，收集許多信徒。

本來瓦爾登斯派不打算退出教堂。可是他們的自由誦讀福音，通俗的說教，解釋耶穌物化●的神秘與天主教旨不適合，及其奮發勇敢的性質，使官廳和僧侶

● 耶穌物化 (transubstantiation) 一譯「化體」。

不得不用殘酷的刑罰反對他們。一四七七年教皇塞克斯塔斯第四（Sixtus IV）甚至於號召十字軍來反對他們。這些迫害一直延到十八世紀。法意的軍隊於一六八五年慘殺了三千瓦爾登斯教徒並擄去了一千名。直至一八四八年，他們在比愛蒙（Piedmont）及薩佛埃（Savoie）始得到公民的權利及宗教的自由。意大利的瓦爾登斯派，即在今日尚可與亞爾品流域（Alpine）·瓦馬提諾（Val-Martino）及瓦安羅納（Val-Angrova）見之。在十二世紀，瓦爾登斯派有四十六個公社，並有六千二百七十六個教徒。

瓦爾登斯派在中世紀時的共產主義（Evangelist Communism）帶有僧徒的性質。他們使其公社中的「完善」社員（Perfect members），必須實行共產主義及獨身主義。但是允許他們的「信徒」（disciples）結婚及私有財產。瓦爾登斯派拒絕軍事的服役與宣誓。他們專心注意於羣衆的教育。在農民及中等階級佔優勢的區域內之瓦爾登斯公社，他們變成了資產階級民主派。而在無產者佔優勢的區域內，他們成了共產主義的「夢想者」。

四 亞諾爾·封·伯利霞 (Arnold von Brescia) 在十二世紀中葉其最初重要的企圖便是改良天主教。他在一一〇〇年至一一一〇年間生於意大利伯利霞地方。他是神學家及哲學家亞勃拉德 (Abelard) 的弟子，對於宗教的信條及聖文的教訓採取批評的態度。在一一三六年，他參與其故鄉伯利霞反對教主、僧正的鬥爭。他企圖使僧侶復歸於福音的正真基督教。他要求僧侶須放棄世俗的權力，並須將他們的財產奉交與世俗的統治者。他說傳教的僧侶必須以什一稅 (Tithes) 及自願捐滿足自己。在一一三九年第二次羅馬城內教堂會議上 (The Second Lateran Church Council)，伯利霞的僧正控告他為異端。他於是不得不逃至巴黎。在一一四六年，他復歸羅馬，參加了城市民主派反對教皇的鬥爭。

羅馬當十二世紀中葉的時候，是精神的及政治的中心，凡基督教流行的世界都輸入財富於其地。教皇很巧妙的剝削了基督教資本的優越情勢。亞諾爾·封·伯利霞向人民陳說推翻教皇而恢復古羅馬共和國。可是教皇哈德林第四 (Hadrian IV) 竟能逐他出羅馬城。他為亞羅薩 (Frederick Barbarossa) 所執，解送於

羅馬的執政者。他於一五五年目為狂暴的異端被絞而死，他的屍身葬於火中。

五 亞爾比根派 (Albigenses) 為法國南部的宗教派，在十一世紀及十二世紀風行一時，他們的名稱從亞爾比 (Albi) 城 (在蘭格陀——Langue-doc) 得來，這城是這種運動最重要的中心之一。亞爾比根派宣傳現世的基督教及按照福音的簡樸生活。他們被稱為「善人」(Good men)，教皇及教堂的會議說他們否認三神權 (Trinity) 的教義。聖餐與結婚及耶穌基督死而復生的說法。教皇加里克脫第二 (Calixtus II) 在一一一九年都魯斯 (Toulouse) 會議上，嗣後教皇普諾霜第二 (Innocent II) 於一一三九年都先後宣佈與他們斷絕關係。最後，一二〇九年，教皇普諾霜第三 (Innocent III) 組織十字軍來反對他們。這次戰爭延長到二十年之久。

反亞爾比根派的血戰之堅持，一部分可用亞爾比根派在反對教皇的戰爭中，

● 三神權的教義「三位一體」，即相信父神，子神，聖靈 (Holy spirit) 是三個人格，而是一個實質，一個動的教義。

受法國南部地方封建主的援助之事實來解釋。當教皇的使臣和異端審問者在都魯斯魯蒙第六伯爵 (Count Raymons VI of Toulouse) 境內被殺的時候，教皇許諾第三決定利用時機奪取魯蒙伯爵的土地，因為魯蒙伯爵對於異端採取寬容的態度。法國南部的封建主與為北部封建主所擁護的教皇之間遂開始鬥爭。法國北部與南部已在衝突之中，而南部的經濟較北部為發展，故對於北部給與一種威脅。北部的軍隊，由西門伯爵 (Count Simon de Montfort) 及教皇的使臣統率。當北部的軍隊佔領培壽埃城 (Bevers) 的時候，他們殺死了二萬亞爾比根教徒。在嗣後鬥爭的過程中，死者成千成萬。蒲羅芬及蘭格陀諸省，都受蹂躪。直至一二二九年始成立和約。此次反亞爾比根教徒戰爭的結果，富裕的南部破壞無餘，而法王的領土則伸張了。

六 約翰·烏克里夫，生於一三二〇年十月，死於一三八四年，是英國的一個改良派。他是宗教改革運動（十五世紀及十六世紀）以前理想家之一，並制定未來改良派的提綱。約翰·烏克里夫為牛津 (Oxford) 大學的教授。在他未登社

會的和政治的舞臺以前，專心從事於物理、邏輯、哲學的探討。十四世紀是英王與教皇作猛烈鬥爭的一個時期。教皇很殘酷的剝削英國。在十三世紀，英國每奉供給教皇一千銀鎊的貢賦。十四世紀愛德華第三（Edward III）當權的時候，國會大鳴不平。以爲英國給教皇的金錢五倍於英王收入的稅額。工商業的發達，增強了英國的抵抗能力。英法間的百年戰爭（一三三九——一四五六），加深了羅馬與英國間的鬥爭。這次戰爭影響到英國各階級的利益。英國統治階級營謀取得荷蘭的金庫，而又以其貪慾無厭的目光，覬覦法國貴族的資財。中等階級在此次戰爭中看到了致富的工具。而戰爭的負擔則全放在農民的肩膀上。所以毫不足奇，教皇自與法國締結同盟之後，就引起全英的憤怒。在一三三六年，國會廢止對於教皇的貢賦。在意法兩國受摧殘的異端，現在却廣佈於英國了。烏克里夫的教義，在人民的一切階層中極爲流行。他以為在必要的時候，國家有權利奪取教會的財產；並以為修建建築於勤勞之上，故只有勤勞的佃戶才能應收賦稅。在一三七四年與羅馬代表的爭執中，烏克里夫又揭穿了羅馬教堂對於英國掌教地位選擇

候補者之欺騙。他受僧侶們殘刻的迫害，只有朝廷的干涉，大學與城市的調停，才免於難。

在烏克里夫的教義中，他絕不越出統治階級所提示的範圍一步。他宣傳基督的貧困與平等，但僅限於僧侶的範圍。他提議僧侶的土地須給人耕種，但這完全屬於地主及英王的利益。至於人與上帝間的關係，他在自己時代的封建關係之影片上描寫出來了。他說人們自上帝手中得到一切財產。上帝的慈悲，就是采邑的條件。他又謂人們的深重罪孽，由上帝的慈悲剝奪了他們擁有財產的權利。所以他說僧侶須有共同的財產，須受國家法律的管轄。他又說作人類良心的最高裁判者，並不是教皇，而是上帝。

自一三八一年的農民暴動後，對於烏克里夫反對教皇的一般同情心，變成了擁有財產階級對於他的仇恨心。牛津大學辱罵他否認耶穌物化說之十二個條件。他雖得安然而死，可是他的教義却受了殘酷的迫害，一四一五年，在君士坦斯（Constance）的教堂會議上，決定焚燒他的遺體。

轉系的，即十五世紀所謂胡斯派運動(Husite movement)者是。當十四世紀及十五世紀的期間，羅馬天主教在民衆中已喪失了它的權威，在一切人民的目光中，羅馬教皇是一個創制者，藉上帝與天國生活之名以剝削他們塵世的財產。在英、法、西班牙諸國中，教堂帶有民族的性質，與羅馬斷絕關係。德國是一個例外，成爲教皇貪慾的目的物。如果其他國家是在比較良好的情形之下，如果他們早在教皇羈絆之下得到解放，那麼，這只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由於財富的增長，由於中等階級與諸侯勢力的伸張。在全德國，關於這一點，只有博西米是一個例外的情形。博西米在十四世紀，因爲有銀礦，經濟上有了出乎意外的發展。教堂、國王、商人及手工業者獲得極大的利益，教皇與皇帝恐怕博西米脫離他們而獨立，所以最精會神的注視它。國內不滿意的情緒就開始增加起來。下層貴冑、農民及中等階級都不滿意了。因銀子豐富所造成的價格革命，釀成了一個普遍的飢荒。加之，博西米的民衆是捷克人(Czechs)，而世俗及宗教的統治者之

上層剝削階層則爲德意志人。所以此處的階級鬥爭，表顯出博西米人反對德人與教皇之宗教鬥爭與民族鬥爭的特質。在這個革命的過渡中間，英國改良派烏克里夫的思想深入到博西米。胡斯是烏克里夫思想的擁護者與闡明者。

胡斯在一三六九年生於一個富裕的農民家內。他是著名的蒲拉溝大學 (Prague University) 的教授，且曾做過該校的校長，並做過培特勒亨教堂 (Chapel of Bethlehem) 的牧師，以捷克的語言講經說法。當蒲拉溝大學反對烏克里夫的四十五條款的時候，胡斯就起而擁護烏克里夫 (一四〇九)。在一四一二年，教皇約翰第二十三，因爲需要錢的緣故，在蒲拉溝發賣贖罪證。胡斯挺身而出痛斥教堂的腐化，並要求停止這種買賣。他並反對所謂「奇蹟」(miracles)，他在特別論文中，證明真正的基督信徒不需要奇蹟，且證明真正的信仰都包括在神聖的經典之中。他認爲教堂僅是一個信徒升天的集會之所，因此他招惹了統治教堂的上層僧侶的仇恨。

他所著的書，於一四一〇年六月六日被焚，他受逐出教會的處分。在一四一

四年，君士坦斯教會的會議指他爲異端，他雖然宣佈關於聖經與其個人意見相異的地方願接受教堂主持人們的指導和命令，他終究被送於執政者之手，於一四一五年六月六日焚燬而死。他的遺灰則拋到萊茵河（*Rhine*）。

八 胡斯派（達波奈特派——*Taborites* 加里克廷派——*Catharines*）胡斯之死，使博西來的革命風潮勃興。博西米各階級的民衆都起來反對教皇的權力，要求教堂的改良，並反對德意志人以謀民族的獨立。在這次民族的及宗教的鬥爭中，民衆洩了他們對於有產階級的公憤。可是在開始的時候，博西米的各階級是一致行動的。其鬥爭的口號是要求二種形式的聖餐。據天主教的儀式，在聖餐中只給庶民以麵包，而僧侶則給以麪包和酒。羣衆起來反對擁有特權的教堂，則要求在聖餐中的平等權。「庶民應有聖餐權」就是這次運動的口號，加入這次運動的貴族，利用這次鬥爭以合併教堂的田地，因爲僧侶所有的田地不下全國四分之一的面積。富有的資產階級在胡斯派的戰爭中，亦看到從僧侶與德國天主教城市（古登堡——*Gutenberg*）——以其著名的銀礦最爲垂涎）的財產中可得到

更多的富源。加入胡斯派運動的貴族與博西米富有的資產階級結成了加里克廷派或稱烏忒拉格派 (Utraquist) 的溫和派。蒲拉溝城是他們的中心。與這個溫和派運動時並存的，尚有一個民主派。民主派的柱石為欲得私有土地的農民所組成，特別是在貴族奪取僧侶的田地以後的時候。城市下層中等階級，與無產者是擁護農民的。他們集中於博西米的小城市。嗣後民主派用了為他們軍事政治中心的共產主義城市達波 (Taber) 的名。遂自稱為達波奈特派。現在胡斯派的運動為一批共產主義者所領導了。

在一四一四年，民衆將萬歲老王 (King Wenceslaus) 逐出蒲拉溝城，從此以後，歐洲各地的異端就開始流入博西米了。

培格哈德派 (Behardite) 和瓦爾登派 (Waldenses) 在博西米尋得了安身之所，以避刑戮，共產主義者在達波城作保羅以自衛，並在該處從事鼓吹。他們宣佈基督的千載太平已到來了，主奴之分將不復有了，人民將復歸於原始天真的境域。在各處城市，特別是在達波，暴動者開始組織了產共主義的中心。達波位於

金礦的附近。商業和工業在該處是很興盛的。當共產主義者在達波城強盛的時候，他已吸引了廣大的民眾。據說，一四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一個聚會上有四萬二千人到場。達波城的居民，彼此都以兄弟姊妹相稱，不承認有「爾」、「我」的界限。達波奈特派宣稱「在地球上不應有帝王，不應有主人，不應有臣僕；而各種賦稅應即廢止」。據他們的教養，沒有強權，萬物屬於公眾，所以他們謂擁有財產的人即是犯了大罪惡。可是這種共產主義，純屬基督教的性質。這是消費的共產主義；不是生產的共產主義。各家都爲自己而工作，而將其剩餘交納於公共的財庫。在達波奈特派中有最極端的共產主義者，他們不允許讓步，並且否認家庭。這些「有自由精神的兄弟姊妹」，自稱爲亞丹米派（Adanites）。達波城居民中大多數與哲志加（Zezig）領導下的騎士發動反對亞丹米派的鬥爭。

達波城的共產主義公社，組織異常完善。它爲軍事的公社，驚動德皇的諸侯，曠時甚久。達波奈特派代表第一次當備軍的組織，且在作戰時第一次使用砲兵。達波奈特派能够自保幾及一代之久，是由於他們注意教育，由於他們在公社

內能够維持秩序及紀律。達波城的陷落，大半由於胡斯派的分裂所致。溫和的加里克廷派自得到了僧侶的土地後，不願承認達波城的威權。達波奈特派反對國王教皇及全歐的戰爭，是不利於貴族的。自一四三一年達波奈特派在賽斯（Saas）得勝以後，彷彿沒有仇敵能與他們抗衡似的。但是加里克廷派於此時就開始與其仇敵協商了。他們決定召集一切勳爵、騎士及城市的代表會議，討論組織政府的計劃。達波城自己亦分裂。下層中等階級及農民又漠視共產主義綱領。他們需要和平，達波城的共產主義是不穩固的。它沒有共產主義生產的基礎，所以物質生活平等不久就消滅了。在達波城，有富人，也有窮人。

達波的軍隊中，擁擠着「各國的流氓市儈」。一至貴族以較共產主義公社為優的條件募集軍隊以反對達波的時候，叛變的萌蘗就竄入於達波奈特派軍隊的隊伍之中，而整批的逃走遂開始了。這就是達波城陷落的理由。在一四三四年五月三十日，達波奈特派於采斯格·勃羅得（Cassell Brod）附近受了一次大敗。一萬八千達波奈特派兵士之中，戰死者，有一萬三千人。在一四三七年，他們不得不

與塞其斯蒙 (Sizemund) 締結和約，塞其斯蒙為他們保證達波城的獨立。雖然如此，可是達波城的共產主義公社不久就消聲匿跡了。

九 鞭答派 (Scourging Trials)，是以皮鞭自撻的黨人，在十一世紀出現於歐洲，而盛行於三十四十五世紀。這種運動自意大利傳播於法國南部、荷蘭、亞爾薩斯 (Alsace) 及勞拉因 (Lorraine)。鞭答派宣稱身體上所受的痛苦能够赦免罪惡。喬治第七 (George VII) 是這派最初神學理論家之一。他謂忠實的信徒按照這種法子以與耶穌競進，謀得殉教的頭銜，毀棄自己的肉體，滌除自己的罪惡。這種教義，是與中世紀所盛行的，用基督之名，以榜願敗絮自甘，堅苦卓絕的忠實信徒所力行的禁慾主義 (Asceticism) 相同的。可是鞭答派的運動帶了另一層更毒的性質，帶了一種適合羣衆心理的性質。所以在十三世紀的時候，成群的平民衆步行於意大利諸城市中，一方面以皮鞭自撻，一方面則祈禱赦罪。自「黑死」 (Black Death) 傳染病的大禍以後，這種運動帶有危險性。在德、法、富蘭德 (Flanders) 許多地方，鞭答派大起恐慌，以為基督因人類罪惡滔天，

將要毀滅世界，他們因此加自身以殘酷的刑罰。在德國諸城市中，鞭答派的公社就開始存在了。『那些願意參加鞭撻自己的人們必須拿出少許的金錢，這是對於改教者 (Proselytes) 的唯一的要求』。在十五世紀時，這種運動趨於低落，但未完全絕跡。十五世紀的鞭答派揭穿僧侶的罪惡，並要求大批教堂的改良。羅馬教堂在當初因為這種運動在意大利是反對皇室的可為教堂增強勢力的工具，所以不加反對，但到了此時，就開始加鞭答派以追悔了。在十六世紀及十七世紀時，這種運動成了宮廷的時髦品。婦女在其中開始佔了優勢。即在十九世紀尚有這一派的遺跡可尋。

十 洛拉德派 (Lollards) 是十四世紀及十五世紀時盛行於英國勞動羣衆中的宗教派。那時的異端不僅在統治的階級中得到舒適的棲止所。在事實上，一切階級經過改良運動，形成了自己的要求。所以在英國最貧苦的紡紗工人中的培格哈德派 (Peghards) (在英國通稱爲洛拉德派) 遂存在了 (洛拉德就是送葬唱歌的人)。培格哈德派初見於荷蘭諸地 (富蘭德與勃拉崩——Brabant)，那處

的工商業較歐洲其他各部要進步得早，而且養羊及毛織工業發展亦達高度，培格哈德派大都為織工的兄弟會。屬於此派未結婚的手工業者，住在公共房裡，過共產主義的生活。當富蘭德的紡織工人遷移到英國的時候，這種運動就在英國開始了。諾福克（Norfolk）是毛織工業的中心，也成為英國培格哈德派，即洛拉德派運動的中心。洛拉德的宣傳者自稱為「窮兄弟」；廣傳其新教義於全英。強迫的「窮牧師」對人民宣傳，認為世俗的和宗教的財產應該作為公共的財產。他們請求人民不納貢賦及什一稅於僧侶，並請求僕役拒絕為主人工作。洛拉德派於一三九五年，向國會請願，要求改良英國的教堂，禁止教堂貪婪糜俗的財產與獨身主義。這個請願被拒絕了。

洛拉德派中最出色的代表是約翰·巴耳（John Ball），為康德地方（Kent）瘋的牧師。他是從佛郎西斯教（Franciscan）教徒中跑出來的，同情於洛拉德派的運動，成為一三八一年英國農民暴動領袖之一。巴耳從一三五六年起，常在愛撒克斯（Essex）及諾福克諸地方說教，到城市中心及道院中演講。其演講極為通

俗，他鼓吹公有財產力勸人民剷滅貴族。他說，只有人民平等的時候，主人人才不會較其餘的人高出一層。他謂一切人們都是出於亞當及夏娃（Adam and Eve）的。「在亞當耕夏娃織的時候，誰是縉紳先生呢？」他這樣設問。他於一三八一年在暴動鎮壓下去的時候，被殺而死。

當洛拉德派運動與農民暴動及城市中中等階級的反對派運動相聯合的時候，才重要起來。自一三八一年以後，洛拉德派處於艱難困頓之中。凡屬洛拉德派都看作罪犯，並受罪犯的待遇。反對這派的恐怖手段繼續很久，可是在勞動羣衆中下部階層內這派是未曾絕跡的，即到十四世紀末及十五世紀初，還有許多小冊子，如「農夫的榜告」，及「燈光」等可以證明。洛拉德派用英國文字在人民中間傳播聖經的知識。

十一 千載太平的幻夢（Chilastic dreams）即錫利亥主義（Chiliasm），就是耶穌再降世爲王一千年的教義，這個時期，是一千年的太平和快樂。附會這種教義的人說，一切痛苦和窮乏都要消滅，而人類與新自然間之完全融合將重新

建立起來。當中世紀自然的痛苦與社會政治的災禍交迫的時候，這種千載太平的幻夢極爲盛行，而在比較平靜的時代，錫利亥主義只是極少數人的學說。在十世紀基督教徒被迫害的時間，廣大民衆都中了千載太平幻夢的熱狂，因爲他們預計耶穌降生後的一千年，即是世界末日了。可是在十四世紀及十五世紀，在宗教改革的時期，千載太平的幻夢更爲廣佈。復返於福音運動，宗教的紛擾，與剝削工人的加緊配合起來，即是培植千載太平幻夢的沃土。杜瑪斯、孟彰爾、再洗禮派與達波奈特派，都信從千載太平的神秘教義。

盛行於中世紀的社會條件，創造了適宜於神秘主義的環境。羣衆的愚昧營養了神秘主義。此外，錫利亥主義，信仰奇蹟，與神秘的幻想，是當時替其全力無法自救的羣衆之一條出路。他們的意見以爲只有神秘才能推倒壓迫者與剝削者。這些羣衆不得不相信耶穌再降世的奇蹟，以期不至陷於絕望之境。

十二 馬丁·路得 (Martin Luther) 的名字，是與十六世紀德國宗教及社會政治變遷的歷史，即所謂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的歷史，有聯系的。路得並

不是這個運動的發起者。他的活動與主義並不能包括宗教改革之社會的歷史。在十六世紀革命運動中，他是中等階級與貴族聯盟的代表。

自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商業資本變更了歐洲人民的舊有的自然經濟，而使封建制度的政治系統成爲贅瘤。專制政體的勝利成了一種經濟上的必然。在另一方面，商業資本的發展，使地主加緊農民的剝削。農民從封建束縛下解放以後，地主增加農民的擔負，對農民徵收金錢以替代他們的苦力及自然品；農民不得不拋棄土地，於是將來無產階級的核心就形成了。這種初期的無產階級，爲軍隊首領及商人所利用，軍隊首領所利用他們作軍隊的來源，而商人則利用他們在工廠中作工。在經濟革命的時期，封建貴族，成了歷史發展的障礙，下級貴族及騎士們，處於農民及上層貴族之間，保守中立的地位。騎士們企圖挽救自己迫於屠戮的破產，在德國這兩個階級營壘的鬥爭，由於德國經濟發展的特點而複雜起來。當十六世紀初，德國因其礦山及商業之故，在經濟上還是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可是歐洲經濟的中心，不久從地中海流域轉移到大西洋沿岸。德國的發展，與東歐

全部一樣，趨於停滯。在這種環境之下，當時社會政治情形，不是崩潰，便是根本變遷了。全歐爲可怕的戰爭及革命所震動着，幾及百年。羅馬教堂的剝削，在德國最感受得厲害，屬於羅馬教堂的寺院及主教們剝削農民及城市，到了使其破產的地步。中等階級反抗寺院給貧民以幫助，因爲這種幫助，限制了他們在羣衆中的剝削。

羅馬教堂在拍賣教堂的官職上，特別是在拍賣贖罪證上——以金錢贖罪，找到了收入的不絕之源。教堂的主教們在他們的區域內剝削人民，同封建地主及商業資本家在自己區域內剝削人民一樣。反對羅馬教堂的鬥爭成爲不可避免了，經濟上比德國進步的英法，不久就脫離了教皇的統治，可是在德國必須有一個長期的猛烈的鬥爭。

在德國，各階級人民在羅馬教皇剝削之下深感痛苦，但是各階級都有自己的綱領。路得的宣傳，是下面三種鬥爭最初聯合的中心：第一，是騎士反對諸侯的鬥爭；第二，是下層剝削和農民反對羅馬教堂的主教及封建勳爵的鬥爭；第三是

城市中等階級反對城市貴族——閹閹之家——的鬥爭。

路得是一五八三年十一月十日生於農民之家。他的父親在礦山作工。他於一五〇一年入愛爾福特大學（Erfurt University），與該校中人道主義者小組，即激進思想的辯護者，甚為相得。至一五〇五年，他進入寺院，與一切良善的天主教徒一樣，謁見教皇。他於一五〇九年，在威頓堡（Wittenberg）大學擔任講演。當一五一七年，教皇里阿第十（Leo X）的代表推彩兒（Tetsel）在薩克森拍賣贖罪證的時候，路得即在威頓堡教堂的門上懸掛其九十五條理由反對贖罪證，他反對羅馬教堂的最初抗議，是很怯懦的。路得反對教堂的腐敗。第二十一條理由上說道：「當贖罪證的辯護者說，得到教皇的赦免的人可免除一切的刑罰的時候，他們是差誤了。」第二十七條說道：「宣稱剛剛將辨士（Denny）投入箱內，靈魂便可脫離地獄的話，真無意識極了。」路得的九十五條理由的影響，竟為他原來意料所不及。他推進了在他前面已經開始的運動，這次運動把德國一切階級都捲入漩渦。三個集團：即天主教保守派，中等階級改良派，及平民革命派，

都加入了鬥爭。路得成了中等階級改良派運動的領袖，最初主張訴之暴力，用火與鐵以掃除他所說的破壞世界的毒藥。他鼓吹以堅決的鬥爭反對世俗的及宗教的諸侯。在一五一七年與一五二二年之間，他預備與民主派同盟合作。可是在一五二二年與一五二五年間，他叛賣了他的同盟者，即農民及下層僧侶。他變更態度，由於芝威考（Nackau）的再洗禮派及農民運動之故。他也受了騎士暴動的影響（一五二二年秋）。

窩爾根·封·西鏗根（Frams von Sickingen）和烏爾利黑·封·胡頓（Ulrich von Hutten）是這些騎士們暴動的領袖。前者為這次運動的軍事領袖，而後者則為其理想家。他們對於教皇及諸侯的仇恨，及其改造統一的德國的企圖，使他們在十六世紀中葉為德國資產階級的英雄。可是在實質上，處於資本主義已開始發展的社會中，這種聯合騎士的運動是反動的。西鏗根和胡頓夢想恢復中世紀的舊觀，使政權復歸於貴族而以皇帝作他們的傀儡。雖然他們不得求助於城市及農民，但他們不曾有過解放城市和農民的志願。一五二二年夏，西鏗根率領軍隊攻擊

特利爾 (Trier) 的「教士巢穴」。但是萊茵及斯哇比亞 (Suebian) 諸侯的聯合軍隊，給了他們一個嚴重的打擊。許多堡壘成爲灰燼，許多騎士身首異處。路得並不擁護這種運動，且貶斥這種運動同農民運動一樣。

在他初作的著述中，他稱諸侯爲「世界上最愚笨的蠢漢，最可憎的惡徒」；關於農民戰爭，他最初的言詞是擁護暴動者的。例如，他曾經寫過：「這不是農民起來反對你們大人先生們，乃是上帝自己要懲罰你們的罪惡。」路得希望在農民運動中得到援助以進行其反對羅馬的鬥爭。但是在四五月之間，當農民暴動蔓延全國，焚毀堡壘，帶有共產主義性質運動的時候，路得即幫助諸侯進攻暴動的農民。他認爲這種運動由於農民的安閑生活所致，他請求諸侯「絞死他們當作絞死瘋狗一樣」，當暴動鎮壓下去的時候，他誇口說：「他殺了農民，因爲他曾下過殺農民的命令」。他又說：「他們的血，盡灑在我的身上」。

路得與獲得教堂財產的諸侯之間締結了同盟。宗教改革對於他們及大城市的暴動者都是有利益的。在一五二六年斯白伊爾 (Speyer) 的會議上第一次頒佈巨

僕必須服從其主人的命令。這樣一來，就救了公開與路得聯合的諸侯。的確不差，在一五二九年恢復了天主教的儀式，而沒收僧侶土地的行動在路得派諸侯的區域中亦停止了；可是路得信徒的少數派反抗這個決定，因而得新教徒 (Protestanten) 之名。到一五三〇年，在奧格斯堡 (Augsburg) 的會議上，新教徒的諸侯呈上或謂路得信徒的奧格斯堡口供 (Augsburg Confession) 於皇帝沙爾第五 (Charles V)。這篇呈文分二部分：第一部分說明他們的新信仰，第二部分貶斥羅馬教會的腐敗及必須改良的大綱。

奧格斯堡口供這樣寫道：「我們拒絕那些宣傳只要良善行為而不要信仰可以赦免罪惡的人。」口供裏說：只有遵守上帝的語言及聖靈的指導，人們才能見悅於上帝。口供又說：我們必不可把政府和教皇的權力混淆起來；宣示福音及舉行儀式，屬教會的權力；可是教堂不應干預政府的事務。

奧格斯堡口供的公佈不是鬥爭的終點。一五五五年九月，在奧格斯堡的會議上，即所謂奧格斯堡宗教的和平會議上，關於臣僕服從其主人的義務問題，承認

了一五二六年的決議。這個決定很明顯的指出德國處在諸侯統治之下還須保留割據的局勢。

路得主義成了經濟落後國家的宗教。它廣佈於德之西北、丹麥、瑞典；而該地的諸侯、僧正、地主成爲路得派教堂的保護者。就是此部分改良的成功亦只是農民、城市、及騎士們革命運動的結果。

十三 法路利的約亞西 (Jochism of Floris) (加拉勃利亞的——of Calabria) 是十二世紀意大利的信仰秘教者。他的永久福音的學說，通稱爲約亞西主義 (Jochism)。在他的理想中，天書告訴我們世界經過三個時期：即法律的時期；或稱父的時期；福音的時期或稱子的時期；及精神的時期；而精神的時期將使前二時期歸於終結。他說第一個時期與舊約相合，即世俗有權力者統治的時期。外表法律及肉體得勢的時期。第二個時期，即僧侶統治，精神與物質利益交錯的時期。他說：他在這個時期內生存。他預言第三個時期不久即來，其特徵是，精神優勝於肉體，僧侶成了統治者，而永久的福音成爲世界法律。約亞西否

認人預爲耶穌所救之說。

約翰西生於城市的家庭，他爲時疫傳染的恐怖所刺激，出家爲僧，在費阿爾（F.）地方建立霜·基芬尼（San Giovanni）僧院。他著了三冊書，即新舊約索引（Index Concordance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Testament）及默示錄論（Commentary on the Apocalypse）。數十年以後（1160年），約西內的信徒爲教皇所咒罵及受嚴酷的迫害。

十四 尼古拉·斯托黑（Nicolas Torch）是芝威考（Zwickau）的裁縫，他在那裏以宣傳宗教的共產主義著名。杜瑪斯·孟彩爾受了他的影響，且認爲他了解聖經高出於一切牧師之上。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有十個公社，其中有十二個傳道弟子，整個的依附於斯托黑。他的信徒相信默示給斯托黑以真理。在一五二二年五月十六日，芝威考請來一位新說教者，即西尼像的尼古拉·何士門（Nicolas Haermann or Shickoburg）。是路得的知交朋友，因此斯托黑的活動遇到頑強的反對。斯托黑被逐離開此城市，出走威頓堡，「芝威考的預言者」希望在

該處得到從前爲路得的同事名叫卡爾斯達（Christof）者的援助。可是他們又被迫逃到德國南部，在那裏斯托黑夢想建設一個地球上的天國。他說，神聖的默示使他很明白社會改良的真正道路。在一五二二年，斯托黑居於喬林基（Thuring）。

（三）他在該地成爲農民戰爭中主謀者及領袖之一。他與孟彩爾、佛伊浮（Pfeifer）及其他諸人通力合作，草就要求的綱領，宣佈財產應歸公有，因爲上帝所生的人都是一樣的赤手空拳，而給與他們以地上、水中及天空之下的萬物。這個綱領上說道：凡一切官員，不論是政府的或教堂的，皆宜一律撤除，不然就殺去。因爲每人皆有自由的意志，能够接受審的拒絕惡的，所以每人都能够自由宣傳上帝的法則。他在一九二五年死於麥匿黑（Munich）。

十五 基阿基·多沙（György Dózsa）是十六世紀匈牙利農民暴動的領袖。當時匈牙利專制君主與封建主間的鬥爭尙在繼續。自馬紀安王（Kiná Mathias）（他得人民的擁戴以反對封建主頗有成功）死後，封建主在烏拉地士勞（Ulathis）統治之下重新得勢，於是盡廢馬紀安王的改良（常備軍亦在其內）。匈牙利

利全國受了封建主鬥爭的慘毒。在一五一四年，教皇宣佈了一個反對回教徒的新十字軍。基阿基·多沙在反抗土耳其的戰役中，以善戰出名，遂被擇為統領，在二十天之內，他收集了六萬民軍。他是軍事上的首領。他有二個跟隨的牧師，以其說教鼓動兵士、農民及城市人民。封建主很不樂意他們的僕役加入十字軍，及至收穫迫近的時候，他們要求其僕役回來。多沙及其牧師就鼓吹人民叛變以回答封建主的哀求。於是全匈牙利的農民羣起騷動，與封建勳爵的鬥爭遂開始了。當時匈牙利農民的情形比較其他國家要好一點，但是因為在匈牙利稍有一點自由，農民更感覺到農奴制度的壓迫。與土耳其不斷的戰爭，使匈牙利陷於破產的地位。人口大為減少，農民遂覺得自己能够驅逐封建主讓步。可是精於戰術的農民希望得到完全的自由。鄉村中的下層階級，因憎恨教堂的首領，也加入農民隊伍。但是他們與加入農民運動的城市中等階級，不久就叛賣了農民運動。

一五一四年農民暴動的領袖們，宣佈貴族是一個罪惡的階級，奴役農民的肉體與靈魂。他們鼓勵摧毀封建主的房屋與堡壘。基阿基·多沙教農民用兵器，使

全國的農民都起來。約翰·查波爾雅(John Zapolya)統率下的封建勳爵的軍隊皆受調動以敵多沙。這支軍隊得了城市中階級及貴族的援助(最初是農民的同盟者)，很殘酷的鎮壓了這個運動。基阿基·多沙拚死作長久的抵抗。他宣佈共和制，聲明廢止王權及特權階級。雖然他得全國農民羣衆的同情，可是終於在頓敏斯佛(Temesvár)失敗了。他受極殘酷的刑罰致死。他被放到赤熱的鐵寶座上，他的頭加上了赤熱的鐵冠，並使他的手握着赤熱的鐵杖。多沙唯一的呼聲是：「這些狗」。在這次暴動中，被殺的農民達六萬以上。參加會議的封建主決定增加農民的負擔，並宣佈農奴制度爲永久不變的制度。

十六 玫瑰戰爭——一四五五——一四八五年 (the War of the Roses) 自英法間的百年戰爭結束(一三三四——一四五〇)及英國的軍隊不得不退出法國境後，蘭坎斯忒(Lancaster)與約克(York)二朝統的血戰繼之而起，延綿至三十餘年之久。蘭坎斯忒朝統以紅玫瑰(red rose)爲標記，代表威爾士(Wales)及北部封建主的利益約克朝統以白玫瑰(White rose)爲標記，依靠東南部商

業、城市居民、農民及下議院。這二個朝統間的死命鬥爭，乃所以決定英國是否成爲君主專制（假若約克朝統得了勝利）或封建主割據的局勢（假若蘭坎斯朝統得了勝利）。

早在十四世紀，大部分土地集中於少數貴族的家庭。至十五世紀，上議院的老議員只有從前三分之一。承繼的朝統併吞去那些絕滅家族的士地，當百年戰爭告終的時候，遣散了軍隊，從前的兵士作了封建主的僕役。在十五世紀後半期，二個朝統的戰爭即開始了。在諾霜登（Northampton）一戰（一四六〇），約克擒獲英王，強迫上議院承認他是英國的保護者及王位的承繼者。他後來被蘭坎斯朝統所擊敗，可是他的兒子愛得華（Edward）終能奏凱回倫敦（一四六一）。愛得華的軍隊對於貴族是極殘酷的，在道登（Tunton）之戰，被處死刑者有四十二個騎士和二個封建主，而愛得華手下將軍中之瓦維克（Warwick）則注意於不傷害平民。

愛得華第四之登王位，即是白玫瑰的勝利，是君主專制時期的開始。愛得華

第四並不提出英國國會選舉自己的問題。他趕走了一切封建主，甚至於他最親密的朋友亦因反對他的意志而被逐（他對於國王的創造者的瓦維克之鬥爭）。在他反對封建主的鬥爭中，他利用了僱傭軍隊，使封建式的民軍歸於無用。他很殘忍的剿滅了蘭坎斯式如統的依附者，爲了保障他的勝利起見，他拒絕新的彌追借款；並爲了得到農民的掩護起見，他要求國會通過禁止奪取農民土地的法律。所以玫瑰戰爭，在英國鞏固了君主的專制政體。

十七 威廉齊澤門 (Wilhelm Zimmermann) 德之歷史家及詩人，於一八〇七年一月二日生於斯達特加 (Stuttgart) 一個手工業者的家裏。曾畢業於斯達特加的書院，並與斯得勞士 (F. Strauss) 同在都賓根大學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肄業。初爲牧師，繼作斯達特加專門大學的教授，任歷史、德文及文學諸課。他於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被選爲國民會議 (富蘭克佛——Frankfurt) 的代表。在聖保羅教堂 (St. Paul's Cathedral)，他加入極左派代表集團之中。在一八五〇年他失去了大學內的位置，因爲積極參與過三月革命。至一八五四

年，他在查伯加（Zabergau）復任教師的工作。他死於一八八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威廉齊恩門以其大農民戰爭史一書（一八四一年初版，一八五六年再版，一八九一年三版），而得歷史家的名。他尚有其他許多的歷史、文學史及詩學的著作，如：何思操芬族的歷史（The History of Hohenstaufens）（一八六五年再版），德國民族史（Illustrated History of German People），各國詩學史（History of Poetry of All Nations——一八四七年）等書。

他的主要歷史著作——大農民戰爭史——是用驚人的及客觀的筆墨寫成的。作者大都利用了斯達特加檔案中的文件和材料。一般說來，此書關於農民戰爭的事實，可算應有盡有了。他的客觀描寫及「其爲被壓迫階級說話的革命本性」使其書特別有趣味。但是，即在此書內他自己資產階級急進的面目亦可以看到。齊恩門對於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否定態度，使他不夠正確的瞭解農民戰爭中的階級衝突。

考茨基之社會主義的先驅者 (Forerunners of Socialism) 一書，是為補充恩格斯的書而作的，並改正了一些不確鑿的地方。恩格斯引用了孟彩爾 (Muenzeberg) 演說中幾段話，看做孟彩爾在明勒巴黑 (Moellenback) 的聖馬利教堂為民衆所擲毀後，於薩克森 (Saxony) 諸侯前說教中的幾段，實則大大不然。孟彩爾此段辯論的文字乃為攻擊路得 (Luther) 而作。恩格斯在這裏是依據齊晏門的。考茨基在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上改正了齊晏門的謬誤。齊晏門把孟彩爾描寫成爲一個超出時代的人。考茨基在他的書內證明了下列觀點之無稽：

「孟彩爾高出於他的共產主義信徒之上，不是因爲他的哲理與組織的才能過人，而是因爲他的革命毅力，尤其是因爲他的政治家的頭腦過人。」

即恩格斯所說關於孟彩爾在苗爾哈遜 (Muelhausen) 專政的歷史中，有些事實，也有詳細改正的必要。孟彩爾不是苗爾哈遜會議的領袖。佛伊浮 (Pfeiler) 不是孟彩爾的弟子。而是中等階級黨派中一個代表 (福蘭志·畢林——Franz M. Ehring)。

(註釋終)